

基督依然受苦

理查·魏恩波

Richard Wurmbrand

目錄

前言

第一章：開始 25

第二章：到西方去 48

第三章：下一步 75

第四章：衝突或妥協

第五章：一切手段 124

第六章：里程碑 155

第七章：前面的路 179

前言

有 一個人在洛杉磯的街道上駕車，他五歲的孩子也在車上。他們經過一所教堂時，這孩子突然叫道，「爸爸停一停！讓我們進去教堂，看看神今天在做什麼？」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問題。神今天在做什麼？

如果你的孩子正在被折磨，你會如何？

在近年來，數以萬計的基督徒和佛教徒正在越南經歷「再教育」。許多人依然在那種非人的奴役營中。有一位專門毆打囚犯的獄卒名叫圖曹 (TuGao)。他誇口說已經鞭打了二千名囚犯，其中五百人被他打死了。

一次，約有五十名囚犯聚集在監獄空地上。一位名叫提泰 (Tran Tien Tai) 的犯人必需鞭打三十下。

他光著身子，從獄室出來，俯躺在地上。

圖曹正在玩弄自己的鞭子。他摸了摸提泰的大腿，曉得該用的力度。他不能任意殺掉這些囚犯。

當有人受刑罰時，眾囚犯都必需注視。把臉轉開便是犯法。

提泰挨到第五鞭，就受不了。他喊道，「神啊，可憐我。」

這就干擾了鞭刑。獄長就說，「體罰時不許呼叫。頭五鞭作廢。重新計算。」

於是又從頭開始。到了第二十五鞭時，提泰已經昏了，好像死了。當滿了三十鞭，官員吩咐提泰起身時，提泰沒有動靜。「你敢不聽命令？」依然他沒有反應。圖曹彎身看了看囚犯，就勝利的說，「這家伙自殺了。他咬斷了自己的舌頭。這是他活該。革命沒有殺人，也不折磨人。我們若處罰，也只像父親罰孩子。」（《越南古寶島》東安丸陀著 Doanvan Toai，法國 Laffont Printing Bureau Publishing.）

基督仍然被折磨。

在共產羅馬尼亞，如果一個囚犯不說出地下教會的機密，長官就會對獄卒說，「把他帶去見柏林沙

魯少校 (Major Brinzaru) 或威達同志 (Comrade Vidal)。」柏林沙魯是最技巧的酷刑手。威達則是一位女長官，專門击打男囚犯的澤丸。

在蘇聯，那吩咐將是：「帶他去見提摩醫生 (Dr Temo) 或是馬拉地羅 (Mladionov)。」

提摩醫生總是微笑接待囚犯。他穿著醫生的白袍，彬彬有禮。他稱主教為高貴的，又稱地位高的人為可敬的，然後就溫柔地解釋說：「我的職責只是預備你坦誠地與問話官對話。」為這緣故，他必需把針頭插入你指甲下。就如醫生的慣例，他們總是使用消毒的器具，提摩也不例外。他總是先進行針管的消毒。只是沒有麻醉劑。至於馬哈地羅，他的特別任務是強暴修女和女基督徒。一次，當一位浸信會少女交給他處理時，她對他說那麼體貼的話，以致他沒有傷害她，反而悔改信主。共產黨為了報復，就到他的家去把他上吊。可是他們離開太快，弟兄們趕快把他解下救醒。過後他就隱名生活了。——美國的《基督教先鋒報》，哈非 H. Hartfeld 報道。

在一些人的記憶中，某些事是傷心的回憶，一觸動就會流血。因此囚犯們都嘗試忘記自己的孩子們，因為每逢想起就會擔心。但共產黨也知道這

個，就強逼他們踏這地雷區。在漫長的夜晚審訊，問話官不斷地提起他們孩子的名字，又播放孩子哀哭的聲音。每個囚犯都肯定那就是自己的孩子。

在蘇聯的奧德薩 (Odessa)，秘密警察中有一位年輕的女黨員維拉 (Vera Grebenniukova)，她擅長割掉囚犯的耳朵，毆打他們的私處。

在一些地區，當局毆打兒童，迫使他們背叛朋友。一群十多歲的少年被打後，就被帶上車，穿過街道，這樣，萬一他們記不起其他違法少年的名字，至少可以指出哪些孩子的住處，以便逮捕。

共產黨的一種折磨，就是把正常人與瘋人同關在一室。在薩瓦斯 (Savastopol)，十八名囚犯被擠在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里，房間長三步，寬一步。由於沒有足夠的地方站立，一些人雙腳完全不著地，擠在他人的肩膀上。他們因缺乏空氣，窒息而死。

其他人則在冬天被脫掉衣服，趕進坑裡，澆上冷水。還有一些囚犯的頭骨被一根細繩圍住，然後施刑者轉動一根小棍，將繩子收緊，直到頭蓋骨掉出來。

實施這些殘忍行徑的人，是一個前小丑。他放棄了叫孩童歡笑的職業，轉而叫人痛哭。《俄羅斯的紅色恐怖》The Red Terror in Russia, (作者: S. Melgunov , Brandy, N.Y. 1979)

這些事發生在列寧時期。他的繼任者更是青出於藍。史達林殺了基督徒奧金 (Odintsev) 和文斯 (Peter Vins)。他們是數百萬受害者中的明星。在赫魯曉夫 (Khrushchev) 和伯林沙魯 (Brezhnev) 的統治下，被殺的包括浸信會的赫馬拉 (Khmara)、莫伊 (Moiseev)、奧斯塔 (Ostapenko), 比布連科 (Biblenko), 德內加 (Deynega), 蘭姆丁 (Lambdin)。除了天上的使者，誰能寫下所有的受害者名字？

在遊擊隊獲勝的尼加拉瓜，四位神父與共產黨一起上台執政。

共黨中有一名美女成員，名叫阿斯托夫人 (Mrs Astorga)。她引誘前政權的維加將軍 (Vega) 到她的家。埋伏著的同志們就抓住這位將軍。這夫人就觀賞眾同志毆打將軍，把他的眼珠挖出來。他們又割下將軍的陽具，塞在他自己的口中。這就是神父和牧師們的戰友！《岩石 The Rock》1981年五月份

1980年1月1日，安息日會（Adventist，也稱基督復臨會）信徒尼娜（Nina Rujetshko）在克麥羅（Kemerovsk）中被折磨致死。1980年11月11日，安息日信徒西蒙（Simeon Baholdin）在索利卡（Solikamak Camp）被殺。《蘇聯安息日領袖通訊》

西伯利亞集中營處死一些囚犯，因為這些犯人殺了守衛的一隻狗充饑。《走出冰層》（作者：V. Hermann）

烏克蘭天主教神父戈爾（Gorgula），科特（Kotyk）也被殺。共黨綁了其中一位神父，將汽油澆在他身上，然後點燃。另一位神父的遺體被發現渾身是血，牙齒都被打碎，嘴裏塞滿麵包。這是共黨對聖餐的嘲弄。《法國地下墓穴》（1981年5月）

共產黨幾十年來一直在肆意殺戮。法國的《俄羅斯報》7月16日提醒讀者，蘇聯的卡巴共和國（Kabardino-Balkar）領導人卡爾米（Kalmykov）是如何解決了所有反對派：他邀請所有的穆斯林神職人員和部落首領，前來進行和平談判，然後就把他們全都殺了。

蘇聯秘密期刊《真見證》主要談及宗教，但也提到反共的消息。它刊登了一本詩集《Oxana》，說及立陶宛共和國基督徒波肯（Poshkene Birute）的遭遇。由於她信基督，當局就奪去她的孩子們，又把她本人送進精神病院。

共產報章《Niamunas》誹謗她，指她試圖毒害自己的孩子，儘管在針對她的法院指控中，沒有這一條罪。那報章還聲稱基督徒們裸體聚會，進行性狂歡。它又說那牧師的妻子是他的第四任了。

我們的姐妹在詩中提及殉道者說：「被殺的人不能發聲，但我們繼續奮鬥。沒有什麼比為真理受苦更值得活的生命了。監獄、集中營、警方扣留所——這些仇恨的工具多麼無力。就如春天一到，雪就融化。冰雪擋不住陽光；邪惡也不能摧毀愛。公義必得勝。」

儘管有恐怖，立陶宛（Lithuania）仍然充斥著秘密出版的教會讀物：《天主教會編年史》，《黎明》、《未來》、《上帝與國家》、《鮮血》和《受難的基督》等。

共黨不能消滅蘇聯基督徒的信仰，也不能消除信徒們的希望和理性。這些獻身的信徒不因暫時的苦

難而放棄永恆的獎賞。對他們來說，迫害之火是涼爽的，暴力是無力的。

共產黨人可以割掉施洗者赫馬拉（Khmara）的舌頭，不讓他唱詩讚美神，但他的歌聲依然在人的深心裏迴旋。

有人問：基督徒囚犯的家人也難得食物。但囚犯本身呢？

在科雷馬（Kolyma camp）集中營，囚犯們非常饑餓，連死了一周的馬屍也拿來吃了。這馬屍已經發臭，長滿蛆蟲。在奧蒂尼（Autini）金礦區，囚犯把手推車的潤滑膏也吃了《古拉格群島》（—索忍尼辛）。當我在羅馬尼亞共產監獄時，吃的比那還糟。

在蘇聯的索洛（Solovetsk camps），勞動日被凍僵的人，屍身就留在工場。一個人凍僵時，正伏在地上，把頭埋在兩膝之間——就如以利亞禱告的姿勢（列王記上 18:42）。又有二人背對背地僵在一起《半生》（D. Vitkovski）。在冬天，獄方故意把冷水淋在赤身的囚犯身上。

在捷克，共產黨人殺了地下教會的一位領袖，就是教會在暗中按立的牧師普雷（Premysl Coufal）。警方多次帶他到警局。最後，警方給他兩個選擇：或是舉報信徒的活動，或是死亡。當他最後一個次與警方會晤時，警方給了他一張日歷，圈出最後的期限：二月 23 日。普雷每天都看這日歷：他要成為猶大，或是一個殉道者？他是神的孩子。他決定忠誠。

那日共產黨人進入他的公寓，打碎了他的頭骨，打斷了他的鼻梁，割傷了他的手臂，然後打開煤氣。黨方讓遺體留在現場給信徒們看，為的是吓唬跟隨耶穌的人。但有誰會被嚇住？這只證明共產主義沒有真能力，唯有使用暴力（德國拜耳快報，Bayer-kurier，1981 年 4 月 18 日。）

如果你曉得痛苦等著你，你還敢不敢公開反對周遭的邪惡？蘇聯基督徒便如此。

荷兰夫妇巴伦森(Barendsen)是共产阿富汗的福音使者。他們在这个被蘇聯仇恨压制的国家，为耶穌作見證。後來被共黨綁在椅子上，切成碎片。在他們最後一次回荷蘭休假結束後，要重返阿富汗時，有人問他們怕不怕。他們回答說：「我們唯一的害怕，就是沒有行在神的旨意中。」

黎巴嫩福音使者賈米爾 (Jameel Safoury) 向盲人傳講有關於人的邪惡和世界之光。為此，巴勒斯坦左翼遊擊隊砍下了他的雙臂和頭顱。後來有人在橋下發現他的屍體。(德國《Idea》報，4月13日)

羅馬尼亞人布拉迪 (George Bratianu) 被迫自殺。共黨把他的雙手綁在背後，然後把活老鼠綁在他的脖子上，老鼠啃食他的皮肉。他就從窗戶跳出去自殺。(西班牙《Tara Si Exiulul》報，1981年2月)

俄羅斯的弟兄們在監獄遭受酷刑。有人被令趴在地上，雙手被反綁在腳上。然後共黨用繩子將他們吊到天花板上，反覆拉上拉下，直到他們暈了過去。這時，獄卒就用一桶水澆醒他們，然後繼續酷刑。有醫生在一旁不時檢查，說：「可以繼續審訊。」(《走向新城》--Krasnov-Levitin)。但信徒們依然忠心。

《基督向共產世界》的一位同工，在中國遇到一位82歲的老人。他騎着一輛老舊的腳踏車，到處傳道。我們的同工給他一本新聖經，他非常感激，儘管他需要跋涉二百英里來領取。

他問我們的同工可否給他一輛新的腳踏車，因為舊的已經磨損了。他在兩年內騎行了數千英里，將神的話語帶給渴望的人。

索忍尼辛在講述自己在古拉格島的經歷時，說他一度發現自己已經放棄了一切希望。那時他每日只得一丁點口糧，但每天還須要勞動十二小時。此外，他又患有惡性腫瘤，醫生已經預測他活不了多久。

有一天，他在烈日下鏟沙，中途停了下來，儘管他知道警衛會過來打他，可能會把他打死。但他根本無法繼續了。

突然，他意識到有人站在近旁。轉過身來，他看到一位老人，用拐杖在沙地上畫了十字。從這一姿態，索忍尼辛就明白我們不必怕死。被釘死的人子已經復活了。

我們也有這樣的希望。基督徒沒有理由感到絕望。我們無需偽裝。我們有能力在上帝面前坦然生活，即使我們、或我們的教會可能會因為我們的正直而滅亡。但我們曉得十字架的背後就是復活。

蘇聯基督徒彼得(Petker)、弗里(Friesen)和彼得斯(Peters)，在運送秘密印刷的聖經時車禍身亡。這起事故很可能是共黨策劃的。當佩特太太哭泣時，她三歲的孩子問：

「媽媽，爸爸在哪裡？」

她回答說：「和救主同在了。」

在天使的啓發下，這孩子問：「若是这样，為何媽媽還哭？」

那些曾經遭受巨大苦難的人，就有天使和大群見證人的同在。他們的說話和傳道，是別人所不能的。顯然，一個愉快地背負著沉重十字架的人，他說話的聲音有異於那些只是從書本上獲得知識的人。

聽說被監禁的羅馬尼亞東正教神父卡丘(Calciu)正在痛苦中。他體重減了一半，雙目幾乎全盲，雙耳也聾了。他曾經坐牢十六年。讀他講章的，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殘缺。他因為那篇道，不久前又被捕。

儘管嘗過共黨的可怕手段，卡丘神父還敢這樣寫道：「如果沒有復活，人類將是地球上最不幸的生物，因為植物和動物不知道自己會死，我們卻知道，而且天天為這個擔心。儘管我還年輕，但也許今天我就會死。」

「無神論者禁止任何復活的信仰。但如果沒有復活，這暫短的生命有什麼意義？無神論者自己也怕死。他們也擔心自己死后就会永遠消失，於是就為自己建立巨大的陵墓。這是人心渴求永生的一種可憐的代替品。

「耶穌給我們一種沒有恐懼的死亡。祂給我們明白什麼是死亡，什麼是真快樂。祂保證死亡不是結束，卻是永生的開始！」

卡丘不怕死。他已經在死亡的旋風中看到了天使。

烏克蘭一所秘密天主教修道院的院長寫了一封信，給紅衣主教斯利（Slipyi）。信中寫道：「我們日夜在聖禮前朝拜。一些年輕女孩已經立下了永久的誓言。在醫院裡，秘密的修女給護士們真光。因此許多尋求者找到基督。」

俄羅斯東正教基督徒囚犯波雷（Poresh）回憶說，在法庭上，從被告的位置，他可以看到外面一所教堂尖塔上的十字架。當法官宣判他的刑期時，那十架似乎沐浴在一種奇異的光中。他在監獄里寫道：「許多人問，如何才能得著聖靈。只要犧牲自己服侍神。獻出血，就得聖靈。」

* * *

神今天怎樣了？祂正在大受痛苦。我們的創造主，我們的天父正在受苦。

你問今天基督如何了？答案是：祂如今仍然受折磨。基督徒受痛苦，就是祂正在受痛苦。我們是祂的身體。

上帝給我的使命，就是為受難的基督徒發聲。

* * *

魏恩波（Richard Wurmbrand）是誰？你可能會問。

由於沒有人能夠完全客觀地談論自己，不帶任何偏見，所以在這裏我便引述他人對我的評論，包括稱贊和貶壓。作為讀者的你，便可以自行判斷。

「除了飽受攻擊的魏恩波之外，當代沒有人能給西方人更完善的了解共產國的真相。在魏恩波出現之前，我們幾乎完全不曉得那兒的情況。」——邁克牧師 (Rev Michael Bourdeaux)，倫敦宗教與共產主義研究所所長

「魏恩波令人感到刺激，但他也睜開了我們的眼晴。。。他叫世界傾聽，即使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魏恩波正在高喊殉道者的口號。」——《瑞典向斯拉夫宣道會》秘書長 Ingemar Martinson 牧師

「魏恩波是鐵幕後的保羅。他不僅僅是一位活著的殉道者，也是地下教會的最高權威。」——

《Underground Evangelism, 地下教會月刊》。

「自從登山寶訓發表以來，沒有人像魏恩波那樣充滿愛心地講道。」——《Haratta 報》芬蘭

「魏恩波給普世教會帶來了一個新視野，提醒人們紀念殉道者。」——《教會時報》，倫敦

「魏恩波像火球一樣炸開了一些冷靜人士的自滿。」——《國會記錄》，美國

「我們遭受了一場名為《魏恩波》的颶風襲擊。」——《Tablet/石板報》新西蘭

「我們已經考察，幾乎可以肯定地說，羅馬尼亞從來沒有魏恩波牧師這人。」——《Finnish Communist newspaper 》，芬蘭

「魏恩波的風潮，純屬情緒化，極其幼稚...他對教會政治的判斷，證明是可怕的狹窄...魏恩波扭曲事實，他(對蘇聯與諸共產國)的危險在於他号召東歐的基督教會抵抗至死……」——《俄羅斯教會期刊》，作者是 Gerhard Simon。

「在當前的共產政權中，隱藏著人文社會的強大力量。。。魏恩波真的很危險。」——Van de Heuvel，時任《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總監

「魏恩波牧師在美國擁有一家妓院和九家夜總會。」——蘇聯電影《The Emissaries/大使》

「魏恩波是魔鬼的喉舌。」——《工人報/Arbeiterzeitung》，瑞士

「魏恩波是今日的施洗約翰...是曠野的呼聲。」——《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美國

「魏恩波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神學家。」——《朝聖者報/The Pilgrim》，美國

「魏恩波是一位激烈的反共者和反蘇派。他的書里充滿了毫不掩飾的仇恨。」——幾家蘇聯黨報

「魏恩波完全拒絕學術客觀性（Scholarly objectivity）。」——《Reformatorsch Dagbladet》，荷蘭

「魏恩波是一位紅牧師（共產主義牧師）。」——《Vaderland 報》，南非

「魏恩波濫用講壇傳播他的政治觀點。」——《Dalademokraten 報》，瑞典信義會 Ström 主教

「魏恩波是最活躍的反共聲音之一。」——《Polititicheskaie Samoabraovanie》，莫斯科

「除了《聖經》，沒有什麼比魏恩波的《為主受苦》更震撼我了。這是本世紀的呼聲。它是自尼祿

Nero 苦害基督徒以來最有力的殉道行傳。」——庫里博士 Dr Kurt Koch，（德國福音派牧師和作家）

「魏恩波非常明瞭神的愛和人性。他的書中甚至沒有與任何私人的爭議。也許經歷了長期的監禁，一個人就不再有私心了。」——《Alliance Witness 聯盟見證報》，美國。

「魏恩波受過共產黨的殘酷對待，所以他思想混亂了。他又不是福音派，所以不可信。他更像神秘主義者。」——荷蘭的一種基督教雜誌

「魏恩波是個無節制的人。」——《天主教先驅報 Catholic Herald》，倫敦

「魏恩波发言单纯低调，沒有華麗用詞，也沒有使用過度的誇張。他對基督教的了解是最純正的，就如初期的教會。他不用大聲宣傳。魏恩波就如他所傳的拿撒勒人耶穌。他身體虛弱，靠著不屈的靈力感召人。他從講臺上下來時已經精疲力盡，這叫

聽的人都感到羞愧。」--《Berner Tagblatt 報》，瑞士

「魏恩波是一個骯髒的猶太人。」--《基督教先鋒報》，美國

「魏恩波挺納粹。」--《Verden Gang 報》，挪威

「魏恩波個性熱情而令人着迷（有時甚至過度），他總是堅定地反對西方基督教的多疑。西方基督教幾乎總是不信共產主義可能對自己構成威脅。」--《Switzerland 報》，瑞士

「魏恩波的書《如果那是基督，你會把你的毯子給他嗎？》說服人們不僅把毯子送給受迫害的兄弟，甚至也送給迫害者，這本書充滿了愛。」--《New Republic 新共和國報》，義大利

「魏恩波對共產陣營酷刑和野蠻行為的譴責比名作家索忍尼辛更感人。」——《The Citizen報》，義大利

「魏恩波談及共產黨對基督徒的酷刑，許多人以為是誇大了。直到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出來證實他。」——《日常新聞，Daily News》，加利福尼亞州，美國

「感謝上帝給我們索忍尼辛和魏恩波。這兩人都寫了共產國的禁書。這些書是神給我們的警鐘。」——《Tacoma NewsTribune 塔科馬新聞論壇》，美國 5/96

「西方的一些教會領袖攻擊地下教會的主要鬥士魏恩波牧師，聲稱他提及的共產監獄暴行，都是撒謊。但我卻親自見過與魏恩波一起坐牢的基督徒。他們告訴我說，魏恩波說的不僅是真的，而且還有很多未曾說。沒有人能完全描述那裡發生的可怕酷刑。」——阿努扎女士 Anutza Moise，《魏恩波的贖金》的作者，挪威

「魏恩波牧師的身上仍然留有共產酷刑的痕跡。他是一位國際知名的作家、講師和傳道人。」——《波士頓先驅報 Boston Herald》，美國

「索忍尼辛的著作證實了魏恩波的話。我們難道不應該支援魏恩波和他創立的《向共產世界之宣道會》嗎？」——《宗教改革 Reformatio》，瑞士

「索忍尼辛和魏恩波都是現代教會歷史上的巨人。」——《Dagen/達根報》，挪威

「魏恩波牧師對人類共同敵人的寬容，是錯誤的。他表現的愛與慷慨甚至超過了上帝。上帝沒有與路西弗（撒旦）共享麵包，而是用火焰劍將撒旦趕出了樂園。在亞當和夏娃偷吃禁果後，上帝也沒有寬容他們，而是趕出他們。耶穌在聖殿也把商人鞭打出去。」——《Vatra, 罗马尼亚移民杂志》，美國

「卡特總統評擊俄羅斯的踐踏人權，但卻忽略了中國的同樣惡行。為什麼？答案很簡單。中國缺少了抗議的聲音。中國沒有人像魏恩波。」—《信仰生活 Life of Faith》，英國

「就如聖保羅，猶太人魏恩波飛越全球，傳達信息給每一處：援助藏在地下的基督徒。對我們，魏恩波牧師不僅堅固了基督教，也堅固了羅馬尼亞全國的百姓。」—《Cuvantul Romanesc 羅馬尼亞移民日報》

「魏恩波通過他的徹底自我犧牲，給西方人看見真相。以致無數人支援受迫害的基督徒。」—《New Bildpost》，西德

「魏恩波牧師足以叫最粗野的職業足球員也自歎不如。他的聲音野蠻。他的結局必然悲慘。他因為非法印刷和傳播宗教宣傳品、煽動信徒反對當局而入獄。他是一個中邪的牧師。」—《Nauka i Religia / 科學與宗教期刊》，無神雜誌，莫斯科

* * *

自從我抵達西方，十六年來就謠傳不斷。有人稱我為現代聖人，有人說我是惡棍。有些過去攻擊我的人，如今成了朋友；也有些曾說我好話的人，改變了主意。是什麼引發了這些爭議？我相信，這是因為神使用我創立了《基督向共產世界之宣道會。》

這是什麼樣的一種宣道會？在寫這書時，我經常會看到 1959 年我被捕後，我妻子薩賓娜（Sabina）在後面追趕警車的場景。我也有這樣的印象：我似乎看見共產國基督徒們在我身後尾隨，喊道：「大聲說出來，為我們發言」。

他們的呼喊促使我成立這宣道會，也促使我寫下這些經歷。

我不信歷史，只信事實。在聖經裏，沒有「歷史」這字。所有的時代，都像一個不斷展開的事實，就如一部電影。我們在螢幕上看到的事，每個動作都有其前因與後果。其實當那卷膠卷中，所有的電影情節都有了，它們是同時存在的。只有當電影上映時，各項事物才會看來彼此關聯。同樣的，我們這宣道會的成立，成功和失敗，早已存在神的膠捲上。只是我們人類只能每天發現一點新發展。

我還要補充一點：除非你從一個特定的觀點出發，否則你就無法寫歷史。連聖經也是。聖經作者

們寫的，不僅僅是故事，也帶有他們個人的感情。因為寫書的人，總會帶有主觀。

例如，《歷代志》的作者可能是一個利未人，因為在他書中多次提到利未人（共有一百次）；而《列王記》中只提及利未人一次，《撒母耳記》則提了兩次。這三本書寫的，其實都是同一朝代，同一君王。還有，我們也可以猜出作者的太太是什麼支派。《歷代志》提到猶大支派 102 節，提到利未支派 81 節，而其餘十個支派，總共只提及 186 節。

一個人不能、也不該寫純客觀的歷史。聖經中有十七處提及雅各的十二子——每一處的次序都不相同，都是根據作者的個人喜好。一位沒有個人喜好的人不是人，也不應該寫作。甚至耶穌也有自己偏愛的門徒，父神也有一個首選的國家。聖經歷史中所顯示的偏好，證明它是神的啟示。

我這書不是作為一部學術歷史，而是作為一首對地下教會的愛之歌。就如聖經，這書除了歷史事實，還有許多其他的成分。

第一章

開始

聖經中沒有零

这一切都是從共產羅馬尼亞的一間牢房裡開始的。那時是一九四八年。

當時我被單獨監禁在地下三十英尺。當局奪去了我的教會、家庭、自由、健康，甚至連我的名字。

綁架我的人不許我說出自己的姓名。於是一般的獄卒都不曉得魏恩波正在他們的獄中。共產黨人盡力把我變成一個零，但他們不成功。

福音書提及耶穌用七塊餅餵飽數千人。

假設門徒們沒有七個餅，只有三個或一個，將會如何？群眾仍然能吃飽。事實上，在另一個場合，耶穌只有五塊餅。但喂飽更多人，收拾的零碎也更多（馬可福音 8：19-21）。你可以用很少的錢侍奉上帝。祂的祝福並不取決於你奉獻的大小或數量，而在你奉獻的精神。

假設我沒有麵包奉獻又如何？這是不可能的。聖經所用的三種語言，希伯來語、亞拉密語和希臘語，都沒有「零」這詞，也沒有零的符號。於是按照聖經，沒有人能空手到耶穌面前。你再貧困，也能帶同自己的身體，就是那個自稱「一無所有」的人。因為你確實有一些非常有價值的東西：你的赤貧和一无所有的你。

誰是地下基督徒？

一個在牢房裡，被指定成為零的人，却意图帮助受迫害的教會：這就是我們宣道會的起源。我曾和許多羅馬尼亞基督徒一起，在蘇軍佔領我國時，坐

牢多年。在蘇軍中，我也遇見其中隱藏的蘇聯地下教會成員。後來我又遇到來自各共產國家的信徒。他們是什麼樣的人？

这里且说一些他們的生活故事，這將比理論的解說更能讓你理解他們。

在立陶宛，有一位剛出獄的基督徒寫道：

我的外表並不吸引人。在奴役營中，我在地底下工作。那時一宗意外摔斷了我的背骨，以致駝背。獲釋後，我去拜訪一個基督徒家庭。那兒有一個孩子盯著我問道：「叔叔，你背上駝著什麼？」

我確信他肯定會諷刺我。但我依然回答說：「是駝背。」

「不，」那孩子說，「上帝就是愛。祂不會給任何人畸形。你有的不是駝背，而是肩膀以下的盒子。這盒子里有天使的翅膀。有一天，盒子會打開，你就能用這雙翅膀飛向天堂。」

我開始高興地哭了。即使是現在，當我寫這文章時，依然哭。

這些兒童和前囚犯便是共產國地下基督徒的特征。

我們收到一封來自羅馬尼亞的信，告訴我們一位共產黨員，就是前秘密警察局長，現任一家國營大商店的主管。他聽了我們的廣播節目，得到光照，就完全改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接下來的周日，他來到一所浸信教堂，公開祈禱並請求寬恕。會眾們都知道他的過去，都和他一起哭泣。黨方馬上开除他的黨籍、也不許他繼續當主管。於是他就當起一名勞工，掙錢養家，但他卻很喜樂，因為知道如今他是主的人了。

殉道教會的許多成員，都為基督放棄特權地位。好服侍基督。

俄羅斯無神論雜誌《Naukai Religia》描述了俄羅斯的基督教兒童。一名記者在參加一場 Kislovodsk 城的教會團聚後，與一位十一歲的女孩談話。這女孩真誠的相信，當她祈禱時，仁慈的主會看著她微笑。她說，「上帝存在。我親眼看到了祂。我不相信那些說祂不存在的人。」另一個小女孩親吻了耶穌被釘的聖像。然後她也讓自己的洋娃娃親吻那聖像。人問她原因，她說：「主耶穌眼睛正在注目洋娃娃。我親眼看見。」

我也確信上帝對小女孩們玩的洋娃娃非常感興趣。我也相信這些受無神統治的兒童和成年人，該獲得我們的幫助。

扎里亞 (Zaria Vostoka) 描述了在蘇聯的蘇胡城 (Suhum)，當局對一群成年信徒的審判。他們的罪行是在樹林里教導二十個兒童有關基督信仰。一位無神信仰的父親托普 (Topuria) 驚訝地發現他的兒子也在這群兒童中。當這些兒童被傳喚供証時，托普就大聲鼓勵兒子公開針對眾被告。可是他兒子諾達 (Nodar) 卻回答爸爸說：「爸爸您是我地上的父親。但我的天父，卻是我們在天上的永恆爸爸。」這群成年的基督徒被判二年到五年的監禁。他們自己的孩子們被當局奪走，不能再見。

被蘇聯驅逐出境的諾貝爾獎得主索忍尼辛 (Solzhenitsyn)，在《古拉格群島》第三卷中講述了一位基督徒的故事。那位基督徒沒有出版過任何講道集，也沒有上過電視臺，或舉行過任何群眾大會。人們甚至不能肯定他的名字，索忍尼辛只說：「他的名字似乎是西索 (Alexander Sisoiev)」。

正如《使徒信經》中沒有提到耶穌的講道，只說祂「在本丟彼拉多的手下受難，被釘在十字架，埋葬。」歷史也只告訴我們，古格拉島的那人，也許

叫西索，是一位傳福音的人，在肯吉爾集中營（Kengir）被獄卒槍殺。他曾在監獄多年，享受與主的安靜時光。

在那監獄，槍殺無辜是常事。但西索卻是一個異類。看見他的人「馬上知道他跟耶穌同在」，儘管他像彼得和約翰一樣沒有受過教育（使徒行傳 4:13）。在這毆打和虐待通行的地方，當他被槍殺後，整個營地的 2500 名普通囚犯（包括殺人犯、強盜和小偷）并 500 名政治犯都開始騷動。他們拒絕工作，又襲擊警衛。他們的第一要求就是嚴懲那些殺死這名基督徒的共產官員。

最終，共產黨使用暴力鎮壓，擊斃約七百名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這些囚犯用死表達他們對這基督徒的愛和聲援。我們卻不曉得這基督徒，只知道他常安靜在神裏面。即使是在多人的普通牢房，他也有自己的安靜空間。

也許對我們，成為像那個「名字可能是西索耶夫」的樣式，比參加《傳福音妙招》的研討會更為重要。

古巴總統卡斯特羅（Castro）出席觀看一名基督徒的死刑。當這基督徒雙手綁在背後時，卡斯特羅

命令道：「跪下求饒！」那基督徒大聲回應道，「我不跪向任何人。」一名神槍手就射穿他的一個膝蓋，然後再射另一個。卡斯特羅狂笑道：「你看，我叫你下跪，你就必需跪下。」然後槍手慢慢把這基督徒殺死，選擇槍擊他身體的非要害部位，延長他的痛苦。

魔鬼本身就是通過這些反基督教的獨裁者來運作。我們又聽到牠的試探：「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太 4：9）

「上帝已死，宗教是謊言，」這是東歐小國阿巴尼亞（Albania）每天流傳的口號，阿巴尼亞宣稱自己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神論國家」。該國的两百名牧師，只有十四人還活著，其中的十二人被關在集中營。兩千座清真寺和教堂被毀。首都迪拉納（Tirana）的大教堂變成了體育館，清真寺變成了公共廁所。共產無神論恐怖活動的結果是什麼？當局發現有一百零十六對年輕情侶在菲爾城（Fier）舉行集體婚禮。阿巴尼亞共產媒體說，許多基督徒的手掌都紋有一個十字架，穆斯林則會紋一個新月；於是他們在第一次與人握手，就清楚表明了他們的信仰。

乙先生曾是羅馬尼亞的黨方國家檢察官。後來他與黨方發生衝突，就被同志們投入監獄。他正好與魏恩波牧師同在一間牢房。他講述了自己是如何從饑餓的監獄轉移到礦井奴役營。在奴役營，囚犯們由於必須從事操勞，所以當局給他們比較多的食物。在抵達這奴役營時，他在營的大門遇到了一個陌生人。那人立即給了他一些食物，並在他吃麵包時坐在他旁邊。這位前檢察官問那位好心人被判刑多久時，那人回答是二十年。

「是為了什麼緣故？」乙先生問。

「因為給一位逃避警方追捕的牧師一些食物。」

「是誰為這善行給了你這樣的懲罰？」乙先生繼續問。

「你便是當時指控我的檢察官。你不認得我，但我卻認得你。基督教導我們以善報惡。我只想給你看到，給饑餓的人一些食物是正當的。」

醫生蒙泰（Munteanu）博士的父親是一名東正教的神父。共黨因為他服侍教會，就把他殺了。蒙泰後來也坐牢，還與殺害他父親的兇手們同室。當那些兇手們生病時，他不單給他們醫療，還把自己的口糧給他們。

佐特 (Tsotsea) 被不公正地判刑二十年。過了一段時間，審判他的法官也入獄，而且病重了。那是一種令人厭惡的病。在監獄條件下，他的排泄物和尿液必須不斷清理。獄室沒有自來水、棉花或床單。佐特愛他的敵人，就照顧這前法官如同兄弟，直到法官去世。這法官在死前就與神和解了。

單獨牢房的幻象

當我在監時，沒有聽說過死海古卷 (Dead Sea Scrolls) 在坤兰 (Qumran) 面世。抄写这些古卷的犹太教派，把世界分成两个阵营：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我發現這也是聖經的思考方式。

自從我到了西方，多人指責我一味使用黑白描繪一切：基督徒是正義的，無神論者是偏差的；基督徒是光明的，無神論是黑暗的；共產是惡的，自由世界是善的。我接受這個責備。耶穌從未使用過「灰色」一詞；新約也沒有。

事實上，黑暗之子共產黨人通過恐怖和欺騙佔領了羅馬尼亞。數以千計的光明兒女被關進監獄，我也是其一。他們單獨監禁我。牢房里沒有任何事情

打擾我。我們囚徒沒有聖經，也沒有任何其他書籍，甚至沒有一張紙來分散我們的注意力。多年來我們只能看著發霉的牆壁。

那時我就發現，我過去的牧師經歷，都是肤淺的。我感到神的話最好是閉嘴傳揚。耶穌在三十歲之前，幾乎完全不提及神。就是在三十歲之後，祂也很少說話。祂何必多言？一朵花會喊叫嗎？對於耶穌來說，存在本身已經是足夠的辯論了。

我是猶太人，耶穌也是。猶太人与古希臘、亞述和古埃及人不同的是，古代以色列沒有留下任何繪畫或雕塑。猶太人不明白，神既然已經創造了山川河流、鬱金香和兒童，我們何必再費功夫製造次等的貨色？猶太人對生命的理解與現代科學不同。他們並不刻意去「感受生活」，就如現代藝術家常提的。他們從周遭的人與事中看見神，發現祂是不可描繪的。

古代猶太人留下的，唯有一些敬畏神的詩歌（這也是因為神特別吩咐，所以他們才寫。）當你與神建立關係時，最好的溝通就是沉默。「主在祂聖殿中，願全地都在祂面前靜默。」（哈巴谷書 2：20）。

所以我並沒有因為缺少筆墨而苦惱。有什麼文字可以形容我心中的話？滿溢的沉默自然發聲。

我聽到了不能形容的語言，因為它既不是一種物品，也不是任何動詞或形容詞。它已經變成了肉身。

我已經達到了另一種狀態。只要心中起意，就能見到一個人、或聞到一種香氣、或出現某些花朵、食物、飲料、歌曲、音樂、天使、男人、女人等。無論我心中所想的是什麼，都會出現在我的面前。最容易顯現的，就是主耶穌。梵語的心，hrdy ayam 詞源是 hrdy（心）與 ayam（神）。hrdy 並不能單獨使用。它總是寫成 hrdy ayam 意即「神心」。少了神，就沒有心。原來一顆沒有神的心，不配稱為心。

我多有幻想。我想像自己是教皇、或是美國總統、或是一個商人、或是一個環遊世界的人、或詩人、或乞丐，我將會做什麼。我也夢想如果我再度年輕，我會如何生活。聖經提及在猶太王希西家（Hezekiah）年間發生的一件事：日晷上的影子竟然後退了十度。假設這事發生在晚上八時，時間將會退回到早上十時。這就能讓國王重新安排當天的行動。他就可以避免那日的誤行或誤言。我想，如果我也能重新成為一個男孩，再開始我的生活，或許我就得以避免許多錯誤和罪惡。

在上帝的計劃中，夢扮演重要的角色。

摩西寫及一位法老，一位十足的國王。這法老不僅在清醒時是王，在睡夢中也是。他的潛意識也在思考人民的福祉。這位善良的夢者遇到了另一位「夢見他人之夢的人」（創世記 37:19）。這夢見夢者，卻來自社會的另一個極端：一個外籍的囚犯。這囚犯的罪名，是強姦未遂。他名叫約瑟。就因這兩位夢者聯合，埃及就免遭饑荒，也救活了鄰國的饑民。

在我坐牢的孤獨的時光，我也做夢，我非常重視夢。我夢見的，有些是噩夢，有些是輕鬆愉快的夢，但也有一些具有重大意義的夢。

我最心愛的夢，就是成為基督理想的新娘，愛撫祂而不是侍奉祂。

我有時間思考很多話題。孤獨的歲月是漫長的。

其中一個常出現的夢，就是一天我能到西方去，告訴自由世界有關於共產。說黑暗之子如何壓迫人。我們又能如何進行有效的幫助。

這夢成了我的預知。《列王紀上》提到所羅門王建造耶路撒冷聖殿時，使用了一個特殊的希伯來字：behibanotoh(בהבנתה?)，這是動詞「建造」的一種形式。直接的翻譯，就是指那建築物自行建

立。原來聖殿不是人造的，而是自行建立的。人類只是給它一個物質的外形。

同樣的，在主耶穌的比喻中，一個被託付一磅銀子（當時的貨幣，約等於一個普通工人二十年的薪金）的仆人告訴主人說，「你的那磅銀子已經變成十磅了」《路加福音 19：16》。他並不說：「我憑著我的才能，賺了十磅。」許多事業也都是自行發展的。

同樣的，我在夢中並沒有看到自己或他人創建了任何機構。我只看見到一個機構自行成立了。我預見了我未來的活動。我不必決定它們，但這並不意味我不必思想它們。

在監獄里思考秘密傳教

但顯然我並沒有一直在夢中，我也在思考。

我只肯定自己必做的一件事，就是不煽動人仇視共產黨。我也愛共產黨。

亞歷山大的菲羅（Philo of Alexandria）描述彼拉多為腐敗、侮辱、掠奪、陰謀、傲慢、屢次謀殺無辜，又野蠻。古代歷史學家約瑟夫（Josephus Flavius）也對彼拉多有同樣的形容。《塔木德》

Tahmud 對耶穌時代的大祭司也有非常負面的評論。但福音書卻不這樣說。因為寫福音的人心中沒有仇恨。他們只說激發信心和行動的話。他們不會說令他們對手顯得卑鄙的話。

愛是基督徒唯一可能的態度。一棵樹不會因為樵夫砍伐它，就拒絕給這樵夫遮蔭；月亮也不會一個人行惡，就拒絕給他月光。

我的職責是將上帝的話語（真光）帶入共產國家。

我毫不猶豫地成為一名走私者。出埃及記 35: 3 中寫道，「安息日不可在你們的住處生火。」但利未記 6: 5 卻吩咐祭司要確保壇上的火永遠燃燒：「每天早上必須在上面点燃柴火，」包括安息日。這兩條命令是彼此對立的。走私聖經也是，它與不可騙人的命令對立。

在極度饑餓時，不可能進行長時間的系統思考。我只能偶爾思考。我當時也努力保持頭腦健康，因為知道能思維的頭腦太寶貴了，不能丟失。如今我才能將當時的想法系統化。

我們真的不能進行欺騙嗎？給無知的人永生的信息也不行嗎？我們作的，是反共的戰鬥，是按照主

的旨意。於是在這戰鬥中，沒有罪孽能觸及你；因為你是主的使者，正在執行祂的任務。

神命定以色列人只能在耶路撒冷的聖殿獻祭。任何其他地方獻祭都屬於違法。然而先知以利亞卻違法獻祭（王上 18:32）。神允許以利亞在特殊的情況下，採取特殊的行動。我們的今日也是。

我知道共黨會阻礙我們的活動。他們已經滲透羅馬尼亞和其他共產國家的教會。如果我們在西方建立一個宣道會，他們肯定也會監視。

我記得杜雷案（Dreyfus case）。當時在法國軍中有一名猶太軍官因為是猶太人，在証據不足時就被指控叛國，於是被流放在魔鬼島（Devils Island）。十年後，法國情報局才在德國大使館的廢紙中發現了一封德國武官寫的小片段，證明叛國的不是杜雷，而是埃斯特（Eszterhazi）少校。杜雷獲得平反。在這起案件中，法國司法部受了敵人的誤導。共黨也會試圖在我們中間製造誤會。

因此，我設想的宣道會即使在西方也必須非常小心。那時我還不知道有所謂的碎紙機。現在我們在《基督向共產世界宣道會》的辦公室裏就有一架。我們不會隨便扔掉任何一張紙。我們也不保留任何檔案。我們把重要資訊保存在私人住宅的縮微膠捲

中。在緊急情況下，一切都能在一分鐘內燒毀。過去我沒有想到解決方案如此簡單。

我在隔離牢房中學到的沉默是有用的。我對福音的沉默與不提的故事產生興趣。福音講述了一個迫害基督徒的猶太人掃羅。我個人更想知道主耶穌的兄弟雅各如何歸信耶穌，並取代了另一位雅各（西庇太的兄弟）的重要地位。我也想知道被掃羅殺害的基督徒英雄的故事。但聖經作者對這些事情卻保持沉默。它必有原因：因為提及這些事，就暴露了一些當時需要隱藏的人。因此，我們也必須謹慎，知道哪些事物不可提。

我們必須向天使學習，他們的語言常是沉默。只有在讚美時，他們才發聲。其實天使們也只能沉默，因為他們不能對神說「不」，原因是他們太愛神了。他們也不必對神說「是」，因為順從神是理所當然的。於是他們就不說話，只遵行神的旨意。

基督徒必須說話，但他們也知道什麼時候不說。

現在我意識到我許多監獄的夢想，只是幻想。那時我不知道實際的情況。我不知道普世教會幾乎沒有傳教活動。如果所有基督教傳道人都放下自己的崗位，到中國去；那時每十萬中國人，才能有一名傳教士。目前世界 94% 的傳道人都只能說英語，

於是只能向世上 9% 的英語人口傳福音。其餘 91% 非英語的人口，只有寄望於六巴仙的傳道人。

我原本只想建立一個向共產世界的宣道會。但如今發現，我們的活動其實廣泛得多：它包括鼓勵西方教堂更努力傳教，換句話說，就是去真正的愛耶穌和全人類。

二十億人不知道那超乎萬名的聖名，或者更糟的是，他們聽到了有關祂的扭曲故事，以致他們敵視祂。

人所可能獲得的最大禮物，就是永生，並其中的無限可能。明白了這個，一個人就不再擔憂自己的有限歲月。他的年日就變得有意義，而不是計算步向死亡的日子。

一項偉大的任務擺在我面前。

無論如何，當太陽下沉時，它並不曾失落。判處二十五年奴役也不意味魏恩波完蛋了。據說，一群毛虫正在為一位同胞吊喪。它們不曉得，當喪禮進行時，在它們頭上飛過的蝴蝶就是那同伴。

忘記殉道者就是忘記基督

耶穌和信徒的關係是獨特的，無法用言語形容，因為沒有適合的對比。它有些像輸血：一人的血變成了另一人的血。如果接受血液的人，在輸血后不久就受傷流血，那麼他流的不再是捐獻者的血液，而是他自己的血。捐獻者的血已成了他的血。在心臟移植也是如此。那顆心不再是前主人的，而是新主人的。同樣，耶穌和相信之靈魂，也是如此。耶穌把祂的靈賜給我們，祂的靈就成了我們的靈。

但同時我們的靈也被輸入耶穌裏面。這是一種兌換。路德說：「天父告訴基督，‘你成了否認主的彼得、又成了逼迫的掃羅、出賣的猶大、犯罪的抹大拉。’於是律法看耶穌罪大惡極，就判祂死刑。耶穌成了人類史上最大的殺人犯、小偷、說謊者、通奸者，不是因為祂犯了這些罪，而是因為祂將這些罪行據為己有。祂成了犯罪的我，我成了正義的祂。」路德在《加拉太書》的註釋中大膽地說：「基督徒就是基督。」

他是站在聖經的立場上。基督教最偉大的導師們也都教導這一點。聖依納（St Ignatius）寫道：基督是我們不可分割的生命。聖湯瑪斯（St Thomas Aquinas）說基督和基督徒是「准同一的神秘人物」（quasi one mystical person）蘇格蘭的聖經班教導：「基督並不是與祂子民完全分離的另一個人。」

曾有一位牧師試圖向一位鐵路工會的大領袖傳福音，可是不成功。後來發生鐵路工潮，工人們嚴重罷工，眾工友面對饑餓和不斷增加的債務，都拉緊腰帶，堅持訴求。牧師就去見這位大領袖，說，「我有一個建議，可以讓你贏得這場罷工，取得公眾的同情，輿論的支持。」這領袖第一次對牧師的話感到興趣。牧師就解釋說：「為了展示工人們絕望的處境，喚起人們的同情，只要把你兒子綁在鐵軌上，讓機車碾過就行了。」這位領袖大怒說：「我寧願全世界都餓死，也不願犧牲我唯一的兒子！」牧師就說，「神愛世人就像這樣。祂犧牲自己的獨生子，換取萬族萬民的人得救。」

上帝本可以派一位古代聖人或天使為我們而死，但祂卻賜下天上最好的耶穌基督。當我們意識到這犧牲的程度，我們的心就被吸引悔改。耶穌在受難日為我們的罪而死，但死亡不能束縛祂。死亡是一種低級現象（就如粗略的包裝紙，）它不能永遠封閉那最好的。耶穌從死裡復活了：基督戰勝死亡！

上帝賜下祂最好的。在我周圍的其他牢房裡，有神的聖徒，他們按照利未記 6: 20 的命令，奉獻最好的。這些人中，有些還生存；也有許多死了。

我夢想他們不會被人遺忘。忘記他們就是忘記基督，因為受苦的基督徒就是基督。通過這些信徒，

基督本人就在祂神秘的身體（教會）中，再次被捆綁，迫害。

西方人訪問東歐

與此同時，國外的基督徒也準備實現同樣的夢想。他們成了地下教會的同工、朋友和捐助者。這不是因為我寫的書或發表的講道。其實書本和佈道並沒有一般人想象的那麼具有魔力。它們只是強化了現有的人心。共產黨對匈牙利人和捷克人多年的洗腦並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人民一有機會就會起來反抗。人的生命有它的路向。它主要不是因為媒體，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媒體的影響。我的挑戰之所以獲得接受，是因為西方的一些靈魂在創世之前就受命為神的孩子。他們心中已經準備好這項任務。

1964年六月，我因大赦而獲釋放。當時我才服刑了十四年，還未到二十五的刑期。隨後我就得以脫離共產世界（整個共產世界也是一種監獄），到自由的西方。

我發現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基督教世界。一種是與共產黨妥協的，另一種則不。前者不單包括共產國裏的許多基督徒，也包括了西方的許多主教和牧

師。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曾經專門詢問我的情況，並給我貧困的家庭實質的幫助。但他們其實並不關心，也不熱衷聆聽我們面對的壓迫。他們從來不問這些壓迫。當他們在拜訪共產國，上臺講道時，他們會仔細推敲每一個字，避免開罪接待他們的共產黨人。

這原沒有什麼問題。在教會歷史中，領袖們面對逼迫時，總有不同的態度。每個人都面對這樣的問題：「當狼群又多又強時，眼巴巴的看狼群吞食所有的羊，是否明智？與其英勇犧牲，讓整個教會都被壓碎，為何不依隨狼群，混在它們之中，與它們一起嚎叫，讓狼羣相信我們也是它們的一份子，好獲得機會，庇護一部分的教會？」許多教會領袖就選擇與敵人和好。我可以保證，羅馬尼亞已故大牧首查士丁（Justinian）和已故信義會主教穆勒（Muller）和阿爾蓋（Argay）都不是叛徒，他們的意圖是最好的。許多浸信會、五旬節派和其他官方牧師也是這樣。

西方教會領袖中，也有許多抱著同樣的心態。神必看他們的心。如果他們的心意是純潔的，他們就會像那些選擇殉道的人一樣，得到主的稱贊。

我毫不懷疑，一些西方的教會領袖的眼睛明亮，曉得真情。但眼瞎的領袖也不少。他們真的上了共

產黨的當。他們只看到一個虛假的俄羅斯、虛假的羅馬尼亞、虛假的紅色中國。當你持旅遊簽證訪問這些監獄國度時，你只能看到共產黨的偽裝。

這些西方領袖訪問赤化的國家時，為什麼不先了解共產的學說？如果他們讀過 Voprosi 哲學著的《哲學問題 Questions of Philosophy》，他們就會清楚地認識到，在共產國家里不可能有宗教自由。這是蘇聯雜誌上的一則報道：「在馬克思和列寧主義中，擁有自由的良心的唯一方法....就是完全否認宗教，擊敗宗教，把宗教在生活中全然排除。」

當時我不知道一些西方教會領袖與我們許多羅馬尼亞官方神父牧師一樣，都在努力舔共，為共產黨效勞。那時我只意識到他們正在與黑暗之子妥協。

另一方面，也有些基督徒甘心冒險，忠於基督。但我不相信他們比妥協的人更好。我們在世上都是彼此不認識的。我必須在不評判他人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立場。我曾在共產主義監獄里呆過，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陰暗一面，那些未曾挨過共產監獄的人，不能明白其中的滋味。我個人是不能與共黨妥協的。

好些國外的教會領袖在獲得允許，到共產國傳道時，竟然沒有帶自己的翻譯員。他們講道時小心不

冒犯黨方。但即使如此，黨方提供的翻譯員卻沒有如實地翻譯給聽眾。他們任意改變西方人講的任何內容。

來訪的基督教領袖只看到了我國美好的外貌。他們沒有看過我國的共產監獄，甚至也不想去參觀監獄。我稀奇為什麼。多年後，當我在南非時，我要求探望被監禁的共產黨人，也就獲得允許。在許多其他西方國家，我也去探望過其中的監獄，看看其中的情形。但那些拜訪共產國的西方教會領袖，卻從來不去監獄看看弟兄們的情況。

我知道，這些領袖們通過妥協，可能獲得共黨的一點小讓步。每一項小讓步對受壓迫的基督徒都是有價值的。但和這些教會領袖們同在一起，我就感覺不自在。他們為這些小讓步付出了太大的代價。教會失去了作為真理支柱的信譽。

回想當我還在羅馬尼亞時，在第二次出獄後，又有西方的牧師到我國拜訪。但這次共產黨卻不允許他們上臺講道。那位英國牧師和一位美國牧師參加一所浸信會的禮拜。他們只能地坐在會眾的長凳上。當局禁止他們開口說話，好像恐怕他們的話含有炸藥。他們試圖拍下會眾的照片，當局也不喜歡，以為違法了。當局允許他們送聖經給神學院的每一位學員。但在他們離開後，當局馬上沒收這些

聖經。一名學生設法將一張紙塞到那位英國牧師手中，上面寫著「當你得平安時，請紀念我」（創世記 40: 14）。

一天下午，我去一所德語的浸信教堂。那位英國牧師斯圖爾（Stuart Harris）當時也在場，他是〈歐洲基督教傳教團〉的主任，後來又擔任〈英國向共產世界宣道會〉的主任。與他同行的還有莫斯利（John Moseley）弟兄，當時他正在〈美國向歐洲宣道會〉工作。他們聽說過我。他們一直在找我，但又不敢問任何人。

禮拜完畢後，我用英語向他們做了自我介紹。環顧四周，我發現我們周圍都是黨方人員，幸好這些黨員們都不懂英語。我想邀請斯圖爾和莫斯利到我家。但我不能直接把地址給他們，因為告密者會看出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我把街名的字母，逐一念出來，當中也故意間隔一會兒。那天晚上，他們就來到我們當時居住的閣樓。第二天我們又見面了。我告訴他們共產國家基督徒的遭遇。於是幫助受迫害聖徒的夢想，不再只是我個人的夢了。其他外國訪客也跟進。

一天下午，我的妻子把我從午睡中叫醒。有五位年輕人來訪，包括美國人、瑞士人和英國人。從那

時起，他們就給我們帶來了通過海關走私的聖經。關於迫害的消息就開始在西方傳播。

1965年12月6日，我的妻子、兒子和我得以離開羅馬尼亞。這一天正是東正教的聖尼古拉節（St Nicholas）。這位聖徒也被稱為《囚犯護衛者》。

羅國警方收到外國為我們一家的五千英鎊贖金。挪威以色列傳道會、希伯來基督教聯盟和我的家人合力出這筆錢。共產國家實行奴隸貿易。他們像賣牛一樣出賣公民。我們的一位老朋友阿努莎（Anutza Moise）夫人為我們的自由，與羅馬尼亞當局談妥這項交易。

第二章

到西方去

美麗的挪威

我們首先去義大利，在那裡我聯繫了日內瓦的信義會總會。然後我們就去巴黎幾天。

從巴黎，我一家三口（包括兒子米海）就飛往挪威。當時我還不知道在我們抵達挪威之前，信義總會已經發出電報，通知所有的信義會不可讓我講道。他們的意圖是好的：他們擔心如果讓我公開反對共產黨，就可能阻礙將來其他人出國的希望。

但事後證明，這些措施都是杞人憂天。大家都承認，羅馬尼亞基督徒並沒有因為我的佈道和出書而受累。相反的，羅馬尼亞共產黨還因此第一次允許教會在羅國印刷《聖經》。因信基督而被當局監禁的基督徒也日益減少。我們也知道有些羅國基督徒還因我們宣道會給當局的壓力，獲得無罪釋放。

但是，當時來自日內瓦的信義總會領袖們，卻扮演摩西的角色。摩西對紅海的猶太人說：「站住，看主的救恩」（出埃及記 14：13）。但上帝對摩西的話卻是：「叫以色列人往前走！」祂不要摩西站著觀望，而要做點什麼——就如「舉起手，向海伸杖，把水分開」（出 14：15、16）。

但禁令已出，我又如何發聲？《挪威向以色列宣道會》是支付我們的大部分贖金的團體。他們將我們送到了一個極其安靜的療養院。儘管他們的動機是善的，但那個度假屋的安靜孤獨卻讓我想起過去的單獨監禁。我想說話和寫作。我想從屋頂上大聲喊出美麗的地下教會。

即使在今天，幾乎每天晚上，我都會夢見自己在監獄里。我不信我夢中的人離開我們很遠——我相信現實中的人真的出現在夢中，就如真天使出現在約瑟夢中一樣（太 1:20）。在監獄的地下世界中，有英雄，也有被擊垮的信徒；有死在贊美神的歌聲中的，也有因懼怕而成為告密者的。他們每晚都出現在我面前，請求我為他們開聲。

在凌晨 5 點，當自由世界的人還在睡著，我和獄中的眾兄弟姐妹們就被鑼聲吵醒——這是囚犯們開始工作的信號，從中國海到波羅德海，並到多瑙河的數以百萬計的監獄奴隸，就開始奴役了。囚犯的夢是美好的。一整夜你都和你心愛的人在一起，吃得很奢侈；你也可以閱讀聖經，上教堂。但錘子重擊鐵軌的尖銳聲驚醒了眾奴隸。這些蒼白、骯髒的「骷髏」，眼睛周圍有黑圈，而且凹陷。我們彼此都不敢看對方，因為太難看了。我們必須忍受饑餓和毆打，有時在深及膝蓋的積雪中勞作，有時在烈日底下。

我也是他們的一份子。

我也與被關在精神病院的信徒們同在。這些神志清醒的人，因為多方祈禱，就被共產當局當作是瘋子，送往精神病院。黨方把他們捆绑、堵住嘴、蹬踢、然後就是不斷地電擊，直到他們真的瘋了。

地下聖徒之美，在這黑暗的背景中，就格外顯眼。

博魯弟兄（Borushko）深知代價，他在法庭上挑戰法院說：「苦難是基督教的生命線。教會只要受苦就能生存，因為主基督殉難了，祂也要求我們這樣跟隨祂。」另一位基督徒克拉斯（Krasnov-Levitin）弟兄在被監禁八年後寫道：「我未曾在任何地方，比牢中更快樂。。。在監獄，神是如此接近。在那些時候，我請求神說：”我的上帝，請讓這段時間盡可能的延長。這是我一生中最光明的時光。”我在不快樂中找到真快樂，在最糟的囚禁中找到了內心的自由。」

我很想講述一個基督徒孩子的故事。一個無神論者記者問她：「你喜歡圖畫書嗎？」

她回答說：「是的，就是那些講述我們的神如何受苦的圖書。神為我、為你、為所有人受苦。」

當記者給她一本圖書時，她卻拒絕了，說：「這書是不敬神之人寫的。」

「你的鞋子也是不信神之人製造的，但你卻穿著。」

「那就拿去吧！我會像我的神一樣赤腳行走。」

「你會受凍的。赤腳走路也很不舒服。」

孩子回答說：「也許是的。我的神曾經受苦，祂也教導我們受苦。」

我無法保持沉默。

由於疏忽，奧斯陸 (Oslo) 的美國教會沒有收到信義總會的警告。於是我就去这家教堂。1965 年的聖誕節，該教堂的麥牧師 (Rev Myrus Knutson) 聽說有一個奇怪的傢伙正在孩子們的主日學聽課。那是一個衣衫襤褸、面容憔悴的人，可能是從監獄或瘋人院逃出來的。此外，當這名怪人聽到老師向孩子們講述耶穌的故事時，就哭了。有誰聽過在一所像樣的教堂裡，會有人為耶穌釘十字架而哭的？

麥牧師就把我叫去他的辦公室。他要我陳述我的背景。聽完之後，他大感興趣。第二天他就到以色列駐挪威的辦事處，查看事實。果然有一位魏恩波在共產監獄里度過十四年嗎？得到證實後，他要求

辦事處指出我的照片。辦事處的牆上有我的相片，但與現今的我完全不同，我的外貌變了很多。麥牧師却堅持尋找能認出我的人。他通過美國大使館的關係，直接向羅馬尼亞當局詢問我的情況。羅國的答覆是肯定的。

那時開始，自由世界的第一個教堂講壇就交給我使用，我每個星期天都在那裡講道。同時我也繼續在美軍教堂講道。那兒的牧師是卡修上校（Colonel Cassius Sturdy）。

那些首次聽到我資訊的人，就開始意識到一些新事物，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些過去曾有價值的事物，如今重新露面。

聖保羅到帖撒羅尼迦傳道。他講說「基督必須受難」（使徒行傳 17: 3）。他的聽眾正確地評論說，這信息將會「攪亂天下」（第 6 節）。猶太人期望彌賽亞是一位最優秀的人，一位來自天堂的使者，祂將使正義在地上獲勝，創建一個理想的世界，也許就如一個理想的聯合國、或世界基督教聯合會，或梵蒂岡等組織，由所有信基督的人組成，逐步推行社會福音，使天下太平！

早在潘霍華（Bonhoeffer）之前，猶太人已經相信人類已經成熟，肯定會擁抱這樣一個可愛的完人，那將來的「彌賽亞。」

但保羅卻說：「不，愛與真理的化身必須受死。」連所有跟隨這彌賽亞的人也必須受迫害。

我展示世界三分之一地區的逼迫，世界其餘的地區也受威脅。前景是黯淡的。教會必須受苦，「獸獲得能力，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啟13.7）。聖徒唯一的希望是分享基督的經歷，就是基督的死裡復活。

我的聽眾們常會遇到外來講員，在他們的教堂里證道。他們習慣在禮拜結束後，對講員說，「我們很享受你的講章，真的很動聽。」但我的講章卻令他們哭泣。

談到基督在祂神秘的身體（祂教會）中遭受的新苦難，我不得不說出令祂受苦的是誰。我指出了一種政权。於是就有人指控我說：「魏恩波在教堂里談政治」。

參加美軍教會的，包括許多美國大使館的職員。他們的工作就是處理外交與政治。他們不希望周日也會聽到有關於政治。可是我的講章卻常提政治。

從那時起，人們就爭論這話題。聖經有些書卷，完全談政治；就如《俄巴底亞書》和《以斯帖記》。以斯帖記甚至一次也不提神的名號。真正的

講道涵蓋生活的各層面。在講道中避免講政治是錯誤的。

但總的來說，眾教會都給我大大的歡迎。

第一個宣道會

奧斯陸美國教會有一位英國女士吉爾（Jill Holby）。她把我介紹給大學講師維蒙（Vemund Skard）一家，又安排了一場小聚會，其中一位參與者是退休記者奧弗（Overbye）。奧弗和維蒙都是有毅力的人。他們就給特羅城（Tromso）的主教、多產作家蒙拉（Monrad Norderval）一通電話，說，「我們這裡有來了羅馬尼亞的魏恩波。挪威的眾教會都不讓他上臺講道。因為教牧長警告說，這人可能會顛覆世界！」蒙拉回答：「把他送到我這裡來。」於是我們就去北極圈。特羅城大教堂是第一座讓我上臺的挪威信義會。第二所是挪威五旬節派的菲拉鐵菲大教堂。於是禁令打破了，大多數信義會教堂都開門了。《挪威向鐵幕的宣道會》隨即成立。這是我們在西歐首先成立的宣道會。

至於穿針引線的吉爾姐妹，她立刻就獲得神的報酬。因為直到那時，她四歲的兒子完全不能說話，

現在卻開口了！他可以說：「理查魏恩波，哈利路亞！」在這以前，說「早安」也太難了。

媒體也開始卷入。採訪引起了轟動。不久後，幾乎沒有一家報紙不刊登有關共產黨暴行的。

我受邀與北約的官員們交流。北約沒有任何特別政治的意圖。但華沙組織的共產諸國卻有一個明確的宗旨，就是要全球共產化。我只告訴北約官員們有關羅馬尼亞共產黨對地下教會的迫害。

在問答環節中，一位美國高級官員問我，為何民主和共產不能和平共處。由於我站得離他很近，我就利用多年與扒手相處的經驗，從容地偷走了他的錢包。然後我舉起這錢包，問他說：「現在你是否願意與我和平共處？」

「把錢包還給我！」

「那麼你就有了剛才問題的答案。」

也許有人會說，歹徒並沒有傷害員警。他們只是想保留他們偷來的東西。如果警方允許他們，他們就絕不會傷害員警。當黑幫變得富有時，他們會變得非常慷慨。他們會給餐館的服務員許多小費，也給朋友昂貴的禮物，甚至為慈善組織捐出大款。他們只要警方不干涉他們，他們就最樂意與警方和平共處。

共產政權就如這些「愛好和平的歹徒」。紅色中國強佔了西藏。「漢人常用的酷刑是強迫西藏男人赤身站著，然後用石頭砸他們，或者強逼他們吃人糞。其他暴行包括活埋或利用囚犯作為打靶練習。佛教僧侶被迫像動物一樣爬行，同時背誦藏經的祈禱文」（西藏通訊社，1975年7月）。我們如果能容許中共繼續這種事，中共就很樂意與我們說溫和的話。

紅色中國覬覦整個亞洲；蘇聯已經奴役了半個歐洲以及非洲的部分地區。目前共產黨人向西方示好。

當然，條件是他們不需要歸還他們偷去的東西。

這些北約官員籌了一筆錢，好送我與妻兒到美國去。我兒子米海不能在羅馬尼亞完成學業，便希望能在巴黎進修信義神學院的神學博士。

但去美國的旅程還未能立刻成行，於是克牧師（Knutson）就先安排我在歐洲的巡回演讲。挪威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索爾（Solheim）牧師曾是挪威派往羅馬尼亞的猶太宣道會的總幹事，他曾對我說，「挪威是世上最美麗的國家。」當時我反對說，「摩西稱巴勒斯坦是頂好的。」索爾回答說：「沒錯，摩西的確那樣說。那是因為摩西沒有見過挪威。」現在我同意他的觀點。

我對挪威的基督教也有很高的評價。所有德國信義主義主教們無一例外地都高喊「希特勒萬歲」。挪威信義主義主教卻幾乎沒有一人这样做。除了零星的例外，全體神職人員都勇敢地反對納粹主義，儘管這意味入獄。挪威信義會是第一個抗議共產迫害的大教會。挪威國會也是世界上第一個通過這種決議的國會。

我在挪威的教會度過了許多美好的時光。挪威教會在国外的傳教士，與國內牧師一樣多。這是世界各國未曾出現的情形。

英國問題

接下來我們去了英國。在那裡我們遇到了哈里斯（Harris）一家，他們原是《歐洲基督教宣道會》的一個分支，首先開始到共產國家秘密傳教。隨著我們活動的擴展，就到中國和其他共產國。後來哈里斯牧師就成立《英國向共產世界宣道會》。

最初，我們在主日晚間在一座小型浸信會教堂舉行聚會。隨著人數的增加，我們就使用更大的教堂和青年會（YMCA）。最後我們使用倫敦最負盛名的皇家阿爾伯（Royal Albert Hall）大廳。

在英國人還沒有帝國之前，就擁有了一個屬靈的帝國。但隨後英國卻在靈裏倒退。早期英國人聖威勒布（St Willerbrord）將基督教引入荷蘭。聖安斯加（St Ansgar）從荷蘭將福音帶到瑞典。

另一位英國人聖伯特利（St Patrick）將基督帶給了愛爾蘭人。聖博尼法（St Boniface）也是一位英國人，他砍倒了條頓人的神聖的橡樹，並在他們中間傳播了福音。

英国一度幾乎統治世界的三分之一，把福音帶到新世界。今天，大多數非洲、亞洲或澳大利亞的基督信仰，要么是由於英国传教士，要么就是因為閱讀了英國聖經公會提供的聖經。

我進監時，大英帝國還完好無損。當我獲釋時，英國已經為自己的帝國挖掘了墳墓——他們給殖民地獨立。結果地圖上出現了好些新國：坦尚尼亞、尚比亞、巴基斯坦、馬來西亞。今天，三十一個非洲國家是獨裁國家，其中七個由共產黨統治。印度在英國統治時，肯定有不公平的現象，但獨立後，數百萬印度國民僅僅因為信奉回教或印度教，就被殺害。另外也有因為種族（如孟加拉人或碧哈里人）而遭殺。在英國統治下，這樣的屠殺是不可能發生的。

英國人是一個帝國民族，沒有帝國就不能滿足。他們必須回到英國作為基督教堡壘的時代，這也是世界自由的堡壘。然後神的光才會再次臨到不列顛群島。據一些傳說，耶穌小時候曾踏足過那裡。如果英國不恢復基督教的理想，她註定會成為共產主義的犧牲品。想到這個我就不寒而慄。《英國向共產世界宣道會》給人看見真相。

英國正陷入嚴重危機中，但她土地上住著一個特異的種族。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證明，英國人在危機中越發勇敢。英國的水手是在沉船時才展示他們的內裏的力量。英國將戰勝她的疾病。

地下教會的場景

當我向英國基督徒講述有關殉道教會時，他們就如各國基督徒一樣，仔細聆聽。我引用了一位無神論講師何利（Klibanov）的話，談及一所地下的聚會。在會後，那牧師問何利，「你想今天有多少人參加聚會？」

何利說：「大約一百人。」

牧師回答道：「這意味你不是我們中間的一份子。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你就曉得，我們只是一個人。基督徒聚會時，無論是兩三個、數百還是數

千人，他們總是一人。你還未能看見真相。如果你能看見，你就會拋下一切與我們合一了。」

這樣的形容地下教會，是最好不過了。這位無神論者的話讓我想起使徒行傳裏說，當時的信徒，都是一心一意的。

我告訴英國聽眾說，俄羅斯有一個地下教會打算為一些信徒施洗。這在俄羅斯是違法的，可能導致監禁。在慎經過深思熟，信徒們決定到市郊的一個養魚場去。他們聽說該處只有一名看守人，而且這位守更人很早就睡覺了。

洗禮后的第二天早上，那位看守人去找當地的蘇聯村委書記：「同志，給我一份新工作。我不會再回魚苗圃了。它晚上鬧鬼。」

「什麼蠢話？共產黨不迷信。世界絕不會鬧鬼！」

「我必須相信我的眼睛。昨晚我看到大約三十個身著白衣的神靈。他們看起來像男人和女人，但他們肯定不屬於這個地球。在月光下，你可以看到他們臉異常的善良和溫柔。他們唱著超凡脫俗的歌。當我們喝醉的時候，我們也在酒吧里唱歌。但我向你保證，他們的歌完全不同。我不知道他們喝了什麼酒。其中一人大聲說話。他是用我們的語言，但

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然後他們逐一浸在水中。當他們從水裡出來時，他們的臉都閃閃發亮。我確信他們是來自天外。我給嚇壞了。」

我又告訴英國信徒一位蘇聯基督徒的話，他剛剛被判處死刑：「我歡喜領受神賜下的各種體形。當我是個嬰兒時，我非常庆幸能得到一個小身體。以後，我成了一個小男童，有小童的活潑身體；再後，我成了少年也很快樂；如今，我非常滿意有成熟男人的身體和頭腦。於是當我的身體歸回塵土，靈魂歸回眾靈之父時，不也該歡喜嗎？」

另一位被判死刑的基督徒，末了的話是：「死亡意味走出一扇門，進入另一扇。」

英國基督徒認真聆聽。我們在英國的宣教工作開始得很好。

初到美國

我乘船前往紐約。我的妻子和兒子後來也跟著去了。

美國基督徒上教堂的人數超過歐洲基督徒：41%的美國人去教堂，而丹麥和西柏林僅有一巴仙，西歐其他各國為2%至5%。任何人都不該嘲笑那些仅

仅會上教堂，做禮拜，然後什麼也不幹的基督徒。對一個膽怯的信徒，上教堂已經是他最大的基督徒見証了。不是每個人都是外向的；也不是每個人都能輕易為基督說話；不是每個人都是戰士。

我們也沒有理由嘲笑掛名的基督徒。如果一個掛名的基督徒希望重新歸回主，他就知道該呼求哪個名字。在土耳其，人們渴慕回歸神時，由於當地沒有基督教，他們就成了忠實的穆斯林。歐美傳教士在土耳其進行了一百多年的宣教，得到的信徒不足一百人。那些知道帶領異教徒得救是多麼困難的，就會同意即使是掛名的基督教徒，也會使真正歸向神變得容易；因此不應該輕視它。

其次，美國基督徒提供八成世界宣教的經費，並六成世界宣教的人員。雖然美國人用於宣道的錢只佔他們收入的一小部分，但總數卻不小。

美國的財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的眼中，幾乎每個美國人都是富翁。我在羅馬尼亞未曾擁有一輛單車（腳踏車）：在美國，即使是最普通的工人也可能擁有一輛汽車，有時甚至是兩輛。在美國的超市，我會從一個攤位走到另一個攤位，並對自己說：「我不需要這個；我需要這個。我不需要那個。」貨架上的所有物品中，99巴仙似乎都是沒必要的。但人生活，不僅需要生活的必須品。

貝多芬和達芬奇的作品都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世上大多數人從未讀過聖依納，聖多瑪斯(St Thomas Aquinas)，或康德(Kant)的著作，但這些作者卻叫我們看見生活的意義與樂趣。上帝也這樣給美國人異常的豐富，讓他們享受。

我不同意一位傳道人的觀點，他說他正在進行另一種鬥爭：就是叫信徒抵擋富裕之魔。我無法理解富裕如何成了這傳教士的敵人。如果他以為富裕就是魔鬼，他便該像亞希希的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放棄財富。對我來說，金錢是中立的。一個人可以把錢奉獻給神，也可以給魔鬼使用。富有的博須(Bossuet)只能在王宮裡感到自在。神能接納他，就如接納一位自我刻苦的基督徒。

但美國的財富也有令人遺憾的地方。

一項調查顯示，在亞利桑那州(Arizona)的圖森市(Tuscon)，只擁有45萬居民。但他們每年丟棄9,500磅完全可以食用的食物，包括生牛排、咬了一口的蘋果、棕壳雞蛋(而非人們喜愛的白壳鸡蛋)等。

在加拿大，數千磅黑線鱈(haddock)被丟棄在船外或使用船舶的研磨機中磨成糊狀，當作垃圾倒掉。有些漁船一次航行，就倒掉100,000磅。這是

因为漁民發現自己捕撈的，已經超過了黑线鱈的國際捕撈配額。

在衣索比亞 (Ethiopia)，我看到饑餓的人們每天步行數英里去獲取由義勇的瑞典傳教士分發的一片麵包和一杯加糖的茶。加拿大政府在設立捕魚配額時是否考慮過這些饑民？

美國基督教教派的分歧也讓我深感困惑。在我國 (羅馬尼亞) 沒有這種事。美國有六種不同的信義會、數十種浸信會和五旬節教派、聯合和非聯合的長老會、聖公會，改革聖公會與保守聖公會等。由於有那麼多的教派可供選擇，人們就尋找一種合乎自己觀點的教會。但對多數人，不太舒服的教會可能更適合打擊他們個人的罪惡傾向，給他們更有益的聖潔聖潔之路，破除他們的惡習。

保守派與現代派

在西方，新教 (基督教) 和天主教都存有保守派與現代派的分歧 (就是原教旨主義與現代主義)。

在羅馬尼亞，我從未聽說過「保守派」這詞。我第一次聽到這詞是在美國的一個問答環節，當時有人問我：「你是保守派？」

我回答說：「不是。」

我當時以為，保守派就是眾多新邪教之一。後來居然有人敲詐我，說要用這個錄音來對付我。我告訴他，「就去幹吧！」

現在我明白了這些術語。

在我看來，西方的保守派太過膚淺。他們說自己相信整本聖經是神的默示，但多數成員都不懂聖經原文。就算一個人懂得原文，依然不足成為真正的保守派。因為希伯來文聖經是用來吟誦的。希伯來文本中的每個單詞不僅有輔音和元音，還有樂符。不同的語境，就不同的樂符。它給我們的心中產生各種共鳴。就如用小調唱出的讚美詩，與大調的讚美詩，效果完全不同。

當聖經翻譯小組（Wycliffe translators）研究墨西哥的馬薩部落（Mazatec）語言時，他們發現這語言的每個音節，用不同的音調，有不同的含意。《水》如果使用另一個音調，就成為《仙人掌》；《褲子》可以變成《葉子》。聖經的希伯來語也是一種音調語言，只是它的不同音調並不改變它的含義，但它改變了這事物與我們靈魂的關係。

於是不認識希伯來文音調的人，就無法完全了解聖言的含義。

當聖保羅在歌羅西書 3: 16 中寫道，我們當用詩歌和頌互相勸戒時，他指的是具有特定曲調的歌曲。

音樂對人的內心有很大的影響。失眠的人需要的不是爵士樂，而是兒歌。通過聆聽勃拉（Brahms）的《第一交響曲》或《上帝是我們堅固的堡壘》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時，我們就不再恐懼。聆聽威廉（William Tell）序曲、羅西尼（Rossini）或《耶穌，我靈魂的良人》就可以緩解精神煩躁。貝多芬的《熱情》（Appassionata）或《奮起，奮起為耶穌》可以使疲憊的靈魂甦醒。醫院已引入音樂療法來治療各種精神失常。

希伯來音調，就像音樂，是按照信息的特殊需要而決定，也取決於聽者的性格，處境，或當時的需要。

耶和華的名，使用不同的音符，諸如「zirka」、「segol」或「munach」（古希伯來樂符名），就對靈魂就有不同的影響；就像教堂的古典讚美詩與黑人靈歌對靈魂有不同的影響一樣。在民數記 8 章 16 節中，神說：「利未人是從以色列人中全然給我的，」希伯來文的直譯是：「利未人給了我，給了我」（netunim, netunim, ׀׀ ׀׀ ׀׀ ׀׀。 ）這「給」字出現二次，這

表明利未人不單在一般的聖所事務上歸神，也在最高的贖罪上獻給神。

基督教如果要保持純正，就必須更猶太化、加上原來的音調才行。

聖經有大量不同文本的事實，證明聖經是神的話。任何原子科學家都會說，物質都是不固定的。它們只是無法確定的概率。我們遇到的每個人也是如此。每個人都帶有任何可能。因為《聖經》是現實生活最完美的表達，所以它必須帶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因此，許多希伯來文都是多意詞。例如，在利未記 5: 19，希伯來語 *asham, asham la-Jehovah* 這也可以被翻譯為：他「在主面前實在是有罪了，」或，他「已經向主完全贖罪了。」神的話給我們不同的意思，好刺激我們的思想。

但這些只是關於聖經原文（也就是原教旨的核心）的解釋。基督教的原教旨派（歸正派，或更正教）其實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他們篤信聖經；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生活在聖言之中。他們與哭泣的人同哭。當他們聽說有人為基督被捆綁時，他們就感到自己也受捆綁。他們最樂意幫助我們。

另一方面，《現代派》對我來說也不夠現代。

自從「聖經批評」興起以來，神學思維就忽視了宗教的一個重要因素：常識。

說謊者不會編造一個與他的意圖相反的故事。猶太人聲稱巴勒斯坦是他們的土地。至今他們依然這樣說。若是如此，為什麼他們自己也會說，他們目前的這塊土地，當初是憑著擊殺外族而奪取的？

騙子們會試圖證明自己出身高貴。可是猶太聖經的作者們卻相反。他們直言自己的王室曾是卑賤人的後代，包括一個職業妓女喇合、一個放蕩的女人塔瑪（tamar），和一個被蔑視的外族女子，摩押人路得。納粹黨人不會說，他們的英雄希特勒的遠祖是一對名叫亞伯拉罕和莎拉的猶太人。相反的，他們會說德意志民族乃是起源於齊格和帕西齊（Siegfrieds and Parsifals）但猶太人卻坦言他們曾當奴隸四百年。

一個新宗教的宣傳者，不會那麼愚蠢地說，他們敬仰的救世主是由一個未婚的女子所生，祂的種族是一種被欺壓的卑族。他們也不會說這救世主的親屬也認為祂有精神病！他們也不會說，這救主的門徒跟了祂三年，還是不了解祂。祂最後死在罪犯中。還有，祂自己的眾門徒也懷疑祂的復活。聖經這樣說，是因為這些都是事實。

稍有常識者，馬上就知道這聖經不是謊言。現代主義者卻以為聖經只是一個捏造的故事。

但神學不是我目前真正關心的。我想說明那些在共產國家受迫害的人。所有現代主義者都參與了《世界基督教協進會，》該協進會支援的不是被共產苦害的基督徒，而是共產遊擊隊。我不能附和他們。

我見過美國主要的反共戰士，也讚賞他們為揭露共產黨伎倆的出色工作。但神並沒有呼召我成為一個激進的反共分子。我覺得這場戰鬥最需要的不是自由戰士，而是聖人。

西方的自由

我很高興可以生活在一個說話自由、寫作自由，行動也自由的西方世界。

但我知道，西方這種脆弱的自由還能持續多久？我們從羅馬尼亞逃到美國；但如果共產黨也接管美國，我們還有何處可逃？

美國有自由，但沒有真正的民主。在大多數民主國家（除了挪威瑞典，英國和瑞士），情況都是這樣。

例如，97%的美國人不積極參與政治。有投票權的人，一半沒有去投票。他們不為任何政黨做出任何貢獻——他們既不出錢，也不參與投票站工作，也不參加選區會議，也不代表任何候選人提供志願服務。他們袖手旁觀，讓其他人完成工作。於是政府的管理權就掌握在3%人口的手中。此外，蓋洛普民意調查發現，57%的美國人無法說出他們的國會議員的名字，81%的人無法列舉那位議員做過的任何事。美國人對演藝人員和足球運動員的了解遠多於他們揀選的國會代表。

遺憾的是，這種冷漠和無知，在美國福音派基督徒中似乎也普遍，儘管他們的祖先是美國政治體系的主要建設者。最近一個財政年度對芝加哥投票習慣的調查顯示，只有17%的新教牧師願意去投票，而酒店老闆99%都去投票。

為什麼我們要堅持美國過去政府架構？那時的美國，人口只有三百万，是一個農業國。那時沒有共產黨的核子威脅。我寧願支援一個只向熱愛自由的人授予自由權的政府。林肯在內戰期間毫不猶豫地暫停了個人的人身保護令，因為當時的叛徒行為若不立刻中止，就要令美國滅亡。

今天西方的叛徒比林肯時代還多。美國應該頒布一項法律，把鼓吹共產主義的人，定為叛國。我們

該給予共產黨人的唯一自由，就是讓他們可以自由移民到任何共產國去，只是不許留在美國。這也該適用於所種族主義者（就如回教極端派）。

共產主義本身

我們再說《耶穌向共產世界的宣道會》如何在美國成立。

我從西海岸到東海岸，到擁擠的信義會講道。我會見了一位美國信義會的主席，他熱情地接待了我，用了二十分鐘的時間向我講述《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從各共產國爭取到的權利。他連一個問題也不問我，就輪到下一位訪客了。

另一位信義會主席是一位傑出的人，他的謙遜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但他認為，共產主義本身並沒有什麼應當反對的，儘管實行它卻是錯誤。這就像說，鼓吹酗酒和娼妓沒問題，只要不開辦酒館或妓院就行了。他也相信基督教會與共產主義之間和平共處是可能的。他在訪問東歐時看到了宗教自由的「證據」，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被誤導。他對我非常友善，為我提供了他教會傳福音事工的一個次要職位。然而，他的教會卻沒有真正的傳福音（該部門不久後就解散了。如果我當時接受，很快

就會失業。) 儘管如此，我仍然感謝這人，他在聽一位朋友提及我的情況后，就親自幫助我離開羅馬尼亞。

至于共產主義本身如何，在柬埔寨就可以看見。當共產接管後，至少有一百萬人被殺，其中包括所有受過任何教育的人，包括十二歲的學童和所有活躍的佛教徒和基督徒。黨方殺人並不用花費子彈，只用棍棒和鏟子砸碎人的頭顱。在越南住了十五年的耶穌會牧師戈梅 (F. Gomey) 報導說，河內的一位共產黨高官告訴他，我「們不承認多元化的異端，因為這意味著分裂和軟弱。我們只關心人民... <人民>就是指那些擁有正確思想的人。但那些思想頑固，如孫主教（當時在監獄裡），永遠不會成為人民... 除非一個人歸心共產主義，否則就不能走出集中營。不歸順者將會消失。」

當神父詢問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宗教自由時，這位官員回答說，「自由是為了給你能自發自動的遵守黨的規則。」這位耶穌會士對這位官員的坦率感到震驚，他說：「我是一個可以離開柬埔寨的外國人。如果我在自由世界告訴人們這些事，肯定是對你們共產黨不利。」但這位黨員回答神父說，「儘管去講吧，沒有人會信你。」

在共產主義埃塞爾比亞 (Ethiopia)，數千人在沒有出庭的情況下被處死。家人可以領取親人的屍體，但他們必須支付子彈的費用：一名官員會計算傷口的數目，然後計算費用。

這就是共產主義的真相。捷克共產黨人杜布 (Dubcek) 所宣稱的具有人性的共產主義，要麼是他個人的幻想，要麼就是他刻意為共產宣傳。「歐洲共產主義」或「民主共產」只是一個騙人的口號。

我們不指望共產黨人有人性。在東南亞和非洲，只要他們腐敗，我們就賄賂他們。有時，僅僅兩百美元的贈品就能救一名囚犯免於死亡。

我是如何出名的

在美國各地的演講中，我一再堅持教會該有專門的預算，支助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屬。還有，教會該在鐵幕後傳福音。其中一個教派領袖告訴我有關他的結論，隨即中止我們的書信來往。他的結論就是：我的理智遲鈍，頭腦混亂。

當然他的診斷十分正確。沒有一個經歷了多年納粹和共產監獄的人，依然能完全清醒正常。有一項

對奧斯維（Auschwitz）集中營受害者進行的調查，證實了這一點。

但我的理性模糊並不能免除那些理性完好的人，不上去救助他們受迫害的弟兄。但這些人卻用我的瘋狂為藉口，逃避他們的責任。

儘管如此，神依然是神。如果開啟宣道會是祂的旨意，那麼祂就會自己開路。

當時我正在費城拜訪一些對我的信息感興趣的人。當時美國正值反越戰的風潮，全城海报都在宣布反戰集會。我很好奇。由於我的英語很差，我便站在講臺的近旁，以便聽清楚講員的每一個字。有一位戴著牧師領子的男人正在發表針對 LBJ 的激烈演講。我不曉得這個 LBJ 就是指約翰生（Johnson）總統，所以我不感興趣。然後他呼籲世界和平，這個我同意。但當他最後讚揚共產主義時，我就耐不住了。我衝上講台，輕易地推開他，因為他個子比我小得多。我抓起麥克風，對大眾說：「你們對共產主義瞭解多少？我獲得共產主義的博士學位。我可以給你們看看我的文憑。」我就把上衣脫去，露出身上的傷疤。

「這些都是共產黨酷刑的痕跡。」

那牧師問我為什麼遭受酷刑。

「假設我是一個殺人犯，」我說。「殺人犯奧斯(Oswald)或魯比(Ruby)有沒有被虐待？殺人犯該受酷刑嗎？」觀眾們喊道：「不，當然不。」我繼續說，「我從未被指控謀殺。我是因為作基督徒，所以受折磨。我和他同樣是牧師。但他卻是一個猶大。他沒有讚揚基督和殉道者，卻讚揚兇手！」當時許多人就向那牧師發出噓聲，有些人大喊「猶大」。然後有人剪斷了麥克風的電線，大會就解散了。

警察包圍了我，押上警車，離開會場。我犯下了兩項違法行為：在公共場合脫衣又擾亂了合法的集會。但當我們轉過街角，脫離了眾人視線後，警察們就與我握手，放我下車，說再會。

第二天，我的照片出現在所有報紙的頭版上。其中一張照片顯示我被員警包圍，並附有標題：「如果肯尼地總統也得到這樣的護駕，就不會被人暗殺了。」

這在費城發生的事，傳到華盛頓。美國參議院小組邀請我向他們的委員會作證。我以為我將會見到幾位人士，可能包括參議員。令我驚訝的是，房間裡擠滿了無數的電視攝像機、廣播公司、世界各地新聞機構的代表、合眾社、美聯社、路透社等。我

一夜之間就聞名於世。佈道和演講的邀請紛至沓來。我那天的證詞記錄就成為政府印刷局的暢銷書之一，又譯成多國語言。這事件引起的公眾關注。於是我就得以成立《向共產世界的宣道會》，實現了監獄里的夢想。

第三章

下一步

美國宗教中的商業主義

但在實現這夢想之前，還需要一段插曲。我必須熟悉美國人的生意頭腦，這種想法在西歐相對少見，在鐵幕後更是未曾聽聞。在鐵幕後，傳教的報酬就是坐牢或死亡。但美國卻正好相反。

當我第一次收到一所大學邀請發表演說時，對方問我要求多少酬金。我回答說：「我只要傳福音，無需酬金。」在我的家鄉，講述基督的報酬是二十五年的監禁。如果你在監獄里傳福音，報酬便是棍打二十五下。於是那所大學取消邀請。他們肯定我是瘋了。

在一個星期天，我要去密歇根州講道。我是一個家庭的客人，他們的女兒正在中學。當這個女孩邀請朋友去聽我的演講會時，那朋友回答說：「什麼？那個白癡？你邀請他到你的家？他曾在我們的

教堂講道。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愚蠢的人。」那女兒就告訴母親，於是她母親非常尷尬，不知道如何接待我，以為我真的是一個白癡。

接下來的星期一早上，我在一個商人早餐會上發表演說。會議開始前，主席就陪同一位男士向我走來。「請不要感到冒犯，」他說。「這位男士說他的名字叫理查·魏恩波，他在共產主義監獄里度過了十四年。這是我們教會開出的一張支票，上面寫著魏恩波的名字。請表明你們的身份。我們希望找出誰是真正的理查·魏恩波。」

我出示了護照，但對方却不能出示。在進一步追問下，他終於承認自己的名字不是魏恩波。當我問他為什麼在支票上籤上我的名字時，他回答說：「你怎麼知道我簽了你的名字？」

「看，」我說。「你簽下了理查·魏恩波。」

那男人平靜地回答。「您肯定不是世界上唯一的理查·魏恩波。我可能是為另一位同名的人代簽呀！」

我很佩服他的回答，但我繼續說道：「你是說，有另一位理查·魏恩波授權你簽下他的名字？」

那男人的回答又沉穩又平靜。「是不是有另一位

理查·魏恩波，授權你調查我？」

警方將他拘留，但當天就釋放了他。那天晚上，他打電話給我，提出了以下建議。

「讓我們談判。美國是一個大國。你不可能到每一處去講述你的經歷。我和你一樣瞭解這一點。我已經聽過你的演講錄音，你可以給我更多的細節。我們可以用兩個理查·魏恩波來劃分州區，覆蓋更多的領域。這種安排自然對我們雙方都有利，我們可以獲得更多捐款。」

當我不接受如此有利可圖的建議時，那個人感到驚訝。

我對這些利用宗教的人心中感歎。他們是宗教商業化的受害者。其中一位與我發生衝突的人告訴我說，他來自一個破碎的家庭，孩子們是父母倆的中間人，也是父母彼此撒謊的傳話人。他是在一個教會裡長大的，那裡有很多「哈利路亞」的讚美，但真教導卻少。在這種氛圍中，人們介紹宗教，就如介紹一種商品。這人從小就觀察到牧師們爭奪金錢，毫不掩飾的不誠實行為。他的宗教導師完全不像一個聖人，不能叫他心生敬畏。

作為一個年輕人，他也知道在共產國家裡的基督教工作必須使用地下的手段。不幸的是美國人不會

支援這樣的活動。但他發現，如果他捏造四百位不存在的傳教士，並要求眾人的支持，他就會得到。美國人簡直好像喜歡被愚弄一樣。我記得他有一次告訴我，「謊言越大，人們就越容易相信。」事實也常如此。於是他就按照這一原則行事。我對他沒有怨恨。

十五年

當我們自己開始傳教工作時，它首先是作為《歐洲基督教傳教團的美國分會》。後來稱為《耶穌向共

產世界宣道會 Jesus to the Communist World》。1980年12月6日，是我們來到西方的十五周年；1982年5月3日，則是美國《耶穌向共產世界宣道會》成立的十五周年。

日曆中記錄了我在西方的十五年。同樣的，日曆也記錄了我在祖國（羅馬尼亞）的十四年監禁。但

時間具有多種品質。一位美國朋友告訴我，他活過的最長的一段時間是二戰期間的五分鐘交火。當時他正在生死搏鬥中。那一天就成了他一生中揮之不去的時光。雖然那日只是日曆上的一天。

沒有人知道時間的真相。時鐘和日曆只能測量時間的數量。它們不能估計它的品質。時間是實質，但它是什麼東西的實質？

自由世界的十年並不同於沙皇時代的十年牢獄。當時囚犯必需花費一年多，才能徒步穿越西伯利亞的數千英里。而美國的宇航員只消四十秒就能完成同樣的距離。

據說托斯卡（Toscanini）曾問愛因斯坦：「請解釋你寫及的時間相對論？」愛因斯坦回答說：「我們在晚餐時才談那問題。在那之前，請你向我解釋一下有關莫札特的交響曲？」

「你必須親自聽它。」托斯卡說。

「嗯，」愛因斯坦回答道，「時間也是。你必須自己經歷它。」

《耶穌向共產世界》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宣教會。它擴大到包括五十個國家。第一年的收入為50,000英鎊。現在已經超過三百萬了。

這快速增長的因素之一，是我家庭的支持。我妻子一直和我同工。她的講道，常叫聽的人感動流淚。

創世記 22：6 中寫道：亞伯拉罕和以撒「二人同行。」我和兒子米海也是。儘管人人都說米海是一個糟糕的副駕駛，但在業務管理，他卻異常出色。

他夜以繼日地工作，沒有休假。他包攬了所有的行政工作。他說明在各大洲建立支部。他到西方十五

年，就獲得了三個學位——神學、心理學和法律。

神又賜給他一位賢內助，一位以色列基督徒朱迪（Judith）。她就如《塔木德》（Talmud）寫的：一位拉比說，神「在六天內，創造了天地。第七天就休息

了。」另一位就問：「那麼第七天神做什麼？」。答案是：「匹配情侶。」我兒子的婚姻正是神的匹配。

這媳婦就成了道地的傳教士太太，絕無埋怨。

第二個恩典，神給我的書安排了一個好編輯。我寫的英語，其實不是我思考時使用的語言。艾伦

(Ellen Oblander) 溫柔地糾正了我粗糙的英語。

第三個恩典是得到一位忠誠的出版商愛德華

(Edward England)。我的書《為主受苦》得以用五十六種語言發行了數百萬冊。其他書籍也連續推出。

使命擴大

在辛巴威(Zimbabwe)，一位母親向她九歲的兒子朗讀了《為主受苦》的部分內容。那男孩就写信給我，要求我也在辛巴威成了一個宣道會。他說他自願作該支會的大將軍。我給這男孩寫了一封冗長的回

信，不久之後他的母親沃德女士(Ward)就成為了我們辛巴威的主任。

不久後，我就到辛巴威第二大城市布拉瓦（Bulawayo）傳道。這是一次大型會議，白人和黑人都參加了。

该市的市长是一位猶太人。他戴着金链出来歡迎我。這是英國統治時的傳統。大會的贊美詩，便是「你們是神的選民以色列；你們是得贖的百姓」。那裡的基督徒，無論黑人還是白人，都認為自己是以色列族，儘管市長一直表示只有猶太人才是以色列人。於是我必須在講道中解釋。

在英國的一次聚會中，我遇見了一位南非弟兄帕特（Pat Henegan），他對東歐的基督教事工甚感興趣。他邀請我到南非去講道。在左翰堡（Johannesburg）有一萬五千人的聚會。其他城市也有特大型的聚會。我多次再臨南非。

帕特弟兄就成為我們在該國宣道支部的主任。我們的宣道會通訊使用非洲的二十三種語言出版，我的書《為主受苦》也譯成斯瓦語（Swahili）和紹納語（Shona）。

南非宣道會起初只關注俄羅斯和紅色中國。但很快共產主義就來到了南非邊境。於是南非也印刷大量

基督教讀物，私運到安哥拉和莫三比克。莫三比克

廣播電臺抗議說恩科河（Enkomati）被基督教「反革命」的讀物污染了。因為我們把讀物密封在

膠袋，利用河流傳送。

當荷蘭被納粹佔領時，荷蘭地下抵抗組織安置了一名成員滲透到蓋世太保之中。他贏得納粹的信

任，就得以通知荷蘭人預先諒得納粹的許多決定，因此救了許多性命。當盟軍解放荷蘭時，他們逮捕所有的納粹走狗，連這義士也一同抓去了。這義士受了數月的虐待後，才成功證明自己的身份，獲得平反和勳章，過後又成了一名牧師。但他無辜的痛苦在他的靈魂中卻留下深深的印記。

他读了《為主受苦》後，立刻寄給遠在加拿大的女婿，請他為俄羅斯的受難者做點什麼。那女婿就與一些人在加拿大創建了我們的支會。我經常在加拿大的天主教會，聖公會，自由教會和大學講道。領導我們加拿大支部的，是內莉姐妹(Nellie Brobell)和克拉斯弟兄(Klaas Brobell)。

這名荷蘭愛國者並沒有在荷蘭帶領我們的荷蘭支會，因為已經有馬里斯（Maris）弟弟帶領了。馬里斯曾把我在美國參議院小組聽證會的供詞，翻譯成荷蘭語。後來他也翻譯了我其餘的書。他的妻子如今已經去世。她曾給我們大力的協助。

當我妻子的一位獄友科萊（Coletta Grossu）姐妹得以與丈夫塞爾（Sergiu）一起離開羅馬尼亞後，她就成為我們的法國支會主任。另一位協助這事工的朋友是愛麗絲（Alice Panaidor），她曾在我們被監禁期間照顧我的兒子，後來她自己也入獄了五年。科萊和愛麗絲一起在巴黎和其他城市組織了大型布道會。我們分發了大量的書籍，為鐵幕後面的基督徒提供了很多幫助。科萊還寫了一本出色的書，《監獄真有福，Blessed Be Thou, Prison》。

有人建議我不要在法國開發一個宣道會。他們說，法國只有天主教徒和共產黨，沒有人會支持一個新教的宣道會。但事實證明，這警告並不正確。

法國的新教徒果然很少。巴黎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七分之一的法國人能說出四福音之一；每二十四人中，才有一人曾經翻閱過一本聖經。只有二巴仙的法國人自稱與新教有聯系。自稱為福音派的，僅佔總人口的 0.4%。但我們並不是為了辯論

四百年前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的分歧。我們的目標是協助受害的基督徒——包括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我們也沒有忘記共產黨本身——我們也向他們表達愛。今天，我們法國的宣道會正在蓬勃發展。

奧斯特（Ostermoor）弟兄是一位在巴西的德國傳教士。他從親戚得到一本《為主受苦》。他今年七十八歲，卻依然能領導我們在巴西的宣道會。當《為主受苦》譯成葡萄牙語后，巴西全國電視就加以報導。

牛頓（Newton）和烏莫魯（Umoru）兄弟在尼日利亞組織了我們的支會。扎伊爾，上沃尔特，貝寧，贊比亞也有了我們的宣道會。

在德國，一群修女在日常靈修中讀過《為主受苦》後，就安排給我一次講道，可是隨後她們就取消了。因為她們讀到我第二本書《神的地下教會》，就感到震驚。在這書中，我講述了我如何在監獄里揭露了一位共產奸細的面具。這奸細暗中向獄方舉報，導致其他患有肺結核的囚犯被迫在隆冬，赤身站在冰冷潮濕的混凝土上。我就不縱容他。又有一次，我展示有時愛必需先於真理。我談及我如何愚弄審訊者以拯救一些弟兄免於被捕。這肯定讓修女們感到困惑。因為她們寫了一封憤怒的信給我，並警告其他人不可邀請我演講。（她們以

為，耶穌說愛敵人，就是協助敵人苦害我們的弟兄？）

儘管如此，我依然得以在德國傳道。有重要的人物到會，其中一些人決定建立德國的支會。當我們返回美國時，我們得知德國肯定出現了一些問題：這支會收到郵件，無人理會，都堆積在郵局。捐款人也沒有得到收據。我妻子就回到德國，找那位新成立的支會主席。那人不在家，但他的妻子告訴薩賓娜，「共產黨隨時可能接管西德，我不希望我的丈夫被絞死。我已經禁止他參與這些宣道事務了。」大多數德國基督徒在過去都不反抗希特勒的命令，如今他們連自己的妻子也不敢違背。德國支會的其他成員也都放棄了自己的承諾。

我們必須做些事。上帝就從意想不到的地方給我們幫助。

德國有一小群信徒，為首的是一位名叫弗里茨

(Fritz Braun) 的傳教士。他仍然相信太陽繞著

地球轉，因為他以為聖經就是這麼說的。他也像路德，不接受哥白尼(Copernicus)的理論。他相信天堂就在我們的正上方，地獄在我們的正下方。他還宣揚歐洲各國就是以色列失落的十個支派。沒有

多少人聽他，但他的行動表明他的心是在正確的位置。

弗里茨一家依然實行普魯士的古老秩序：兒子們即使已經四十歲了，也必需服從父親。弗里茨只須命令他的一個兒子，一位工廠主人，放下一切，接管宣教任務，事情就這樣成就。我們的德國宣道會就成了歐洲最興旺的支會，並擴展到奧地利、瑞士、義大利和西非。它成了我們東歐工作的行動中心。

上帝和魔鬼都以特殊的方式利用瑞士。俄羅斯共產黨是列寧在瑞士創建的。列寧在瑞士會晤俄羅斯的異議人士，一起策劃了推翻沙皇的革命。他們在蘇俄建立共產獨裁後，就擴大到世界的三分之一。

猶太復國運動也始於瑞士。以色列因此得以重返神賜之本土。

在巴塞爾（Basel）的同一個大廳里，猶太復國的創始人赫茨（Theodor Herzl）發表了他的演講。我也在這裏為瑞士支會發言。我們的兄弟漢斯（Hans Zurcher）是創始人之一。這支會以德語、法語和義大利語（瑞士的三種語言）出版讀物。

朱塞約 (Giuseppe Laiso) 曾是義大利共產黨的同情者。在閱讀了我的書並瞭解真相后，他開始我們在義大利的支會。他創建了屬於我們眾支會的廣播電台。恐怖分子摧毀了它。

葡萄牙一度幾乎被共產黨接管了。在最困難的時期，當捍衛基督，反共意味有生命危險時，我們的葡萄牙主任特蘭科 (Trancoso) 弟兄在該國最親共的城鎮巴雷拉 (Barera) 堅持帶領我們的支會。他毫不畏懼在共產黨的眼皮底下出版我們的讀物。

我在葡萄牙的一個禮堂里講道，禮堂里人群過於擁擠，以至當共產黨要上來毆打我時，無法抵達講台。為了完成他們的任務，他們必須先听完我的演講。當他們聽完後，就不再向我動手了。

哈迪納塔 (Hadinata) 姐妹在穆斯林國家印尼組織了我們的宣教活動，並出版了我們印尼語的書。

我去了埃塞俄比亞 (Ehiopia) 和肯亞 (Kenya)，警告所有願意傾聽的人，有關非洲面對共產主義的危險。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德斯 (Addis Ababa)，我得到美國大使和他的妻子的接待，他們向我保證，埃塞俄比亞人非常欽佩美國。這位大使顯然活在睡夢中。不過一年，埃塞俄比亞就被共產黨統治了。蘇聯大使館的人員並沒有在安樂椅上作白日夢。他們為拿下這國作了具體的努力。

我去埃塞俄比亞時還訪問了厄利特（Eritrea）
首

都阿斯馬拉（Asmara），並在那裡舉辦了大型學生聚會。學生的每個問題都顯然傾左。當他們問我有關

南非時，我告訴他們，只要白人統治，南非的黑人就安全，因為白人不會滅絕黑人。但如果由黑人掌權，南非就有危險，因為黑人內部有激烈的衝突。

一年後，厄國開始大規模殺戮。一個周日早上，埃塞俄比亞共產黨軍隊伏擊厄國村莊沃吉（Voki-Deva），射殺了聚集在教堂的所有人。後我在美國遇到了一位參加我在阿斯馬演說會的學生。他還記得我當時的警告。

納拉詹（Narajan Nair）在澳大利亞學習期間讀了我的書《為主受苦》。回到斐濟群島后，他在那里開始傳教，貧窮的當地人現在為共產國家受迫害的信徒們捐款。

澳大利亞的雷斯 (Res Werry) 和梅爾 (Merv Knight) 弟兄受到同一本書的激發，開始了我們在該大陸的支會。

在印度，約伯弟兄 (Brother Job) 受到我們讀物的極大啟發。儘管當時印度是一個獨裁國家，他卻組織了一次有多達八萬人參加的佈道大會。約伯現在領導我們的印度支會，印刷二十多種語言的新聞信與書

本。

這是神的奇迹。我們的印度支會迅速成為印度第二大基督教印刷局，稱為《莎比娜出版社》，它不僅為印度提供讀物，也供應尼泊爾、不丹、西藏、斯里蘭卡，並其他亞洲國。由於印度的印刷成本比任何地方都便宜，《莎比娜出版社》也印製新聞信和基督教書本給尼日利亞、贊比亞、扎伊爾、上沃爾特和其他非洲國。這筆巨額開支很大的一部分是由貧窮的印度基督徒支付的，他們的平均年收入才一百英鎊。我們的印度支會，「行動的愛」是各國《基督向共產世界宣道會》中最大的一個支會。約伯弟兄有一位了不起的妻子——「基督教的特蕾莎修女」。她是一名醫生，卻放棄了外國醫院的高薪職位，到貧民窟做無薪的醫生。

在斯利蘭卡，佩雷拉(Pereira)弟兄放棄了英國聖公會大教堂令人羨慕的職位，到該國貧民窟為我們的宣道會工作。

西方人幾乎都不知道，直到1981年，印度聯邦有三邦是共產黨統治的：喀拉拉(Kerala)、特里普拉(Tripura)並西孟加拉(West Bengal)邦。喀拉拉邦的共產政府在1981年底倒臺，部分的原因是我們在該邦的宣道給人了解共產的真像。

當時我在喀拉拉的阿爾皮(Alepi)講道，這城市被稱為「印度的莫斯科」，因為它是共產主義活動的中心。

大約三萬人聚集在空地上。氣氛很緊張。我們預料會有很多人發出質問，共產黨也有可能發動暴力。我們沒有呼籲警方的保護。

聚會剛開始，就下起大雨。我們聚會場所的附近都下雨了，唯有我們的所在沒有雨。人們都驚訝。當基督徒讚美主時，眾敵人只能目瞪口呆。

在馬來西亞，江牧師(Ronny Kong)擔任銷售基督教書籍。由於他沒有時間閱讀所有他出售的書，他將我的書《為主受苦》分發了好幾年，才有人告

訴他說，這書非常好，於是他也讀。結果他就成立了我們在新馬的支會。

江弟兄在吉隆坡、新加坡和其他遠東城市為我安排了大型聚會。我在各地都適應當地聽者的文化和宗教。在佛教國家我有時會這樣開始：

「我對非常敬佩佛陀，也有幸曉得他的一些生平。當我小時，讀到他講的一則故事，說從前有一位善良的王子，不忍心看到任何人受苦。有一天，他在樹林里發現一隻饑餓的母虎，幼崽就在她身邊，它們也註定要餓死了，因為母虎已經沒有奶汁了。王子不能忍受。老虎雖然兇殘，但畢竟還是一個生物。他就割斷自己的血管，躺在老虎旁邊，等待被吞噬。母老虎果然吃了他。於是獲得生存，也得以給虎子餵奶。王子死了，但這些野獸卻得以生存。

「小時我很想知道這是否只是一個童話故事。我知道許多人是野蠻和殘忍的，像那王子這樣有愛心的人，我卻未曾見過。我很欣賞佛陀的故事，但這樣的善人只存在於文學中。

「多年後，有人給了我一本聖經。在其中我發現了另一個故事；一位和平之君降生於世。這位王子告訴那些像老虎一樣殘忍的人說，你們正在死亡的

邊緣，但只要吃我的身體，喝我的血，你們就能存活。於是人們就殺了祂。從那時起，教會就以祂的肉和血為糧，得享永生。那位天國的太子死了，全世界却因此得救。

「在我信耶穌後，我並沒有忘記這位偉大的東方佛陀。佛陀在天國太子降世的六百年前，已經預知救世主的來臨。」

當我在印度演說時，我就引用了印度教的經典，並其豐富的神話。當我遇到共產黨時，我就引用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這種方法讓許多人接受了我的

信息。

好些人稱我們的宣道會為「魏恩波宣道會」。這

令我不安。這就如保羅和提摩太合寫的《腓利門

書》。這書信雖是二人合著，但它的標題完全忽略了提摩太。《耶穌向共產世界之宣道會》不是我一人

的成果。它是眾同工的。其中包括許多委員、撰稿人、廣播員，信使、印刷員，和祈禱者。由於篇幅有限，我不能逐一寫下貢獻者的名字。

我們開始地下工作

我們開始讓全世界曉得地下教會的存在。我們用五十種語言傳達有關像蘇聯上尉加利羅

(Gavrilov) 那樣的基督教英雄。這名上尉因為組織秘密基督徒軍官團契，並出版團契的刊物而被處決。兩名中尉也與他一起被捕。在自由世界中，基督徒軍官們輕忽這樣的團契。他們不曉得這種自由，是共產國家信徒必付出性命代價的。英國的基督徒軍官聯盟給我請帖，讓我在軍事學院裏自由講道。

隨著多國的支助不斷地湧來，我們得以救濟地下教會。來自古巴的基督教教師安東尼 (Antonio Borro) 曾因信仰而入獄，他向美國觀眾講述了古巴囚犯的待遇。他被關在一個牢房裡，就像一個籠子，只夠他坐著。共黨帶他去審訊的方式是，躺在地面上，用繩子拖著腳去。

當局把硫酸淋在囚犯身上。獄卒們用熱鐵在他們的皮膚印上錘鏟標志，又把他們的頭關在有許多蜜

蜂的盒子裡。在獄中，安東尼看到一些照片，是醫學生正在把活人當作活體解剖。獄方威脅說，除非他承認自己曾做過不道德的行為、又曾為美國中情局效勞、又激烈反共，否則也會被活體解剖。當安東尼終於挨不住酷刑時，他就承認了一切。他懺悔中的唯一真實的部分，就是反共。這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義務。

很少古巴囚犯能逃脫。一位名叫拉梅（Rameiro）的浸信會傳教士因拒絕認罪，就死在古巴監獄中。另一位被共產黨槍殺的少年博伊（Boitel）最後的話是：「基督萬歲！」

現在，通過我們的宣道會，這些烈士的家人就得到幫助。我們利用洋流把基督教小冊漂流到古巴、中國、韓國、阿爾巴尼亞或俄羅斯的海岸。我們已經詳細研究了潮流，知道主能保證它們的成功。我們將福音書或聖經的一部分裝在一個真空密封的小塑膠袋中，並在其中插入塑膠吸管，確保能漂浮。我們又加了一塊糖果或口香糖，在透明的塑膠袋中，這塊糖就能保證成功。這是我兒子的妙方。

紅色中國已經被普世教會遺忘了，但神一定非常愛中國人民。證據就是祂把他們創造了那麼多。在毛澤東統治下，紅色中國的所有教堂都被關閉，一百萬名基督徒被殺，西方教會甚至懶得在祈禱中提

及這些殉道者——諸如文淵、孔、劉令秋、周經澤、董胡恩、方愛石、周福青等。還有陳马可 (Marcus Cheng) 和其他數千人。

我們從佛教最高權威達賴喇嘛得到的資訊，提醒普世教會有關我們在中國遭受苦難的弟兄，並描述了他們受到的待遇。在內蒙古，共產黨人割掉了佛教喇嘛呼魯 (Huh-Lu) 的舌頭。他們砍掉了一名老師薩蘭 (Saranchulu) 雙手的手指，並活活燒死了一位女士諾米 (Nominerdene) 的孩子。另一位老師蒙克比 (Munkbish) 的生殖器和臉部被烙鐵燙傷，以致他瘋了。共黨綁著丹巴 (Damba)、丹拜 (Dambaii) 和丹巴拉 (Dambalah) 的拇指，就把他們整個人吊在樹上，又用沸水澆他們的頭。

當佛教徒受到這樣的對待時，基督徒也不例外。我們終於得以協助這些殉道者的家人並傳達他們的聲音，給生活悠閒的自由世界。

我走遍了各大洲，在無數的電視和廣播節目中露面，接受採訪，佈道，並寫了十二本書，這些書獲得廣泛的翻譯和發行。

我常提醒美國的聽眾，溫思（John Winthrop）在

1630年乘坐阿拉貝號（Arabella），橫渡大西洋，往馬薩州（Massachusetts）時，在甲板上宣告：「我們就如山頂的城，」他說，「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視我們。如果我們在行為上欺騙神，以致祂收回祂的幫助，我們將成為世界的笑話。」

我對德國聽眾提起「祖國」一詞。這詞對他們已經成為禁忌，因為希特勒濫用了它。戰後，德國人民幾乎從他們的詞彙中刪掉了這詞。現在我問他們，「如果一個基督徒連本國人（東德人）也不愛，如何能愛敵人？」

我到處都得到了上帝兒女的熱情支援。但我也遇到了那個稱為「冷漠」的老魔鬼。它確實是一個古老的魔鬼，它曾與眾人一起坐在各各他山上說：「且等著，看。。。」

對苦難的冷漠和麻木不仁是人類的本性，並不是現代人獨有的。我們有時會想，為什麼現代人聽到基督釘十字架的故事，沒有反應。為什麼聽到共產

國家基督徒的苦難，也無動於衷。但在耶穌被釘的山上，很多人都來觀看。當釘子釘入這三人的手腳時，觀眾們可以聽到他們痛苦的呼喊，也知道這三個人中，有一個最好的人。有誰會在自己大受痛苦時，還為折磨他的人祈禱？還留意引領一個強盜歸回神？如今這耶穌絕望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為什麼離棄我？」

人們互相點頭說：「且等著看。」他們甚至沒有想到減輕他的痛苦。沒有人給他送水，也沒有人對他說一句同情的話。他們倒說：「且看以利亞會不會來救他。」

回顧歷史，我們發現今天的世人越是冷漠。我們正接近主所說的午夜。那時會有另一個聲音說：「看哪，新郎來了，你們出去迎接祂」（太 25:6）。那時就是連等待祂的童貞靈魂也會沉睡。少數依然警醒的人，是那些宣佈祂到來的人。

午夜是地球的一部分距離太陽最遠的地方。屬靈的午夜也是人與神距離最遠的季節。我們正在接近午夜並其中驚恐。但午夜對神的孩子卻是一個好消息。因為在午夜，埃及長子們都死了，選民卻得自由。

主說：「夜晚一到，就無人能作工了」（約翰福音 9:4）；但我們知道，當聖經宣布某事不可能

時，只是指對世人不可能。信徒却是例外。因為耶穌宣稱：「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馬可福音 9：23）。上帝的子民常在午夜完成他們最大的工。參孫在午夜拆毀加沙城門（士師記 16：3）。路得在午夜獲得波阿斯的應許說：「你所求的，我都為你成就」（路得記 3：11）。在午夜，保羅和西拉贏得了腓立比的獄卒（使徒行傳 16：25）。詩篇作者說，「半夜我要起來稱謝你」（詩篇 119：62）。

我們的使命是努力喚醒那些只因是夜晚而入睡的人，以及那些被共產黨哄睡的人。西方世界的沉睡，原來有許多是被敵人誘导入睡的。毛泽东写道：「為了勝利，我們盡力封住敵人的耳目；使他又瞎又聾。」

正如我們有時必須狠狠地戳某人的肋骨，才能喚醒他。我們也必須戳整個國家的肋骨。俄羅斯著名基督教作家陀思妥(Dostoyevski)說，當一個偉大的民族不再相信自己擁有真理，就是能復興和救贖萬民的真理時，「這民族馬上就立刻變成一種自私的種族，不再偉大了。」

西方人如果真的相信自己擁有真理，擁有基督教，並自由，就必需在他們的生活中活出真價值來！

尼克孫在 1964 年 2 月號的《讀者文摘》中寫道：「美國必需給共產世界帶來自由。。。這是我們国际談判的第一目标。」但当他当选总统後，就忘了這一切。

維多利亞女王表示，英國的力量源於對聖經的忠誠。只要英國人继续信聖經，他們就會继续有一個帝國。但當英人放棄聖經後，也必丢失她們的帝國。不久之後，她們可能連大不列顛也會丢了。

我們的使命，是叫西方人重歸基督，並給他們曉得關乎他們生死的信息；同時也為被奴役的弟兄們爭取自由。

神聖的例子

沒有什麼比神聖的榜樣更能叫人成聖了。在我們的講座中，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講述了地下基督徒和他們孩子的英勇行為。

俄羅斯共產雜誌《Naukai Religia》報導，在布爾尼村，一位老師在黑板上寫下「沒有神」，並吩咐孩子們讀出來。一個女孩舉手起立說：「有

神。」那雜誌又說，孩子們給這位老師講了浪子的比喻。過後那位女教師抱怨說，她的學生們都是信徒的孩子——經過六十年的共產主義恐怖，所有學生依然是基督徒！儘管他們的父母遭到監禁和殺害。這位無神信仰的老師曾經舉辦了一個無神的慶祝節日，但沒有一個孩子來。記者也抱怨說，這些孩子們每天禱告的時間，長達兩三小時。

即使是西方的信徒也會以為這種禱告「太長了」。但西方孩子用多少時間看電視？

烏克蘭的《真理報》稱，該報駐基輔地區的記者拜訪了一位名叫尼古拉（Nikolaie Riaboi）的浸信會牧師的家。這位牧師的太太拒絕在集體農場工作。她說：「我和我的家都侍奉主。」她接著告訴記者說，基督是她丈夫的頭領，她丈夫則是她的主人。她認為不順從丈夫是一種大罪，所以她拒絕在農場工作，因為丈夫沒有吩咐她幹那種事。那農場屬於無神的共產黨。

同村的年輕信徒告訴記者：「我們生活在希望中，希望幸福的時刻必然會到來，那時我們將脫離肉體，穿上了新的天體，不再有任何誘惑或罪惡。那時我們就進入天堂。」因此他們避免與村裡不信的人交往，也拒絕與非信徒結婚。

同一篇文章描述了在克里村（Kriivaia）教堂舉行的浸信會聚會。在聚會開始之前，一位無神論煽動者已經在教堂裡談論世俗生活的吸引力。他發表了關於基輔新表演場所和劇院，提及電視、冰上舞蹈等娛樂。但當地信徒却認為這些娛樂對信徒就如毒藥。

在克里村的邊緣，有一座房子，窗戶都掛著黑色的窗簾，看不到里面。在那小房間里，男人和女人都跪在地板上，舉起雙手，閉上眼睛，祈禱和哭泣。這是五旬節信徒們的聚會。該教派屬於當局打壓的非法組織。這些弟兄們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在彼此的家裡祈禱。

地下教會、它的遭受迫害、它堅定的信仰現在已廣為人知。十五年前，当我第一次在西方談及地下教會，許多人都以為我撒謊。

我心靈的痛苦

在《為主受苦》，我提及我在西方的苦難，超過共產的監獄。讓我解釋。在我獲釋後，最初幾年我對新環境感到震驚。有好長的一段時期，我不能控制自己。我的手總會顫抖，又有強烈的不寬容，這給我巨大的擔憂，因為我似乎無法控制它們。多年的監獄生活不僅在我的身體上留下了印記，也在我的靈魂和思想上留下了印記。

我詫異為何一些教會領袖不能理解我的心態。他們似乎完全不曉得，由於我所遭受的洗腦和精神折磨，我不可能擁有完全清醒的頭腦。

我已經經歷了十四年的巴甫洛夫（Pavlovian treatment）折磨。如果你讓一隻狗在受到輕微電擊

時就給它食物，在它有了這個習慣後，卻突然不再給它食物；那狗只能承受一定程度的壓力。以後如果再沒有食物，它就崩潰了。我這些年所承受的就是這種折磨。我們等待每三天的一塊麵包。第三天到了，卻沒有麵包。經過幾個小時的等待，我們輕輕地敲門，幾乎不敢提醒監獄長今天是吃麵包的日子。他卻咒罵說，「你不配吃，」然後反而會打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怎能不崩潰呢？

每隻動物的神經系統，在長期緊張（例如焦急中等待）中都會崩潰。我們一直在等待盟軍來釋放我

們，正如他們在無線電中的多次承諾。我們也一直期待大赦，期待監獄制度得以放寬。我們也徒然等待死亡來結束我們的痛苦。經歷這種折磨的我，怎能成為一位心情愉快，可以輕鬆交流的魏恩波？

任何臨床心理學家都可以通過以下步驟引起狗的思維混亂：首先，他讓狗習慣於看到圓形圖案，就得到食物；看到橢圓形，就被毆打。然後實驗員給狗看見橢圓形，但這橢圓卻逐漸變成圓形。當壓力越發加大時，狗就無法再區分。

我知道基督教是好的，共產主義是壞的。當我來到西方，發現基督教的牧師們與共產黨交好，把共黨當作朋友，同時知道共黨正在我的祖國迫害教會。我就無法平靜。我知道自己正如巴甫洛夫實驗中的狗，在被欺騙後的反應。

那只狗最終會發瘋。它不再能分辨敵友。它甚至會以敵為友，以友為敵。當我發現自己有這樣的反應時，我懇求周圍的人的寬容；我內心還有許多地方需要耶穌的治療。

我意識到我們的大腦是如何運作後，就再不依賴大腦。羅馬尼亞語中的「頭腦」一詞也指「騙子」。於是我依從耶穌的指導，放棄已經混亂了的理性。

西方的新誘惑

如今我在西方，面臨一種全新的誘惑。希伯來書 11：37 中，把「受試探」與被刀殺，鋸死，被石頭打死等，一同排列。這似乎不對稱。試探或誘惑，是指金錢或美色。對於一個本性邪惡的人，這些誘惑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對神的孩子，這些誘惑卻像刀割。

在監獄里的十四年裡我沒有錢。現在，我作為牧師的最低工資，雖然比美國掃街工人的工資還低，但對我卻是巨大的。過去我連自行車也買不起，如今卻能開著自己的汽車到處走。於是金錢成了我一大誘惑。

在監獄的十四年，我幾乎沒見過女人。現在，婦女和少女們圍繞著我，許多都對我充滿了愛和欽

佩。我曾經是一個囚犯，任何人都可以搥我的耳光，向我吐痰。現在卻有文章聲稱我是「最引人注目的傳道人，」又說我是「自從耶穌以來，未曾有人在講道中流露出那麼豐富的愛」。我知道這是過分的讚揚，就像過去在監獄裏的過分蔑視一樣。但這種稱贊卻很叫我心滿意足，成了我的誘惑。這是在監獄中的我絕對無法想象的。

民數記 5 章 12 節說：「若有人的妻子離去，得罪他。」由於「離開」的希伯來語單詞是 listeh（發癲），因此這話也可以譯為「如果有人的妻子發瘋了」。除非一個人發瘋，否則他就不會犯罪。瘋子在人類法庭上總是無罪釋放。神豈不也這樣嗎？在歌羅西書 2 章 13 節的希臘文，是：「他寬恕我們的過犯（原文：祂寬恕我們的發癲）。」

儘管這些年來我在很多方面犯了罪，但我相信基督的寬恕，也相信那些我傷害之人的寬恕。

我正在與一個狡猾而無恥的敵人（撒旦）作戰，我不斷受到誘惑。撒旦試圖引誘我模仿它的卑劣手段。當我們用卑劣的言語回擊敵人時，我們已經成了魔鬼的形象。

我發現自己很難重新適應正常家庭的生活。我的妻子已經習慣了獨立，而我因為在獄中長期必須服從命令，沒有絲毫的喘息，因此強烈渴求管轄他人

的權力。米海已經有自己的獨立性格，不能接受我這一套。他是他母親的寵兒，我只是他腦海中的一個模糊記憶。雖然他從我得到信仰，但也因繼承我的名字而受苦。他的心情肯定很矛盾。可能他會想：爸爸為什麼不逃離本國，好避免連累了自己的兒子？現在我的名字越為世人所知，人們就越發稱他為「魏恩波之子」。但他也是一個有個性的人，希望能成為自己。他很快獲得了三個學位，同時為我們的宣道會努力。他也寫了一本書，又有非凡的管理能力。他不想成為我的翻版。

過去我在獄中，經常與身邊的人激烈爭論。如今

我身旁的，都是兄弟。這也令我難以適應。我的尖銳性格，也叫身邊人難以忍受。我的家人、哈里斯一家和其他密友是首當其沖的。但他們也是給我最多支助的人。在此我向他們深深道歉。

事實證明，成為名人也是一種痛苦。我覺得自己就如盜賊。我談及或寫及人類最美麗的典範、信仰的英雄；並監獄裏的聖徒，但觀眾卻把其中的美德都投射在我身上。他們把我當成聖人！

「不可偷盜」（利 19：11）也意味不可偷取他人的榮耀。各人只該得到自己真實的評價，而不是他人的（如押沙龙盜取父王的榮耀。）

但宣傳我的名字卻符合我們宣道會的利益，特別是在美國。美國的宗教組織最常用的廣告，就是它們的領袖。沒有廣告就意味著沒有捐款，沒有捐款就意味著基督殉道者和家人沒有食物。於是我們不得不使用它。看到我的照片出現在報章電視上，對我是一種痛苦。因為我曉得給我的正確形容，只是「一個可憐的罪人，純是靠恩得救。」

有沒有地下教會？

在教會裏，我遇到反對。當《為主受苦》在德國出版時，福音派信義聯會的外國事務主任寫信給眾牧者，指這書純屬虛構。他們公布，共產諸國沒有人因信仰下獄。其他西方國家也有贊同的聲音。有的教會領袖聲稱自己曾拜訪羅馬尼亞、俄羅斯等地，完全沒有發現地下教會。

如果這些教會領袖在二千年前前往巴勒斯坦，他們也難見到上帝之子。就算他們正式訪問了祭司長，也很難看見耶穌。因為耶穌從來不參加眾祭師舉行的大宴會。可能他們會偶然的看到一些囚犯被帶過聖殿的院子，但這沒有什麼出奇。於是在他們

回國後，就會說神子出現于巴勒斯坦的報道，純是虛構。

如果這些主教們在主升天后不久，就到巴勒斯坦訪問，並與使徒或聖母瑪利亞交談，問他們「耶路撒冷有沒有基督教會？」他們得到的答案必然是「沒有。」因為當時使徒們也不曉得自己就是基督教團體。他們只知道自己是「聖徒」、「上帝的孩子」、「耶穌的門徒」、「相信耶穌是彌賽亞的猶太人」等等。起先的基督徒並不稱自己為基督徒。

今天共產國家的信徒也不知道他們正是國外所謂的地下教會。他們只知道自己正在履行基督徒的職

責。他們聚集在家裡和森林裡，儘管這是被禁止的，他們有秘密印刷店，秘密主日學校，他們的領導人必需躲起來。他們就是地下教會。但他們本身卻

不曉得這名稱。

於是西方主教們不信世界三分之一，有受壓迫的教會。自從索仁尼琴的《古拉島》出版後，人們才曉得真的有地下教會。但在那之前，我們卻必需艱苦的辯護。

我們不得不像薩沃（Savonarola）對基督說的：

「你是我的上司，我的牧師，我的主教，我的教皇。」他完全不理會持有懷疑態度的教會領袖。

世界大會上的衝突

我們與德國支會的布勞恩（Braun）和諾伊（Neureder）一同參加在東京舉行的浸信會世界大會。出席開幕的代表有一萬名，其中美國人占八千人。第二次會議時，大廳幾乎空無一人。原來代表們都被當時在大阪的國際展覽給吸引去了。新聞界幾乎沒有人關注這場基督徒大會。開幕詞說，「我們主張浸式洗禮。」這種信息如何能吸引當地的無神論者、神道教徒和佛教徒？

這場大會以各國的旗幟遊行開始。雖然當時有以色列教會的代表，但卻不得展示以色列國旗，因為蘇聯人不喜歡。所以，儘管救恩來自猶太人，以色列國旗卻被排除在外。捷克的國旗也不能出現。原因是不久前蘇聯才入侵了捷克。許多人仍然記憶猶新，這也會讓蘇聯人尷尬。當時最得敬重的旗幟，

便是蘇聯國旗。但這卻是沾滿了無數殉道者鮮血的旗幟。當時，我一人站出來抗議，結果就被毆打，趕出會場。我可以向所有人保證，這次毆打遠沒有納粹和共產黨的嚴重。那位毆打我的日本牧師很快就獲得莫斯科的邀請，到蘇聯訪問，所有費用都出自蘇聯國庫。

我在日本逗留的結果是，一位名叫八九和的弟兄就帶領我們的《日本向共產世界宣道會》。雖然該國的基督徒人數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

像東京浸信會大會的事件，並沒有使我們喪膽。我們知道大多數浸信會成員全心站在我們一邊；與我們衝突的，只是個別的領導人。歷史告訴我們，當教會遇到大敵時，多數領袖都與當局妥協，只有少數堅持信仰。

我兒子米海和妻子裘蒂也有類似的經歷。當他們參加在德克薩州（Texas）達拉斯城（Dallas）舉行的世界五旬節大會時，發現蘇聯代表團也在場，並且廣受尊敬！然而，就連蘇聯報章也稱五旬節是一門邪教。這派的信徒多遭主流派系的神父，修女，並多位牧師的否認而入獄。那麼這些五旬節的蘇聯代表，是何等人呢？來自何處？顯然他們是蘇聯政府打發來的。索忍尼辛稱他們為”黑暗王子的大使。“

我的孩子們抗議這些共產黨的使者。人們就把我孩子們踢出會場。

第四章

冲突或妥协

一些西方教会领袖妥协

在共產國的天主教會，有些神父與共產當局妥协。他們就是所谓的“和平神父。”這名字取自教皇約翰二十三世所謂的“地球和平。”捷克共产报章《Svobodne Slovo》报道说，這種神父的宗旨与

捷克共產相符。捷克實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教導是必須廢除所有的宗教和道德。

波蘭、羅馬尼亞、立陶宛和捷克的神父們都被迫與共黨妥協。我很了解，當一個人被劫匪用槍指着時，只能交出錢包。但奇怪的是，西方神父並沒有受到任何威脅，卻也妥協了。有誰威脅羅馬教皇？但這教皇卻派遣外交使節卡薩主教（Mgr Casaroli）前往捷克，任命一位名叫弗拉納

（Vrana）的神父為主教。這位神父就是《和平神父運動》的領導人。他曾多次作法院的檢方證人，指控忠實的基督徒。共產黨當局希望這神父成為主教，梵蒂岡就屈服了。梵蒂岡忘了教會自古以來的規定：任何國家干預的任命都是無效的。

天主教陣營中很大一部分人都奉承對共產黨。尼波城（Naples）的報章 Il Mauino 發布了一份來自耶穌會領導層的文件，其中稱贊波蘭共黨在經濟上發展良好。這些耶穌會的教士們卻不提兩位勞動人士，旦澤（Danzig）與斯特丁（Stettin）被殺的消息。這兩人曾說，一個家庭月息四十美元是活不下去的。波蘭第一個被槍殺的女工死時喊着“耶穌！瑪利亞！”但這也沒有感動任何西方耶穌會的領袖。我記得曾在羅馬尼亞監獄里遇到另一種耶穌會士，他們已經準備好接受酷刑，並為他們的信仰而死。

让这些‘和平神父’们继续给上帝糟糠的祭饼：上帝的真孩子们站在我们这一边，给主耶稣最好的服侍，就像神在耶稣受难日，为我们作的一样。

匈牙利主教们决议称，该国名为社会主义，是因为实践公平。他们怎样形容在狱中的天主教同胞？（共党们都吃得肥胖，囚犯们却是皮包骨。）

吉利（Guilio Girardi）神父是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专家之一。当时虽然有 600 名主教的要求谴责共产主义，吉利却不许通过。后来他因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被免职。他曾是神学院的教授。

这头披羊皮的狼终于被人发现了，但为时已晚。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同时也信从马克思主义，正如一个撒旦教徒不可能同时也是基督的门徒。

马克思是一个撒旦教的信徒。在我的《马克思是撒旦教徒吗？》一书中，我从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证明了这個。

如今在眾多神父和牧师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如野火蔓延。西贡（越南）助理大主教邗文順

（Franz Xaver Nguyen Van Thuan）和几位新教领袖都遭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神父、修女和牧师们的谴责，并且入狱。

因信仰基督而坐牢並不令人沮喪；令人沮喪的，是那些譴責你的人竟是你的弟兄。他們曾經与你一起領受聖餐。這些「弟兄們」后来为了取悅撒旦而自吹為「進步派」。

所有共產國的真教會都向《世界基督教協進會》、梵蒂岡、世界浸信會聯盟等發出警告，說不可信任共產當局任命的教會領袖。基督徒們要求公開抗議迫害他們的人。但這要求卻被掩蓋了。

普世教會的許多領袖依然不知道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鴻溝。在共產黨大規模的屠殺曝光後，法國基督教牧師莫利亞（Richard Mollard）還寫道：「我敢希望，由于當今世界社會和政治的演變，法國共產黨將會尊重那些不同意他們的人，實現真正的民主自由。」這就像希望魔鬼會回歸神，或者希望鱷魚會有一天進化成不吃人一樣。

一些牧師神父在西方背叛了基督教，另一些則在共產國裏背叛了基督。許多基督教（新教）領袖就如与天主教徒一樣，生活在幻想中。

我曾經和一位新教主教交談過。他對捷克神學教授赫羅馬（Hromadka）印象深刻。那位教授在西方

巡迴演說時，讚揚共產的自由。後這位主教親自訪問捷克，親眼目睹了這些「自由」。當杜布克

(Dubcek) 推翻諾夫獨裁統治時，捷克曾短暫地嘗試引入人性化的社會主義。當時的共產報章一度獲得一些自由。那時布拉迪城的一家雜誌《文化生活 Cultural Life》1968年5月31日報道說，「我國信義會的活動被當局大大削弱，幾乎已經完全喪失自主權。只有國家任命的人，才能處理教會事務。自1950年以來，我國眾教會都被囚禁。」所以，這位美國主教參觀時，教會還在困鎖中，可是這主教依然看不出當時捷克教會的困境。西方無數的教會領袖也是這樣盲目。

其他自由世界教會領袖乾脆背叛教會。法國新教聯合會發表文告，同情共產革命。他們寫道：「福音的真理... 唯有革命鬥爭，才能勝利。除此之外，別無選擇。」但他們其實不曉得什麼是共產革命。他們還沒有親眼見過。

俄羅斯基督徒卻經歷過共產革命，曉得它的可怕。

美國的俄羅斯東正教會知道皮門 (Pimen) 當選蘇聯東正教長是一場鬧劇。他是共產黨提名的，每個人都知道他的過去。當皮門擔任列寧格勒主教時，當局關閉了他教區的一半教堂，他毫不抗議。

後來，作為科雷馬城（Kolyma）的主教，他暫停了兩位英勇神父的職務，因為他們反對莫斯科教區屈服於無神論政府。這二人就是神父埃什利（Eshliman）和亞庫寧（Yakunin）。當史達林的女兒斯維特（Svetlana Stalina）叛逃時，他稱她為「加略人猶大」。他又在1967年7月2日的《消息報 Izvestia》上報道說，蘇聯從來沒有迫害宗教。

自由世界的東正教和其他西方教會也隨著皮門一同演戲。美國東正教甚至向這個虛假的蘇聯東正教會聲明意圖。

當這新上任的皮門教長在他的加冕典禮上，謊稱烏克蘭希臘天主教徒自願與東正教聯合時，代表教皇的紅衣主教科尼格（Konig）保持沉默。其實科尼

格早就在梵蒂岡見過了烏克蘭樞機主教斯利（Slipji），也知道斯利曾因為反對這種強行的合併，被抓去西伯利亞奴役十八年。這種強行的合併已經害死了許多主教、神父和數千名平信徒。

皮門的理由很簡單：當內夫城（Neftegorsk）信徒建堂的計劃被當局干擾時，信徒們要求皮門協助。皮門回答說：「如果當局不同意開設教堂，意

即神不同意。」一个教會的大領袖說這種沒骨氣的話，是可恥的。

一些教會領袖，口是心非；就如卡列 (Alexander Karev)。這人曾經為了信仰，在共產監獄里度過了多年，後來卻成為蘇聯官方浸信教會的總秘書。但真正的浸信會已經與他斷絕關係。

有些人认为，對已經去世的人，我們不能說任何負面的話。真的嗎？那麼使徒們在猶大上吊後，提及他的背叛，也是冒犯吧？還有，我們也不該在使徒信經裏，每周背誦彼拉多的錯誤。彼拉多不是已經過世多年了嗎？怎麼可以再提他的罪？

但一個人的錯誤，可能在他死亡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大有影響。不指正它，就可能叫多人受害。

這卡列 (Karev) 曾是一名忠實的教會領袖，但在他的後半生，卻不再善良。當他去世時，他正在為浸信會共產官方機關報《Brastskii Vestnik》寫文章。他曾寫道，列寧是一位「人道的社會學家」。他又讚揚列寧的書。儘管這些書充滿了對宗教的仇恨。教會的領袖應該熱愛善良，不是舔共。

俄羅斯共產黨人羅伊 (Roy Medvedev) 所著的《讓歷史來評判》 (Alfred Knopf, 紐約, 1971) 一書描述了蘇聯列寧主義監獄的酷刑。列寧黨徒強

迫無辜者認罪的方法。他們在母親面前殺兒子，迫使母親承認荒謬的罪。共黨又把一位拒絕舉報別人的囚犯，帶到一個陌生人面前，然後對囚犯說，如果他依然拒絕合作，他們就把那陌生人槍殺了。那囚犯以為這只是口頭的威脅，於是不聽。黨方就殺了那人。几天后，他們又這樣殺一人。於是為了挽救第三人，這囚犯就向黨方投降，舉報自己的朋友。這些朋友們就被捕，也被殺害。我還可以舉出其他的例子。

對於許多教會領袖來說，薩沃薩（Savonarola）說的不錯：「我們當代的主教牧師，除了極少數，都只會破壞教會，不能建造基督徒的靈命。」

薩沃還說：「有聲音在喊道：“呼喊吧！”我喊什麼呢？“神職人員，神職人員，神職人員！因為你，才會有風暴。哦，神職人員，你們是罪惡的主因。我必須對你說，滾蛋！你們這該詛咒的教會領袖！你們已經成了無恥的妓女。每個人都知道你們的罪孽。你們成了魔鬼，成了野獸，怪物。經過這些年頭的可耻行為，你們該到地獄里去！”」

我們不要忘記，薩沃本人也曾是一名神父。

薩沃的話既不禮貌也不圓滑，我的也是。我們沒有受命必需對每個人微笑。我們的責任是忠於主。

人們會聽我們嗎？我們不在乎。基督為我們獻出生

命時，沒有得到我們的保證說，我們會回報他的

愛。出於愛，我們也必須呼喊道：「神職人員，神職人員，神職人員！」

發出這樣的呼喊對我又一個巨大的痛苦。

遭受客觀性的束縛

有些人熱愛受迫害的教會，有些人則反對她。還有一類的人，則是那些「客觀」的人。這是一種罪。

一位名叫齊雷（Tsirckidze）的罪犯被關押在蘇聯的迪比利（Tbilisi）監獄。在他的請願書中，他描述了共產黨員警利用酷刑和挑釁的方式從其他

囚犯那裡獲取虛假的自控書、證明他的罪。他承認自己曾親自毆打其他囚犯，甚至把打死了。他又奉命雞奸其他犯人。他和其他受警察雇傭的罪犯就能獲得烈酒、毒品和嫖妓。

為了贏得獄友們的信任，他們冒充反對當局的分
子，不惜自行割腕，最後一刻才獲救。他們又故意犯法，被關在懲罰牢房裡，挨餓，睡在冰冷潮濕的水泥地上，並借著與未來的受害者一起受苦，獲得他們的友誼。然後他們就會開始折磨他們。當你被那些你以為是朋友的人折磨時，那種痛苦可以令你發狂。

這種惡行在共產黨監獄中很常見。我自己在羅馬尼亞監獄里也經歷過。

齊雷的供詞中最有趣的特點之一，是對他們正要酷刑的人使用「物件（object）」一詞。

例如：「特工 Agdgomelashvili 血腥地毆打了物件

伊斯坎（Iskanderashvili）... 特工烏斯毆打了物件古昔（Kuhianidze）。所有牢房裡都傳來毆打聲，監獄里充滿了物件的尖叫聲和哭聲。」

「物件」——這就是共產員警對囚犯的稱呼，這正應驗了列寧的思想：「要煎雞蛋，就不免打破蛋殼；要鋸木，也難免木屑飛揚。為了革命，殺人是免不了的。」列寧不曉得人與其他物件的不同。對他來說，除了他本身，眾敵人都是物件。

共產黨把人降級為研究與實驗的對象。他們也這樣處理國家、種族、黨派、並教會。

一些出現在德國電視連續劇中的前蘇聯囚犯，估計目前被囚的蘇聯政治犯，人數達 120 萬人。其他人則聲稱蘇聯監獄里只有一百名基督徒。哪個數字正確？兩者都不準確。受苦的人不是一個數據，他們就是我。

主耶穌問掃羅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

我？」（使徒行傳 9：4）。大數的掃羅可以如實回答：「我沒有逼迫你；我只是迫害你的門徒。」但耶穌並不分別自己和門徒。祂的每一位弟子就是祂。祂受苦的兄弟姐妹不是祂思想的物件——他們就是祂。他們永遠是主體（祂自己），不是客體（一個對象）。

如果被監禁的基督徒只是物件，那麼無論是幾十萬人還是幾個人，都无所谓。但我們受苦的弟兄卻不是物件，他們是就是我們本身。基督徒「与上帝

的性情有分」（彼得後書 1：4）。教會是耶穌的身體（歌羅西書 1：18）。即使只有一個兄弟坐牢受苦，就是基督受苦。祂就是我，因為「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加拉太書 2：20）。基督是我的真我。我始終是主體，不是客體。

「魏恩波完全否定客觀的理論」，荷蘭刊物《Reformation DagBladet》用大標題這樣寫。它說得對。

把人當作物件是錯的。我們必須站在真理和愛的一邊，不聽敵人的攻擊與譏笑。基督教會是對的。

壓迫它的人是錯的。叛徒並那些向暴君妥協的人也是錯的。是非之間沒有中間地帶。神親自說：「我要使女人的後裔（救主）與蛇的後裔彼此為敵」（創 3：15）。這是敵對——不是和平共處，也不是妥協。也不是任何探討會。

這正是面對共產黨逼迫基督徒應對法。正義必需獲勝。

我們的宣道會履行了每個基督徒反共的基本任務。加州基督教組織的一位領導人宣稱：「我不希望給人們留下一個不良的形象，彷彿我們就是反

蘇聯、反俄羅斯、或反共產主義。」這話錯了！任何不反共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就像任何不反撒旦的人都不是基督徒一樣。馬克思主義是邪惡的，正如我在我的書《馬克思是撒旦門徒嗎？》中所表明。共產主義本質就是邪惡，它不能成為善良。這就如魔鬼不能接受福音一樣。我們的使命是拒絕在一切論及包容共產主義的言論。我們也建議您，在執行正義時，也拒絕這種妥協。

有些基督徒因信仰而入獄。無論是兩個人還是兩百萬人，對我們來說都沒分別，除非是為了給與物質的幫助。他們的痛苦就是我們的痛苦，因為他們與我們原是一體。

如今共產黨不再像過去那樣直接槍斃基督徒。他們把基督徒當作奴隸為他們勞作。一位俄羅斯東正

教牧師在集中營里寫道：「我企圖強迫自己殉難。」

我試探了神。但神在祂不可測的計劃中阻止了我。在蘇俄的奴役營沒有殉道者，至少沒有像古代聖徒一般的殉道。這裡只有共產式的勞作。每個人就像蠟燭一樣逐漸被消耗。過去聖徒殉道後，馬上就進天國。如今的這種奴役，卻是為撒旦效勞。這是最可怕的試探。請為我祈禱，給我脫離心中的絕望。」

「客觀地」說，這是一個蘇聯基督徒的絕望。但它卻也正在折磨我們，企圖搖動我們的信心。我們完全厭惡這種制度（共產）。我們不能迴避而不提它。我們的宣道會沒有時間去談論教會過去的历史細節。當下的緊要工作是給受壓迫的基督徒提供聖經、基督教讀物、廣播、給家屬的救濟。我們最終的目標是使俄羅斯和所有其他共產國家擺脫撒但的統治。因為我們的目標不是「客觀的談論」，而是擊敗敵人，所以我們的宣道，必須激起這場鬥爭的熱情。這原則適用於所有基督教的事工，也適用於所有參與正義事業的人。

各種痛苦

我的另一種痛苦是，許多人以為我反共，其實不然。我雖然討厭共產，但並不是一個反共份子。

基督的誡命「愛你的仇敵，」其實是對我們軟弱本性的一種讓步。因為一個基督徒不該有敵人。基督徒對共黨沒有敵意。基督徒憎惡的是共產黨的思路，並非憎惡共產黨。基督徒瞭解共產黨。愛是凡

事相信（哥林多前書 13:17）。我們明白，生活在某些環境下，一個人只能成為共產黨。

在愛共黨的同時，一個基督徒也必須與共產黨的思路鬥爭。這種鬥爭多方面的。每個人只對自己的戰區負責。

我也只能專注於基督教與共產主義鬥爭的一個領域。這可能使我不能看見人類面對的其餘難題。我驚訝地發現，除了針對共產主義，我對人類其他的許多苦難都漠不關心。我們的責任是與所有善意的人團結一致。各人在生活的各部門，都在盡最大努力實現天國。

共產黨人看不到我愛他們，就像法利賽人看不出耶穌愛他們一樣。共黨給我的公開反擊，與暗中搏鬥，是很正常的。他們的攻擊是銳利的。

蘇聯媒體發表了大量文章評擊我，指責我從事反革命、法西斯的活動（對他們來說任何反共者都是法西斯分子），又聲稱我和妻子經營著一家妓院和九家夜總會。阿爾巴尼亞共產媒體也攻擊我們。當我們從船上投放的福音書，漂浮到他們的海岸時，迪拉那 Tirana 廣播電臺就深感憂慮。西方左翼媒體也加入，甚至一些基督教刊物也發表了反對宣教和反對我的文章。

牆上的字

我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從那裡我看到，那些挑剔我的人，就如向天吐痰的人一樣。他們的痰既不會弄髒天堂，也不會弄髒那些坐在天上的人——而是會掉回來，落在自己的臉上。

作為神的孩子，人們無法傷我。他們給我的痛苦，都會掉回自己的頭上。我們蒙（神）眷愛，不是因為自己有什麼好處，卻單是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只渴望一件事：基督征服共產世界。克爾凱 Kierkegaard 寫道：「當我們專心渴望一件事時，就是清心了。」雖然這不是一個詳盡的定義，但我們正是專心渴望一件事，於是我們就「得以見神。」

有了這保證，我就不怕給反對我的教會領袖們，一個最後的評論。

有一次，當巴比倫國王伯沙撒與他的大臣，貴婦們狂歡時，牆壁上出現了亞拉密 Aramic 的文字。

國王立即召集顧問來前來讀解。但無人能懂。伯沙撒就傳召但以理，向他抱怨說：「我的智慧人和占星家都不能看懂這些文字。」（但 5:15）

那文字是用亞拉密語（Aramaic）寫的，這是猶太人的語言。猶太人是巴比倫帝國中一個重要的少數民族，這個少數民族為這帝國提供了總理和其他重要職位。但巴比倫的智者中沒有一個人費心去學習這民族的語言或宗教。

巴比倫的強大敵人，瑪代與波斯的軍隊，已經圍困該城。那天晚上，伯沙撒國王就被殺，這座大城就落入敵人手中。巴比倫的智者沒有智慧。他們不知道危險迫在眉睫，也無法警告國王。

那些智慧人的無知今天重演。普世教會的重要領袖們有足夠的聰明，曉得如何為自己爭取到領袖的地位與利益，但卻不曉得自己該帶領到基督跟前的羊群，也不曉得基督教面對的共產危機。他們不曉得共產世界發生的事，也不知道自由世界正在發酵著什麼。

對伯沙撒王的警告是一根指頭在牆上寫字。對西方

的警告卻是用血寫的，但我們的智慧人還是看不懂。

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被莫斯科訓練的李·哈威（Lee Harvey Oswald）殺害。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被西爾漢（Sirhan Sirhan）所殺。西爾漢在筆記本上寫道：共產主義是最理想的社會體系。

共產黨煽動的罷工能摧毀全國經濟。但西方教會的智慧人卻難以看見。問你教會的領袖，有沒有研究過馬克思主義和新左派哲學。問他們神學院或聖經學校有沒有提供這門課程。你會發現他們中間，絕大多數不太瞭解馬克思主義，就像巴比倫的智者不懂得亞拉密語一樣。

我無意自誇，但是當 60,000 左翼分子於 1967 年 10 月 21 日在五角大樓遊行時，我是唯一在場向他們談論基督的牧師。我利用一台櫻桃採摘機，在遊行上方三十英尺高的地方，向六萬名被共產黨引入歧途的靈魂宣講。華盛頓的智慧人並不在那裡。

我曾在聖費爾南（San Fernando Valley College）學院，與左派威爾金（Wilkinson）教授辯論。過後二十多名激進的學生公開宣稱接受基督。其中一個人說，「昨天我還在吸食迷幻毒品。以後我不再使用那種東西了。耶穌基督就是我的生命糧！」

當我訪問菲律賓首都奎松市 (Quezon City) 時，我發現大多數學生都是天主教徒，少數是福音派人士，共產黨僅佔最少。但主導群眾的卻是共黨學生。牆上貼滿了列寧和毛澤東的照片和語錄。到處都看不見耶穌的肖像或聖經經文。會議結束時，我撕下了列寧的大幅海報，就如基甸推翻假神巴力的形象。當一些共產黨威脅要毆打我時，基督教學生為我辯護。後來有人告訴我，自從我破壞了列寧海報後，基督徒就得到新的勇氣。

當局可以批評共產主義的青年，也可以逮捕他們，或槍決他們；但我們却可以為基督贏得他們。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許多愛我們的人

在創世記 35: 22 中，我們讀到流便與他父親的妾薛拉同房，原文寫道：「以色列也聽到」。譯文卻寫為「以色列也聽到了它」。在希伯來文，古抄寫家 (Massoretes) 指出「這節經文中間有停頓」。在每個會堂的律法書中，這一句話當中都會留著一個空白，表明邪惡的事不必完全說出。當某些事物令人厭惡時，聖經常會突然中止不言。

為什麼我要舉報所有針對我們的惡行？我們有敵人，這一事實已經是我們的榮譽。蘇聯人拍攝了一部針對我們的電影。他們的媒體也謾罵我們，證明我們的工作有效。美國的一個浸信會宣教部門寫了一封批評我的信，結尾說「魏恩波的聖經滲透了鐵幕。」

另一方面，我們從全世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那裡得到的稱贊，已經給我們足夠的安慰了。

以色列人普遍不喜歡希伯來裔基督徒，但《耶路撒冷郵報》社論卻給我稱許。天主教的主要刊物，梵蒂岡出版的《羅馬教堂觀察者 Osservatore Romano》期刊，給我的著作《神的地下教會》大字稱贊。他們都知道我是新教徒（天主教極少接納新教徒的文章。）

但現在我也該提及許多熱愛我們宣道會的兄弟姐妹。

有一次，在洛杉磯機場，我在報刊亭看見一位水手，就問他是否是基督徒。他回答說：「你在問什麼！我成為基督徒已經六個星期了！你呢？」

「你沒看到我的衣領嗎？」我回答道。「我是牧師。」

那水手卻不理會。「我沒有問你如何謀生。我問你是否相信耶穌基督！」

我說我信主將近四十年了。

他繼續問。「你是怎樣的基督徒？」

「路德會。」

「我不在乎那個。我只想知道您是否是一名關心在共產監獄中受難弟兄的基督徒。」

「你為什麼問我這個？」

那水手激動起來。「你最好讀一本書。我不記得作者的名字了，一個複雜的名字——但標題是《為主受苦》。讀了這書，你會哭泣、祈禱、提供幫助。耶穌說：“當我在監獄時，你來看望我。”如果你忘記了你在監獄裡的弟兄，你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認識寫這本書的人，」我說，「他的妻子和兒子目前正在機場。」

水手要求我介紹，並且很高興見到「那作者」的家人，以至于他完全忘了我。他對我太太說：「很

高興認識你們，我願意捐一百元給你們的工作。」他只是海軍的一名廚師。然後，出乎意料

的，我兒子稱呼我為父親。那人轉向我，「那麼你就是那作者了！」他擁抱了我，大聲說道。「多麼高興啊！我再支援你四十塊錢。」

信徒們有時不遠千里去聽他們在俄羅斯、中國或羅馬尼亞的弟兄們的遭遇。當我在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Helsinki)傳道時，有聽者來自最北端的拉普蘭區(Lapland)。當我在美國的威斯康州(Wisconsin)講道時，一位報紙老闆來自阿拉斯加。他第一次從一位愛斯基摩人那裡聽到有關於我們。那愛斯基摩人又給他一本我的書，就激起他對地下教會的濃厚興趣。

一天晚上，我們很晚才到達南非的一家基督教旅店。我們的車出了點問題。夜班服務員帶我們去了房間，並補充道：「隔壁的房間是免費的，你們不妨隨意使用。」當我推開隔壁的門時，一面鏡子就掉在地上。一位穿著睡衣的女士驚恐地從床上跳下來，說道：「先生你是誰，在這個時刻你來我房間幹嗎？」

「我是魏恩波，」我說，「旅店職員說這房間是空的。」她很高興地握著我的手，說，「太棒了！我已經讀了關於你的一切。很高興見到你！」

她完全忘記了我們見面時的尷尬場面，第二天早上她就捐了好大的一筆錢給我們的宣道會。

瑞典《五旬節日報》報導稱：「魏恩波大聲疾呼，雖然他所說的，不是所有的內容都適合在客廳裡討論，但我們原諒他，因為幾年之內他就教導我們該做的事，就是關注那些不適合所有基督徒圈子中談論的可怕事。」

另一份瑞典報紙（Norra Skane）評論道：在「共產監獄中遭受酷刑的魏恩波在他的《魏恩波書信》一書中表明，被崇拜為神的共產制度是一種怪物。這怪物在這幾十年來一直被殉道者的鮮血所束縛。。魏恩波的書應該成為學校的必讀。」

我們感謝神。我們的使命為地下教會贏得了數百萬朋友。世界上有四十億人口，基督徒佔了四分之一。大多數基督徒、教會領袖和平信徒對我們的需求反應冷漠。即使索忍尼琴的呼聲，他們也聽不見。耶穌也不受自己本國百姓的歡迎。

冷漠來自於我們的內心。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種防禦機制，抵禦一切干擾他的事物。每當我們收到壞消息時，我們本能的第一反應是，『哦，不，這不可能！』當數億無辜者正在遭受暴行，而共產黨政權可能征服自由世界，這種想法太可怕了。原罪在使我們不願意聆聽過去耶穌釘十字架、也不要聽今日共產國信徒的苦難。

支持我們的是神的兒女，他們打開心門，接受主耶穌的信息。我們將繼續努力，叫耶穌成為所有人的王。但這將如何發生，無人曉得。

每一位農夫都在自己的田地上操勞。我們如今得到的是一塊石頭地。我們必須向自由世界傳播主的信息，雖然其中的人心，似乎已經忘了自己受苦的同胞。

第五章

使用一切手段

真假地下教會

我們到處都遇到自稱是全球性的宣教機構。可是一查，就發現共產世界並不在他們的領域中。

我們的使命就填補了這一空白。

我們現在以八十八種語言出版每月通訊。十五年來我出版了十二本書。我的妻子和兒子也各寫了一本書。這些書大部分已經譯成多國語言。我的媳婦最近也出版了一本書——事實上，我們家裡唯一還沒有寫過書的就是我九歲的孫女。

我們與多國地下教會進行了接觸。這總是非常危險的，需要很高的技巧，因為地下教會有真假之分。共產黨也偽造一種地下教會。蘇聯當局已經安排人冒充政治異見者、反共的作家和秘密的宗教活動——所有這些活動都盡可能激發社會動蕩，群眾喧嘩。共黨的目標是麻木西方，他們希望自由世界感到：「無需擔心蘇聯的威脅——蘇聯人自己也動蕩不安。當局甚至無法鎮壓自家的反抗，如何能攻擊我們？」

共黨也利用虛假的地下運動。克拉夫（Kravchenko）是一位著名的蘇聯叛逃者，他寫了一發簡訊《我選擇了自由》，提到他在克麥羅

(Kemerovo) 見過一個秘密的印刷局，印制煽動叛亂和反斯大林的傳單。但這其實是秘密員警的傑作。他們安排即將被處決，或被判無期徒刑的囚犯進行印刷，確保真相不會被揭穿。共黨官員在晚上監督他們印刷。印成的傳單就作為指控無辜者的罪證。

西方一些善意的組織渴望說明共產國受迫害的基督徒。但如果有人未曾學醫，就開始行醫，并自我辯護說「我這樣做是出於善心」，你會怎麼說？

地下工作也是一門科學，需要多年的實踐學習以及與生俱來的天賦。進入共產世界的基督徒宣教士，常會遇到非常熱心的當地基督徒。這些信徒會很興奮的接受走私進來的聖經或書本。他們聰明地談論聖經，他們知道如何祈禱，或是用東正教的方式、或是用天主教、浸信會或五旬節派的方式。有的甚至能證明自己曾經為主受過苦。當這些宣教士回國，很高興本端檢視到了共產國的地下教會；但實際上他們遇到的是秘警人員。這些假信徒要么是曾經研究過神學的共黨，要么就是在酷刑下投降的基督徒。這種失敗的基督徒如今聽從黨的指示，作雙面人。

迪沃 (Divomlikov) 在《叛徒》一本書中提及一位蘇聯東正教主教。他曾是一名秘密員警特工，在二戰期間殺害了不少神父。後來黨方決定，他必須

成為一名神父，而且是一個特別神聖，人人都信任的神父。還有，必須是會友們樂意向他承認他們不會告訴別人的事。當他在神學院時，他非常嚴格地祈禱、禁食，並純潔地生活。當共產黨闖入神學院，試圖充公一些有價值的聖像時，他是唯一捍衛的人。黨員們毆打他，把他的牙齒也踢掉了。當他成為一名牧師后，他組織秘密主日學，並敢於宣講別人不敢講的道。就連一些共產黨的高官也相信他，於是就向他承認自己是信徒。這些人過後就黨方逮捕，有些被槍斃。

東正教會不許已婚牧師成為主教，所以他的同志們就協助他，為他的妻子製造一場致命車禍。那妻子是一個真基督徒，對丈夫沒有絲毫懷疑。於是他就得以被任命為主教。當詩班唱道：「你們眾殉道者啊，請為這位新上任的主教祈禱，使他成為一名名副其實的主教」時，他自娛自樂地想象那些為主殉道的信徒們會如何為他祈禱。他已經協助他們完成為主殉道的心願。

然而，最終，他多年來花費在禱告與讀經的功夫（為了達到破壞教會的目的），卻出人意料地使他真的信了主。

我並不認識那書的作者，但我收到一封認罪的信，來自一位俄羅斯東正教領袖。他被蘇聯委派到

世界基督教協進會。此外，又有一位羅馬尼亞東正教神父，也在被黨方指派到烏薩（Upsala）參與一場基督教會議時，透露他的雙重角色。他也導致我的被捕和定罪。在他臨終前，他承認所有的罪，又要求我的原諒。

在加勒（Gallehue）的《耶穌會士 The Jesuit》一書中，提到了皮尤十二世 Pius XII 擔任教皇時，梵蒂岡在俄羅斯組織秘密天主教會。其中一名成員是共產警方特工。於是數百名天主教徒因此被捕或被殺。

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我無法透露姓名或講述所有情況，但我們有一個共產國家官方東正教教會領導人之一的書面供詞，他受到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和梵蒂岡的高度讚賞。他寫道：「我們正是流氓和出賣者，我們出賣兄弟和父母，我們是沒有良心的人。如果你能，請原諒我們。我們也要生存.....我們真的找不到其他的途徑：存活而又不玷汙自己。我們若不要死亡，唯有作一個壞人.....我們所承受的苦難也許比囚犯還多。他們將帶著殉道者的冠冕回去天家。我們卻將永遠垂頭。為了生活，我們必做卑鄙的事，我們必須承受這種恥辱，直到有人原諒我們.....我們不知道如何協調我們的存活的欲望和為了保持純潔而必需付出的代價。我們沒有勇氣說「不惜一切代價保持純潔」。誠實的代價

對我們是太高了。我們選擇出賣他人的自由，好保存我們自己的自由。我們現在才意識到，重要的不是存活，而是活得正當。」

這些人雖然遭受自己的良心的責備，但在西方卻被視為教會的真領袖。人們都不曉得他們所需要的，是悔改！烏克蘭主教維茨（Bishop Welychkowsky）被捕前一個月，一名蘇聯特工冒充法國遊客，代表西方教會高層，向主教索要有關教會在烏克蘭秘密活動的信息，以便帶回歐洲。這名假代理人出示了偽造的證件，主教就把文字的重要信息給了他。這便解釋了為什麼許多西方基督徒和教會領袖，在拜訪了共產國後，回來就說：“我們沒有地下教會的消息。”共產國教會已經學會了不向外國人透露自己的秘密。

共產黨是欺騙的專家。俄羅斯波斯威克黨（Bolshevik Party），即共產黨前身，其中一位創始人布隆奇（Bronch-Buievich），在書中提到共產黨如何在創黨時就滲入教會，甚至在沙皇時代已經開始了。

羅馬尼亞大使館參贊穆古先生（Mr Murgu）要求一位世界著名的歐洲牧師公開攻擊我，以換取能以羅馬尼亞傳道。大使館答應為他提供攻擊我的材料。共產黨當然能偽造一切文件。這牧師拒絕了。

後來這位牧師訪問羅馬尼亞，當局就逮捕他，再次要求他滲透我們的組織。當他再次拒絕時，共黨就逮捕了當地與他友好的弟兄，以勒索他。

滲透者的身體言語 (Kinesics)

我們毫不懷疑共產黨會派遣滲透者進入我們中間，找出我們的秘密。我們禮貌地接待他們，但不給他們曉得我們知道他們的使命。通常我們反而會得知他們的秘密。

發現這種間諜的原理簡單。人受造不是成為一個叛徒，也不是成為一名罪犯。當一個人作惡時，他的良心總是責備他，以致露出馬腳。這就是犯罪分子常在犯罪現場留下指紋或個人物品的原因。世上沒有不留痕跡的罪犯。

每一個叛徒和滲透者，其實都在大聲宣稱自己是叛徒。只是他們不是用口，而是用肢体的語言（這是一種新興的心理學，稱為 Kinesic 學）。我們必須了解這種語言。

福音書多次提及主耶穌的動作；伸手，舉目，觸摸。身體會說話。手語是人類最古老的交流方式，文字只是補充。肢體語言比口中的言語更能表達人心。

當一個人看到令人興奮的東西時，眼睛的瞳孔就會放大。當男性看到女性裸體時，瞳孔會放大一倍。一個共產國家的真信徒，看到一本《聖經》，瞳孔就擴大。

小偷很少能直視任何人的臉。如果他真的能掌控自己，膽敢直視人，他的眼神就會過度。他目光過於強烈，彷彿在說，“看，我可以直視你呢！”

我曾經看到一個可能是滲透者的人走在街上。他自稱是從共產國的海員，如今逃到加拿大。他說自己過去曾經折磨過基督徒，後來悔改信主。然而，他走路的姿態不像一個背負重擔的人，倒像一個得志的年輕人。他就如知道自己完成了一項了不得的任務。聖經說，亞哈王悔改後，媛媛而行（王上 21:27）。

我認識一個人，他深度參與聖經走私活動。可是當他與人握手時，他總會把對方的手推開，好像在警告對方要防備他。他用這個手勢表達了他的真實情感：「當心我：警察可能在監視。我無法逃脫我必需扮演的角色，但你該自己小心。」

當向一個假裝的門徒宣講福音真理時，可以觀察他的眉毛。一個不信的人，眉毛會不時抬起。在聽道時，一個告密者常會耸肩，意味他內心冷漠。但真信徒卻在聽道中深受感動，不會有那種動作。

人們高興的時候嘴角會揚起，不滿的時候嘴角會下垂。信徒和告密者對同一件事不會有相同的反應。

仔細觀察就能發現。

偽裝基督徒的警方人員常會不敲門而入，或在剛敲門就馬上進入，並不等待房裏的人回應。這是他在職業中養成的習慣。

狗不會親近一個叛徒。

不誠實的人無法忍受貝多芬的音樂，因為太激蕩人心。當這種樂曲響起時，他就要走開。因為這音樂引起他們心靈的不安。

觀察身語是人的必需常識。瞭解這門科學可以使人際關係更加和諧。一個男人說他愛一個女孩，同時左右搖頭，便與他的說法矛盾，除非他是印度人。在印度人，搖頭表示認可。

有些基督徒絕望地問：「共產國有這麼多奸細，怎能工作？」答案是：學習身體言語。但要徹底理解身體的語言，需要大量的經驗。面部的一點扭運動意味許多內情。

地下工作的另一個原則是，總是假定每個人都可能出賣者。地下教會的任何成員都不可完全信任自

己的弟兄。每個人都有可能變成叛徒。殉道者的子女和妻子也不例外，在監獄里度過多年的基督徒也不例外。前面提到的卡列夫（Karev）就是一例。如今教會已經與他斷絕關係。雖然他過去一度為基督入獄。

我們學會了辨別地下教會的真假。

通過適當的預防措施，我們成功地將大量聖經、福音書和其他基督教讀物走私到共產國家。

但這種工作，還是火急需要幹練的工人。不是每個主的工人都是好員工，其中也有壞員工。教會每一種工作崗位都是如此，但在我們的領域更是如此。

共產國的地下宣教不適合業餘愛好者，只適合高度奉獻和訓練有素的人。它的前提是能操外語、了解馬克思主義、知道共產黨警方的手法和保密的規則。像我們這樣的宣道會，汽車和辦事處都可能會被暗中加上竊聽器；電話也是。我們必須對工作人員進行篩選，對辦公室進行檢查，把敏感檔鎖起來。

在共產國工作的一些傳道會常嚴重疏忽。共產黨滲透者不會忽視任何反共組織。

科爾森 (Colson) 在他的書《Born Again 重生》中講述了五角大樓和白宮的秘密檔如何大洩露。各國不稱職的傳道會到共產國家服侍，只會導致蘇聯的兄弟們被捕。

耶利米寫道，「懶惰為耶和行事的，必受咒詛。」（48：10）我們必須像先知一樣嚴厲。我們必須公開反對那些與我們工作相似、但卻辦事馬虎的組織。

正如保羅無法避免與彼得、巴拿巴並馬可發生公開沖突，我們也是。我們知道自己的意圖是正確的。耶穌本人也不得不爭吵。在爭奪愛情中，有時情人之間也會爆發爭吵。

一股基督教讀物進入共產國家

《列寧格勒真理報 Leningradskaia Pravda》寫道，「有一股宗教讀物，正在大量流向我們的國家。」

正如他們所說，這是一條滾滾河流。

原來從信耶穌的人心中，會流出活水的江河！不是小溪。俄羅斯人說這些書本是基督徒帶來的。這

些基督徒偽裝成遊客，承擔所有風險。他們在官方教堂中傳播，有時也秘密地或公開地在街上傳播。

《蘇聯白俄羅斯 Sovietskaia Bielorrussia》報章描述了被監禁的格里金 (Grikin) 如何提醒基督徒們，留心把與國外的通信藏起來，還有來自外國的讀物。

蘇聯雜誌 Voprosi 在列舉宗教持續存在的原因時，列出了基督徒讀物的分佈情況，有些是印刷的，有些是手寫的，一部分是來自國外。在審判蘇聯作家們中，官方指控加蘭 (Galanskov) 在特羅修道院 (Troitska Sergeivska monastery) 遇卡到了一位自稱是娜迪亞 (Nadia) 的外國人，一位非常忠實的基督徒。「納迪亞從國外給加蘭帶來了宗教讀物。」

誰能反駁這事實？這是蘇聯媒體自己承認的。

我們的地下方法有效。神的話語到達鐵幕後面。

《共青團真理報共青團真理》提及一名共產黨科羅 (Korobkov) 曾驚訝的寫道，著名工程師兼詩人瓦倫丁 (Valentin) 秘密受洗，又讓他的幼兒受洗。瓦倫丁去世時，年僅二十九歲。當科羅進入他基督徒好友的房間時，他發現一切都沒有動過。瓦倫丁的福音書攤開著，上面有一個書籤：「凡勞苦擔重

擔的人，到我這裡來，我就叫你們得到安息。」這位基督徒工程師正是因為得到一本走私的聖經，所以找到安息。

一位鐵幕後的信徒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告訴你，昨天我們收到了你的包裹，裡面有非常珍貴的禮物；就是一本我們語言的讚美詩集。我們的家人和教會向您們衷心感謝。這是我們切需的。因為，如你所知，我們這裡沒有新的歌本，舊的也都沒了。目前我們正在抄寫歌曲。我們只能抄歌詞，不能抄樂符，於是各人的唱法都不同。非常多謝你們給的歌集。」

一位同工寫道，「在我的衣物中藏有《聖經》、《新約》等書。在邊境，我裝著最多讀物的手提箱被仔細搜查，但主耶穌肯定閉了警衛的眼睛，因為他們什麼也沒找到。手提箱底鋪滿了《聖經》，上面只蓋了一張紙，但警衛卻看不見。」

莫斯科雜誌《鼓動者 Agitator》報導說：「他們使用反蘇的讀物轟炸我們的國家。有時他們把裝有福音單張的瓶子扔進海里，讓潮流帶到共產國的海岸。有時這些西方人複製蘇聯報章的首頁和第四頁（末頁），而第二頁和第三頁則是反蘇的文章。這種假冒的報章從資本國家送往蘇聯，說是‘退

貨’，理由是『位址不明』。我們的敵人。。。精明又狡猾。」

為了給讀者們了解這種反蘇文學，《鼓動者》講述了這些活動的結果。

「最後，我們看到各宗派的活動。這些教派是狂熱的，不守蘇聯法律。福音派浸信會成員教導人拒絕參與社會生活，違反我國針對迷信的法律。他們努力向孩子們傳授他們的宗教和道德，這些都是外來的東西，不屬於蘇聯公民的。」

共產黨對走私到他們國家的基督教讀物感到憤怒。我們讓蘇聯水手得到了它。雖然這些水手們可能對宗教毫無興趣，他們也會接受。在蘇聯黑市，一本聖經可以賣到十五英鎊。蘇聯人渴求神的話。

別洛夫（Belov）在他的著作《宗教與各種主義的鬥爭中的角色 Religion in the Modern Ideological Struggle》中，描述了莫斯科海關人員埋怨在遊客

身上發現的眾多書本和傳單。有時這些讀物藏在郵寄的包裹中。我們為許多西方人提供蘇聯公民的地址。外交官（有時是共產外交官）、外國導遊等人也會攜帶這些讀物。

當我們仔細閱讀別洛夫的每一個字後，我們高興發現，莫斯科海關人員只發現了幾十本這樣的讀物。我們其餘的數十萬份讀物已經進入蘇聯。我們認為，這幾十本小書小冊，就算是我們該繳納的關稅。

共產黨報《Svet Prace》刊登了捷克一位高級海關的抱怨。他說那麼多的宗教讀物進入他的國家，以至於海關人手不足。共產黨對西方國家突然對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的宗教發生異常的興趣感到驚訝。

「我們海關官員必須毫不妥協地打擊這種宗教讀物，就像打擊走私金幣或藝術品一樣。」（一位英國的教會領袖把聖經走私與酒類走私相提並論。他正是與共產黨同感一靈？）

文章報導，在從維也納(Vienna)開往布拉格(Prague)和卡爾斯(Karlsbad)的巴士線路上，39本宗教書籍被沒收。在巴瓦利(Bavarian)邊境，一組走私者被當局沒收了36本《聖經》和437本宗教書籍。共產黨又從一支瑞典團隊沒收了316本《新約》和數十本其他的基督教書籍。

文章最後這樣寫道：「這些遊客該知道，在捷克邊境，偷運教會讀物是非法的。」

我們並不局限於走私。我們還幫助共產國家信徒建立自己的印刷機——有些是先進的，有些是原始的。

但這依然不足。一些讀物還是必需靠走私。所有的方法和手段都是好的。蘇聯從美國和加拿大進口小麥。一位基督徒在穀物升降機上可以看到這批貨物包含兩種食物：身體和靈魂的食物。蘇聯和其他共產國家從西方購買機器。可是這些機器不總是能工作順暢。因為機械裏面塞滿了聖經。蘇聯和東歐諸國每年有超過六百萬遊客。誰能檢查每輛車的輪胎？或每扇車門沒有雙層？有時海關人員檢查車地板后，發現沒有雙層，就給放行，可是福音書卻藏在車的雙層車頂上。還有，遊客中多有孕婦。但她們懷的卻不是胎兒，而是福音單行本。

我們研究了洋流，確保可以帶福音本沖往中國海岸、或抵達俄羅斯、阿爾巴尼亞和古巴。我們用塑料袋把小冊封密，加上一根吸管，讓它漂浮，又加一塊口香糖，吸引孩子們把它們撿起來。

但走私的聖經會不會被沒收？通常不會。有些果然被官方逮獲了，但沒收的書本也會抵達眾人的手中。共產黨索科（Sokolov）在莫斯科被捕。他是海關人員之一，負責禁止的宗教書籍入境。他沒收

了大量書本後，通過一個秘密銷售網路，賣給那些渴望神聖言的人。

走私聖經是否正當？

在事關我們得救的事宜，神就不把自己約束在人類的粗淺道德上。正常的道德是：如果一個父親讓自己無辜的兒子死去，不值得讚揚。如果這位父親有能力救自己的兒子，卻袖手旁觀，看著他被陷害、受鞭打、又釘在十架上，就更糟。但我們的天父不僅允許自己的兒子死去：而且還「樂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賽 53:10）。為什麼呢？因為這是救世人的唯一方法！於是我們看為可惡的行為，有時可能是最大的愛之行動。

如果神讓自己的兒子為救人而死，我們也就曉得為了救共產國裏的失落靈魂，任何方法都是正當的。於是我們用獨創的方式走私聖經。靈魂的食物比身體的糧食更重要。

但我們真的可以進行走私和撒謊嗎？

在自由國家，基督徒能不能參加警隊，成為情報人員，進入恐怖分子組織、匪幫或販毒集團中擔任卧底？

請問，當他在潛入這些組織時，他是否必須告訴匪類說，他就是警方派來的特工？

還有，基督徒可以從事心理學或社會科學的研究嗎？

研究人員試圖了解，教師的期望會不會影響學生的成績。為此，心理學家告訴十八位小學老師，他們班上的某些孩子會在學業上取得優異成績，而其他孩子則不太可能。他們說，他們根據心理測驗，預測了孩子們的成就。其實，孩子們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但到了年底，研究人員發現，老師們期望能夠成功的孩子比那些不期望成功的孩子得分更高。這實驗證實了一個重要的心理因素：老師對孩子成功的期望有助於孩子進步。但心理學家起先並沒有告訴老師真相。一個道德君子會稱這些心理學家們為騙子。類似的程序也用於雙盲的實驗。這對發現新藥或

新療法的成效至關重要。一位基督徒可以成為商人嗎？他可以使用廣告嗎？他能聲稱他的香水或他的鞋子是最好的嗎？他什麼時候查遍了全世界所有的香水，才發現他的是最好的？但如果不讚揚他的產品，打壓其他的產品，如何作廣告？

耶穌說，祂不僅是真理，也是生命。我們需要真理，也需要生活的必需品。你不能單單求真誠，因

為這樣會危及許多生命。有數億人正在撒旦的共產政權俘虜中，他們需要真光。

如果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需說真話，那麼偷竊也必然錯了。

在莫斯科出現的地下雜誌《青年旗幟 Flag of Youth》講述了西奇姐妹（Sister Sitch）的故事。她的孩子斯拉瓦（Slava）被法院判決從她身邊帶走，因為她教這孩子說，無神論者就是魔鬼之子，並吩咐他在學校反映嘲笑宗教的電影時，閉上眼睛。西奇從無神論寄宿學校「偷帶」自己的孩子出來，把他送到維捷城的弟兄們的家，藏在那裡。鄰居們聽說這是個孤兒。後當局發現這孩子，就把他帶回寄宿學校。但他的母親有時依然成功秘密會見他。

她的第二個孩子也被當局帶走，因為這孩子撕毀了蘇聯的校服小徽章，並告訴老師說，他可憐她，因為她不信上帝，必下地獄。

西奇姐妹偷走自己的孩子有錯嗎？把被共產黨綁架的孩子搶回來算不算是罪？也許共產黨才是強盜。

我很想知道誰才是騙子。偷渡聖經的人算是騙子嗎？還是共產黨？共黨用無神論欺騙人，禁止人閱讀神的話。批評我們的人並不理解真相。

在哥林多前書 9:22 中，保羅說「無論如何，總要救人。」既然是無論如何，誰能吩咐他只有通過「合法」手段，才能傳福音？

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我們的聖經抵達目的地。

你們的支持使聖經得以進入共產國。有時我們在古巴空投讀物。共產的雷達無法探測到與天使同飛的飛機。

當我們聽到投在大海的福音單張小包抵達目的地時，我非常高興。第一個確認是來自蘇聯的德裔弟兄。他們在後來從蘇聯獲得允許移居西德。其中一位告訴我們，他們首先是從廣播中聽到《傳道書》的一句話：「把你的糧扔到水面上，多日後就必有收成。」於是他們就開始沿著海岸觀看。共產黨警察在獲得內奸的通報後，也在海岸等候。但後來這些警員們都疲倦了，就不再等候。我們的弟兄們繼續守望。到了第四天，福音書到來了。弟兄們從白令海岸一直到俄中邊境，盡量收集。

後來迪拉那廣播電臺（Tirana）也開始咒罵我們，證明福音單張已經到達阿爾巴尼亞

(Albania)。最令我們欣喜的是，我們收到了來自紅色中國的第一封信，確認海浪傳送的福音單張已經到達信徒手中。

這就是我最大的欣慰：這本教導如何對同胞有一顆慈悲心、對主有一顆熱心的聖書，已經進入鐵幕國家。

對我們的另一個指責是，有些人因為將神的話走私到共產國家而受苦。許多秘密運輸的人被捕。還有，有些人讀了我們的書而信主後，就因此坐牢，或孩子們被當局帶走。

在過去，主耶穌也有同樣的問題。祂警告門徒說，如果他們跟隨祂的道路，就會受到迫害。祂說：「我派你們如同羊進入狼群。」這意味著必死無疑。祂這樣做對嗎？如果使徒們沒有成為祂的門徒，他們可能會活多三五十年，而且死得安詳。但因著耶穌，這些使徒們几乎都殉道了。

聖保羅知道尼祿皇帝會把基督徒扔給野獸。於是他該不該傳道，帶人信主？

我們的情況是如此。

我們以終極的愛來愛人，就是愛他們的靈魂。神的話語可以永遠的拯救靈魂。少了神的話，靈魂就

失去方向。所以這一切風險都值得。我們必須從地獄搶救靈魂。

對基督徒殉道者家屬的救援工作也大有風險。由於我們採取了許多預防措施，通常進展順利。這裡也可能發生事故。人們可能會因幫助殉道者家屬而入獄。但我們可以因為它有風險，就放棄不幹嗎？

我們不能透露走私工作的更多細節。我祈禱如果我做了任何好事，我的善行的影子與痕跡必需留在後頭，不必人看見。

走私出境

我們不僅走私聖經進入共產國家。我們也把一些讀物從共產國走私出來。許多證實地下教會存在的文件已經抵達西方。

共產黨自己也放棄否認這教會的存在。他們甚至承認它規模龐大。蘇聯作家特普利（Teplianov）在他的書《無神論教育問題 The Problems of Atheist Education》（Voronej 大學出版社）一書中寫道，僅在沃羅地區就有 48 間官方東正教教堂和 482 間地下東正教教堂，還有 23 間「真東正教會，」就是東正教的一個分支。另外還有 8 間官方浸信會和 97 間地下浸信會，1 間官方舊正教會

和 14 間非官方舊正教會等。地下教會的數量是官方教會的十倍。

蘇聯報紙《哈薩克真理報 Kazakhstanskaia Pravda》報導說，蘇聯的弟兄們自行印刷大量的教會書籍。來自阿拉木圖 Alma-Ata 的姐妹 Vershtshaghina 被捕，就是因為在國家印務局印制基督教讚美詩集。其中還有 Maria Pavliutchenko, Valentina Maximova, Tamara Sokova 等人。她們獲得廠長和所有工人的合作、並司機的默許，沒有一人舉報她們。普通蘇聯公民非常同情基督徒，即使他們本身不是信徒。

阿拉木圖的基督徒製作這些讚美詩集，共花費了 10,000 盧布，相當於一名工人 100 個月的工資。在西方相當於 20,000 英鎊。英國有哪一間豪華的教堂可以輕易籌集到這麼一筆錢？蘇聯的基督徒很窮，但他們平均奉獻 40% 的收入給教會。他們從不花錢建造豪華教堂、或制造昂貴的詩班長袍、或禮拜後的咖啡點心等等。他們的一切都是為了傳播福音。按比例來說，他們為傳福音付出的代價遠高於我們西方人。一旦被捕，他們就損失自由，有時也喪命。

上述是蘇聯共黨已經發現的基督徒活動，我們也就報告這麼多。除非‘罪犯’已經被抓獲，否則我

們絕不會道出任何地下教會的活動。但可以肯定地說，共產國家內許多地方都有秘密的教會印刷。參與印刷的人有時必須生活在地下，免得被教會奸細的舉報。他們不能離開地下室，沒有陽光，沒有花朵，連他們自己家人也不曉得他/她們的下落。但為了教會的需要，這些人就放棄自己的自由。

據說西方曾有一間教堂發生火災。觀眾中有一位著名的無神論者。牧師問他說，「當教堂完好時，你不來。現在教堂被燒了，你卻來了？」那無神論者回答說：「如果你的教堂一直都是火熱的，我肯定會天天來。」你也可以藉著與英勇的地下教會聯合，讓你的教堂火熱起來。

我們對官方教會領袖的態度

許多人感到不安，因為我們的宣道會認為共產國家（除了波蘭、南斯拉夫和東德，）教會的最高領導人多是叛徒和共黨的走狗（當然也有一些光榮的例外。）

我這樣稱呼他們正確嗎？首先，各人的性格不同。彼得在使徒行傳 1: 16 中提到猶大時，並沒有稱他為叛徒；但約翰卻稱猶大為叛徒和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表達方式。性格就像各人的口味，純屬

個人的。其次是，任何人如果打算給鐵幕後的教會提供幫助，都不會考慮官方的教會。

天主教組織「Aid to the Church in Need,」（教會援助）的負責人文倫 Father Werenfried Van Straaten 神父寫道：「我們不能相信官訪我們教區的蘇聯主教，因為他們都是莫斯科的代理。其中最危險的一位，就是現年四十一歲的尼科主教 Nikodem。他是共青團員，未曾上過神學，也未曾住過修道院，卻突然在二十八歲成為主教。作為莫斯科教區的大人物，他十一年來一直有計劃地摧毀東正教。根據安德列（Andre Martin）無可辯駁的證據，尼科是一個惡魔，他正在無聲無息的扼殺東正教，同時又向梵蒂岡報告說蘇聯享有宗教自由。在他任職期間，蘇聯當局關閉了 15,000 間東正教會。」

文倫神父關於已故的尼科的評語，也適用於許多牧職人員。

在《使徒規條》第三十條，和第二屆尼西亞大公會議的第三教規寫明：「任何利用世俗權力獲得教會管轄權的主教，必須被廢黜，斷絕聯絡。任何繼續與他保持聯絡的教友，也必須一併被教會除名（excommunicate）。」必需注意的是，當時的統治者也是基督徒。如果這些統治者使用自己的權

力，任命主教，已經是大大冒犯了教會，那么今日，當統治者是撒旦的差役時，教會該如何看待撒旦任命的主教？

「愛。。不做害羞的事（哥林多前書 13:5）。」這話常被理解為基督徒不做沒有禮貌的事。但聖保羅本人有時也非常不禮貌。主耶穌也是。改革者和他們的反對者也是。當教會與世界的命運受到威脅時，顧及禮貌會造成巨大的傷害。

在希臘原文，這句話中「害羞」一詞，原文含義是「無系統，無計劃」。於是這句話的正確意思是「愛就是不做沒有計劃的事。」

基督就像一位動物學家，為人們分門別類。有些人是羊，另一些是狼，其他是狗，還有狐狸。祂稱一些人為愚昧、偽君子和毒蛇。還有一些是親愛的弟兄姐妹。他曉得一隻大獸、一條紅龍和一只特選的鴿子。愛不作無系統的事，也就是不作無計劃的事。

所有的人都必須獲得愛，但我對待一隻「狼」不能像對待一隻羊一般；也不能對待一位仁愛的門徒，就如對待一個偽君子；或對待一個暴君，就像對待被暴君苦害的人。一個不分羊和狼的牧人有禍了！一個看不出丈夫好壞的妻子有禍了！一個不能

看出孩子孝順與否的父母也是。愛的態度取決於具體的情況。

如果一群歹徒襲擊一個無辜者，雖然我愛雙方，但我會先盡力保護無辜者，必要時也會向歹徒開槍。否則我的行為就會變成「沒有系統」，因為根本沒有想到他們在世界格局中佔的位置。我們對待那些對教會有益和對教會有害的人的態度也是如此。我們的使命就是猛烈攻擊任何要摧毀教會的狼，包括教會領袖。

福音廣播

回答了針對我們的指責後，我就可以說我們工作的其他方面。

我們的宣道會以十二種語言向共產國家或受共產威脅的國家傳福音。我們得到許多奇特的反應。

一位來自上海的聽眾問道：「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但我知道，國外有一門“神學”或“靈魂研究”。它是說什麼？可以解釋嗎？... 人死了，靈魂也隨之消失。所以，實際上並沒有靈魂。我不明白耶穌是神，而這神又會留意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

另一位聽眾，葉辰，寫道：「歲月如流水，我不知道人的生命是否有盡頭。」

又有一位問：「對基督徒來說，容忍他人的不良行為，是一種好事嗎？」這是一個典型的問題。

最感人的一封信，是來自廣州一位年輕人寫的：「當我聽你們廣播的節目時，我開始認識耶穌基督。我是一位信徒。但是，當人與神完全分離、沒有教會時，作為信徒意味著什麼呢？（當時紅色中國的所有教堂都關閉了。）說真話，我也不知道什麼是祈禱。或許這就是我們在說完所有的話后，可以加上『阿門』？」

這是我聽過的對祈禱的最好定義。讓我且舉一個例子：你下班回家，又累又煩。你的妻子為你做了晚飯，但味道並不好，沒有加鹽。還有，這菜湯裏有一根頭髮正在湯麵。你可以譏刺你妻子說，「這是什麼湯？你看，有一根頭髮在裡面。你做飯的時候還在梳頭嗎？我希望你不要再這樣做了。」你可以用「阿門」結束嗎？

但如果你對妻子說，「我真的很感謝，你依然就如我們初戀時一般，想着我，以致忘了在湯里加鹽。但你卻給我一個驚喜。你知道我多麼喜歡你美麗頭髮。於是你就在湯里放一根！明天我會買一個小項鍊盒子，把頭髮套進去。然後我可以掛在我的

脖子上。現在就給我一個擁抱。」如果你這樣對妻子說，就可以加上「阿門」了！

這就是一位中國青年的禱告法！用這種方式，我們就能「不住禱告，不斷地阿門」了！

在1944年，當我開始向湧入羅馬尼亞的蘇聯士兵秘密傳教時，我發現，雖然我也能說俄語，但我其實不了解他們。當我告訴他們有關《失羊的比喻》時，他們就反對說：「沒有人能擁有一百隻羊。羊群理當屬於集體農場。」當我告訴他們說，耶穌比喻中葡萄園的租戶們拒絕給主人果子，並殺了主人派來收租的僕人和主人的親生子時，他們的回答是：「這些農夫做的對，人們都該反對資本家。葡萄園的主人是個地主，所以他是一個惡棍，他的財產該被沒收。」他們嘲笑聖母瑪利亞，說：「為什麼一個女孩必須守童身？」還有耶穌是王？他們最討厭的就是國王。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是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希律黨人、聖殿、祭壇、十一奉獻、詩篇、聖靈，甚至天使。他們不可能理解福音。給他們一本俄語的福音書，對他們也是無益。

為此，我寫了一本《馬克思語言的福音》。正如聖馬太為猶太人寫了馬太福音；聖路加為希臘人寫了路加福音，我也用共黨所能了解的，為共產黨人寫了一本福音。

這種共產黨福音廣播惹怒了共黨媒體。我們有幸成為最受蘇聯攻擊的宗教廣播。

一位俄羅斯的五旬節牧師獲得移居美國。他告訴我們說，蘇聯當局把基督徒叫去見秘密警察，命令他們寫信給遠東廣播公司（福音廣播臺）。當局吩咐信徒們稱讚廣播臺的基督事工，要求繼續廣播。又告訴廣播臺說，中國大陸的同胞們都渴望神的道。信中只抱怨一件事：就是信徒們都很討厭聽到馬克思語言的福音！

這正是踩到對手的痛腳。

《馬克思語言的福音》的西班牙語譯本在自由世界也產生了非常的影響。我們西班牙語的廣播收到一名秘魯遊擊隊的信。這人在灌木叢中聽到它。他驚訝耶穌愛敵人的教導，眨眼間他的心就改變了。他立刻意識到使用槍械殺人是多麼愚蠢。他離開叢林，來到城市，加入教會，成為一名主日學老師。即便如此，他的內心卻還不平息。兩年後，他又回到叢林，要把基督傳給他以前的戰友。我們就不再聽到他的消息。可能他被同僚們殺了。

一位姊妹在聽到我們羅馬尼亞語廣播後，寫信給我們說：「我為你們感謝天父和主耶穌，因為得以聽見神的話。我在夜間醒來，就跪下求神賜您健康和力量，好讓我們能繼續聽到您的聲音。」

世界之子常比光明之子聰明。兩千多年前，祭司長就知道大眾的影響力。他們知道彼拉多也像許多人一樣，會受群眾影響。如果有一大群人，就能令他做一些他原來不想做的事。如果他獨自靜思，就不會那樣做。群眾的意見是巨大的。於是大祭司就利用群眾，操縱彼拉多。但大眾的意欲也可以用來做好事。

如果我們要救恩臨到共產世界，幫助基督徒殉道者；如果我們希望自由國家瞭解共產主義的真相，並如何勝過它，我們就必須大聲呼喊。這就是我們廣播臺做的。

蘇聯聽眾提出的問題令人心碎：「人為什麼會死？死亡從何而來？死亡的意義是什麼？什麼是與神相交？我們怎樣才能認識神？請你慢慢地說，並且重複，因為我要抄下來。」

共產當局對我們的廣播感到震驚，這表明我們走在正確的路上。但福音廣播臺不僅設立在國外。諾沃（Novoe R. Slovo）寫及蘇聯境內的秘密廣播台。蘇聯對這行為的懲罰是死刑。

這部作品給所有質疑地下教會存在的人，帶來了致命的打擊。歐洲教會會議秘書加菲（Garfield Williams）神父在瑞士報紙《洛桑羚羊報 Gazette De Lausanne》上寫道，地下教會是「定義錯誤、

而且誇大了」。我在書中表明，俄羅斯地下教會擁有秘密的學院、秘密祈禱會和洗禮、秘密任命的牧師和主教、還有共黨中的秘密信徒（共產黨視這種黨員為叛徒）、秘密雜誌、秘密印刷機、秘密修道院。如果這些都不足以證明有地下教會，那麼還有一個證據：秘密無線電發射臺。在這一切都證實後，如果加菲弟兄依然不信有地下教會，我就無能為力了。

莫斯科雜誌《鼓動者》猛烈攻擊基督教廣播，說這種廣播臺「把天空充斥著廣播節目，目的是增加人們對宗教的興趣，煽動宗教狂熱，並改變人們宗教的觀點和信仰。它們聯合眾人反對社會主義政權。」他們又說，這些廣播的教導，就成了信徒們的生活準則。俄羅斯弟兄告訴我們：「你的講道是我們靈魂的安慰，是這乾旱世界的一杯涼水。」

《烏克蘭真理報》正確地抱怨說，我們廣播的目的是溫和地引導信徒們，逐漸放棄唯物主義，漸漸反對蘇維埃政權（蘇聯政權）。

蘇聯不接受耶穌的話「凱撒的物歸凱撒，上帝的物歸上帝。」他們要求我們整個人都歸給共產政府。面對這麼猖狂的「凱撒」，基督徒就不再欠他什麼了。

最近来自蘇聯信徒的通訊，也是給你們的，因為你們是我們堅定的支援者：「我們特別想到那些照顧聖徒需要的人。‘當我赤身露體時，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來醫治我；我在監獄里，你們來探望我。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既然你們服侍我最小的弟兄，就是服侍我了。’我們已經收到你們的包裹、印刷品以及其他幫助，我們感謝上帝，也感謝你們。你們的獎賞在上帝那裡。」

我們向您保證，您為我們鐵幕背後的兄弟所做的沒有白費。來自羅馬尼亞和蘇聯的報導稱，當福音廣播時，村裡的人都會放下手中的事情，聚集到有收音機的人家中。非信徒和基督徒聚集在一起，跪下聽佈道。連共黨高層也是因為聽到國外的基督教廣播而信主的。

幫助殉道者家屬

您的捐款將用於向基督教殉道者寄送包裹。一個收到包裹的蘇聯家庭寫道：「我們大大的歡呼感謝，你在美國也應該能聽到！」

一位浸信會牧師的妻子在她的丈夫被判刑時，必需餵養八個孩子，她寫道：『我收到了您們的包裹。我感謝上帝讓我有幸背負基督十字架的碎片。』

孩子們問爸爸什麼時候回來。但他們的父親卻因這傳給聖徒的信仰，不能陪伴他們了。」

另一封信是由浸信會會長克魯奇（Kriutchkov）署名的。他已經躲藏起來，因為當局已經對他下了逮捕令：「感謝你們寄來的基督教書籍和福音廣播。我們依然靈魂飢餓，但通過你們的努力，我們至少不至於餓死。」我們有很多這樣的信件。

我們分裂了共產黨

我們也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成功，其中最大的就是在揭露共黨罪行時，我們分裂了共產黨。

1976年12月12日，巴黎《費加洛報，Figaro》報導說，我們德國支部的同事克萊文（Paul Klavins）從蘇聯走私出一部電影，有關里加城（拉脫維亞）克羅監獄（Krosvstpilz-Ella）的情況。我們把這影片給美國CBS，英國，法國等電視台播放。結果法國共產機關報Humanite就抗議蘇聯囚犯受到的待遇。雖然蘇聯報章Pravda憤怒地否認該部電影的真實性，另一種蘇聯雜誌Literaturnaia Gazeta 在該年十二月24日却肯定那電影是真的。

法共機關報《人道報 Humanite》對囚犯遭受的惡劣待遇，向蘇聯提出抗議。儘管蘇聯的《真理報》憤怒地否認了該影片的真实性，但12月24日另一家蘇聯雜誌《Literatumaia Gazeta》卻證實了它。

1976年11月3日《洛杉磯時報》披露，蘇聯共產黨給西方世界的同志們發了一封長信，主要就是討論我們宣道會偷運到西方的這部影片。

在這份檔中，蘇聯人試圖為這部電影辯解，聲稱蘇聯的研究顯示，15%的囚犯精神錯亂。當然，他們沒有解釋這種精神錯亂是在入獄前還是入獄後。這封信證明我們的宣道工作有效。

在參加了我們法國宣道主任克萊文和格羅姐妹舉行的新聞發佈會後，法國媒體一致譴責了紅色恐怖。英國共產黨也與蘇共劃清界限。法國共產黨總書記瑪律 Marchais 甚至因此不出席國際共產會議。義大利共產黨也公開譴責他們蘇聯同志的殘酷行徑。我們的消息叫西歐各國的共產黨大失人心，更不容易當選為國家領袖。

第六章

里程碑

阿爾安國際會

我們宣道會的一個亮點是在瑞士城堡 (Chateau d' Oex) 舉行的第一次國際會議。各大洲的代表都來出席這會議。由於我們是一個秘密組織，所以我不能透露太多我們討論的內容，但給我

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同工之間的愛和理解。這會議對我的書的出版商霍德和斯托頓（Hodder and Stoughton）表示感謝。他們曾鼎力支持我們的事工。他們是史上第一家非基督徒出版商給與教會這麼大的幫助。

那次會議給我留下了另外兩個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是挪威路德教會主教農德瓦 Nonderval 按立我兒子為牧師，有九國的牧師贊同，包括我。在監獄的漫長歲月里，我一直祈禱這兒子歸主。主果然垂聽了。

第二個印象來自我們一起領受的聖餐。由於在共黨權下我沒有教會，於是多年未曾分發聖餐。這次我必須講道。當我跪下祈禱時，我方才理解聖餐的意義。

我們在聖餐紀念聖子的死，但我們也暗地裡記念派遣聖子到世上來的聖父。聖經說：耶和華樂意傷他（賽 53：3）。我們紀念聖子的痛苦和聖父的快樂。

三一神創造了世界。當人們開始用鐵器時，聖父對聖子說：「人們將用這樣的鐵，把釘子打穿你的手和腳。」當樹開始在地上生長時，聖父說：「從這樣樹，人們將打造聖殿的棟樑，也打造釘你的十字架。」當動物生長時，就得到堅韌的皮，可以用

來制作鞋子，也可以製成皮鞭，用以鞭撻聖子。後來人也被造了。他們擁有千萬計的神經線，可以感受到歡樂，但也讓耶穌嚐到極度的痛苦。

我記得一位共產酷刑者的話：‘如果有上帝，我們就藉着折磨你，實現了祂的旨意。如果上帝造了人體，那麼祂創造它主要就是為了讓人挨痛。身體中有五，六個區域可以觸摸而產生愉悅感。但引發痛苦的，却在全身每一寸肌膚。我可以藉著掀起女孩們的頭髮，把她們吊在半空，也可以毆打她們的腳底。人體有哪個部位不會疼痛的？’

聖父造了淚腺，告訴基督說，「這是給你母親的，這樣她可以在骷髏山哭泣。」這是怎樣的一句話：「神樂意將他壓傷。」祂創造人的鮮血，主要就是為義而流失。它的所有其他用途都屬次要。

在這次聖餐中，我第一次認識到神賜下救主的意義。

如果在神只是單純的一個，那麼就無需強調祂的獨一了。正是因為在獨一的神中，也有內裏的緊張關係。

我想起主在約翰福音 16 章 7 節所說的奇怪的話：「我若不去，保惠師（聖靈）就不會臨到你們中間。」似乎聖子與聖靈避免同時遇見同一個人？

我可以感覺到，在神聖的三位一體內部，存有緊張關係，因為我也屬於神的家，而神和愛祂的我之間，也有一種緊張。如果神與人真的完美和諧，為什麼多數人都向神要求如此多的東西，而這些東西並不是神自願給我們的？信徒們的真禱告，常是：「不要成就你的旨意，要成就我的旨意。」即使他們嘴巴不是這樣說。

在我的感覺中，我們與共產主義的鬥爭，正是對抗神的安排。

希特勒統治德國直到把全國搞垮了。希特勒告訴施佩(Speer)說，「上頭的安排救我一命，」這也是事實。他因此得以徹底摧毀德國，因為一切謀殺他的企圖都失敗了。

啟示錄第十二章告訴我們，神賜能力給一條龍，讓它能與聖徒爭戰，並且戰勝。「有能力賜給它（若非是神，還有誰能給？）超越所有種族、語言和國家。」

我無法忍受共產黨佔領幾乎半個世界。可是神卻給我更糟的事。教會將暫時被擊敗，就像耶穌在骷髏被撒旦擊敗一樣。

我就像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祈禱，求天父把這苦杯取去。但它不會被取去。凡恨錫安的，到最後

必被神羞辱。他們將像草一樣被火燒毀。俄羅斯東正教的聖詩正是這樣唱。

我完全不明白。理性告訴我，整件事都是荒謬的。我已經放棄了理智，就是路德所說的「理性之惡獸」；我只信，並崇拜。

我們在耶路撒冷舉行了第二次國際會議。這次我們有來自遠方國家的代表，例如日本、越南（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到我們的越南主理。當南越落入共產黨手中時，他選擇留下來。如今他可能已經不在人世了。）秘魯、哥倫比亞、巴西、澳大利亞和芬蘭也有代表上來。

我們絕對有必要聚在一起討論。但如何不花費大量資金就能舉辦這樣的國際會議呢？我們決定在耶路撒冷召開會議，因此我們能夠將我們的會議與聖地國際之旅結合起來，有來自不同國家的約 250 名參與者。對於售出一定數量的門票，我們免費獲得一張。這樣我們各地的主任們只要出售一定數量的旅行票，就能獲得一張免費票。於是他們就不須花費我們任何費用。

拜訪耶穌曾經居住的地方，對我們對我們每個人都是難忘的經歷。但有一件事甚至超越了這一點。

我們中間有克拉(Klaassen)弟兄，他在共產監獄里渡過了十年；哈姆(Hamm)弟兄，他被放逐到北極圈長達二十年；還有羅斯(Rose)弟兄，他有自己的迫害經歷。看到這些人拜訪以色列，叫人心裏歡喜。

由於我以前來過以色列，所以我遇到許多來自羅馬尼亞的希伯來教會舊友，他們在我下獄後移居以色列。我還見到了一位前共產黨秘密警官，他為我出獄提供了說明。他因盡力解救我而入獄。在他出獄的那天，他拿著一朵花來找我，說，「這是多謝你給我機會，為如此光榮的事業受苦。」

我們還在以色列開展了傳教工作。我的書有希伯來語和阿拉伯文版本。後一版本已發送到阿拉伯國家。隨後我們也召開了另一些國際會議。

迷惑人心的新策略

我們面臨的問題在不斷變化。當我剛到西方時，新聞媒體甚至教會中的許多左派人士斷然否認共產黨的迫害。這條路線現在已經站不住腳了。於是如今他們採取了另一種策略。一些組織極力淡化共產黨的迫害，並將其淹沒在有關自由世界不公正現象的混亂新聞中：例如韓國的獨裁統治、拉丁美洲的

軍政府和南非的種族主義。共產主義的威脅就被世界各地的大量不公正監禁所掩蓋。他們成立共產國家事件研究所，教會支援這些研究專案，安撫自己的良心。英國聖公會、德國和挪威的信義會、美國聖公會在密蘇里州主教會議中，達成有利於受壓迫基督徒的決議。

但僅靠這種研究——儘管它很有價值——並不能幫助受害者。猶太人並不進行研究：他們確實的為受難的同胞而戰，並給與支助。我們瞭解俄羅斯有多少囚犯固然好，但更重要的是給他們提供食物，無論他們是 300 人還是 30,000 人。當一位猶太人德萊弗（Dreyfuss）不公正的被關押後，全球的知識分子都群起抗議。他們也不等待觀看是否有第二位受害者，也不理會有沒有把受害者的名字寫差了。

殉道者的子女們不能吃對他們有利的決議。他們需要麵包。

共產黨的暴行是無法比擬的。世界各地都有欺壓。但能不能比得上古拉格群島的狀況？哪一個非共產政權用可怕的酷刑殺了數千萬人民。南非有殺害一百萬黑人嗎？在韓國，葛培理向一百萬人自由傳教——這是史上最大的基督徒聚會。

不公正和虐待無處不在，這是事實。但共產主義卻是本質便是邪惡。它來自撒旦。我在我的書《馬克思是撒旦教徒嗎？》裏已經證實這位現代共產主義創始人與撒旦教派的直接聯繫。

蘇聯是世界上唯一依然流傳著教會借著宗教儀式進行謀殺的國家。

在《兒童與宗教》一書中，共產黨人重提基督徒教導謀殺的古老謊言。他們說，基督徒為了贖罪，就殺自己的孩子。羅馬人在十九世紀前曾這樣誣告，現在共產黨也向孩子們這樣宣傳，嚇唬他們不要成為基督徒。

1969年著名的歐德沙城（Odessa）對浸信會成員的審判，指控浸信會員割切一個孩子的靜脈並喝他的血。自從羅馬皇尼祿之後，未曾有人對基督徒編造這種瘋狂的謊言。

在《五旬節派是什麼？》（莫斯科，安娜妮出版社）一書說，在利特基村（Litkino）有一位名叫斯米爾（Smirnova）的基督教婦女殺了自己的一個年幼的兒子，並打殘了另一個，作為對上帝的祭品；一位名叫拉茲（Lazko）的基督徒被指控用斧頭殺死了他七歲的女兒以榮耀上帝。

琴科 (David-chenko) 的著作《What Believers are Taught》(Bielorus 出版社) 中提出了另一項儀式謀殺指控。據稱，一位名叫穆德 (Mudrii) 的浸信會員按照浸信會的指令殺了自己的兄弟。

在《我們不能忘記 We Must Not Forget about》一書中，作者多爾吉與庫蘭 (Dolgich & Kurantov)，其中写道：「卡拉干 (Karaganda) 教會的婦女安娜 (Anna Nevelinaia) 將她六歲的兒子作為祭品獻給上帝。她帶孩子一起在火車前跳軌自殺。」這故事背後的真相可能是法庭判決奪去安娜的撫養權，因為她教導孩子有關於基督。她擔心共產黨會使孩子離棄神，所以出此下策。沒有人能論斷她。

該書還報導說，在涅夫村 (Neftgorsk)，克里牧師 (M. Krivolapov) 決定「向上帝獻上一隻無瑕疵的羔羊，於是就把女會友奧西 (Osiovetz) 的三歲兒子殺了」。沒有人試圖阻止這一可怕的罪行，因為他們都認為這是聖靈的旨意。隨後，孩子於夜間被埋葬在黑暗的森林中。他年輕的母親因悲傷而去世。他的父親早已過世，原因是長期禁食。

這本書解釋說，克里牧師正在遵行基督的命令，就是一個人必需放棄自己的家人，才能成為基督的門徒。

莫斯科報紙(Znamia Iunosti)指責浸信會教徒藉著洗禮，殺了女孩瓦尼亞(Vania Voinelovich)。共產黨人說，那位女孩因為洗禮導致肺炎，後來就因肺炎而死。故此她的牧師犯了謀殺。這些只是一些從鐵幕中洩露出來的些少消息。我們的俄羅斯弟兄們面對多少這種瘋狂的指控！

赤色中國的暴行

香港《遠方報》報導一名從上海歸來的商人，親眼目睹一名中國羅馬天主教徒遭受致命的酷刑。他說：「他們抓住他，把他帶到郊區的一所學校，在那裡他們組成了一個由二十名高中生組成的法庭。他被指控並被判怠忽職守、不瞭解毛澤東思想，又執迷宗教。。。受害者戴著十字架。」這位商人說，青少年們想把這位中國信徒釘在十字架上。紅衛兵向他扔雞蛋、石頭，然後用熱火棍折磨他。路人都聽到了他的尖叫聲。

又有一名中國基督徒被發現藏有一本聖經在枕頭里。為此，他被脫光衣服，塗上蜂蜜，被迫在烈日下站了好幾個小時。

挪威的《Vart Land》報指出，在汕頭 (Swatow)，一名牧師戴著一頂高帽，寫著可惡的評語，被拖過街道。在赤化的中國，神職人員如果拒絕在信徒面前宣讀毛語錄，就可能被處決。中國教會的苦難超乎想像。天主教徒宣佈他們的成員有超過一百萬人被殺害《中國教會安魂曲 Dauriac, Requiem for the Church of China》。我們沒有新教徒受害的人數，但也肯定相當於此。

前駐華傳教士里斯博士 (Dr Rees) 在考察歸來後寫信給我們：「我所有的中國朋友們都被殺害或監禁。一人被弄瞎了，一個被扔進井裡，兩個人死於肺結核，另一個人被洗腦後失去了理智，簽署了一份放棄宗教信仰的書。當他的理智恢復時，就撕毀那叛教書。但中國基督教會卻在不斷壯大。它被稱為《閉口無言的教會》。沒有人互相交談，但鄰居們卻通過聖靈的運作而悔改。我所有主內弟弟妹 (倪柝聲教派) 都被各種手段處死，共有數千人。

一位名叫庫曼 (Kuman Chandah) 的印度醫生在紅色中國的一所監獄中被砍斷雙腿，挖出眼睛。位俄羅斯人瓦爾基 (Valdimir Tatishtshev) 在上海被捕。中國酷刑者用螺絲栓將鐵管綁在他的腿上，然後用錘子敲打，直到他的骨頭被打斷，迫使他認罪。當他依然拒絕，共產警察就來到他家。一名警官抱起他的孩子，對他太太說：「如果你不簽署針

對你丈夫的指控，我們就會敲碎你孩子的頭。」這位母親驚呆了，難以置信，就拒絕了。該名女警官就將嬰兒的頭撞到牆上。母親就用刀捅這警官，其他共產黨員則開槍把她殺了。

1970年4月7日，莫斯科廣播電台報導，「在這十年間，中國有超二千五百萬人被殺。另外還有百萬計的不滿者被扔進巨大的集中營。」1969年5月7日，莫斯科報紙《紅星報 Krasnaia Zvezda》寫道：「中國共產黨……用沸水和硫酸燒灼人們的眼睛，用小刀砍下人們的四肢，用石頭和古代的大關刀劈開人的頭。」我們許多中國弟兄如今正在盲目的摸索，或者因為四肢被砍了，就趴在地上，像毛蟲一樣蠕動。希伯來書 13: 3 中吩咐我們紀念受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

希望共產政權會變得更人性，是一種幻想。最近黨方給的一些「自由，」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他們開發少數的教堂，給與共產妥協的牧師神父。但神的地下教會卻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我們最好對中國緊張的傳教工作保持沉默。

我這書的目的，是為了談及我成立的宣道會、並有關我自己，和我在西方自由世界的歲月。但這個「我」到底在哪裡？人們該記得，心理學還不能肯

定「人格」一詞的明確意義。一個人如果脫離了他生命所屬的事物，它還是什麼？難道一個人格就不能擴展，以至包含中國所有的苦難，甚至更多？

這書原來是為了寫及我自己，但我卻寫了中國和整個共產陣營。對我來說，這一點也不矛盾。

如果我看起來有偏差，便讓我繼續描述中國基督徒對這些暴行的反應，成全這偏差吧。

那些怕暴君和暴政，怕自身被殺的人，是愚笨人。我們該怕的，是那能把我們身體和靈魂都拋進地獄的神。有士兵用劍針對一個基督徒的胸口，問他說，「你是基督徒嗎？」他回答說，「是的。」可是一名軍官卻說，「放了他，他是個白癡！」後來有人問這基督徒：「你怎麼有這樣的勇氣承認基督？」他回答：「我讀了彼得否認基督的故事，我不想像彼得那樣懊悔痛哭。」

關於我們中國同胞的殉道，有人看到一名女基督徒在共產勞改營中被亂石砸死。那女孩的手腳被綁起來，跪在一群人的中央。黨方命令眾人用石頭砸死她。拒絕的人就被槍殺。她去世時，她的臉就像聖司提反一樣發光。至少有一位在場的人因此相信了耶穌。另一名年輕人在被掛在十字架上六天，直到他斃命。他不絕地為迫害他的人祈禱。又有五

名學生被命令挖坑，然後他們自己被扔進去活埋。他們臨終還唱基督徒的讚美詩。

有沒有解方？

大多數人都同意我對共產主義的批評：他們同情受苦的人。但他們問：「解決辦法是什麼？」

人類最大的傷害，是由那些自信有解方的人造成的。馬克思、希特勒和斯大林都相信他們擁有正確的解方，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就是這些人把世界卷入世界大戰，並各處的革命和獨立戰爭中。這些爭鬥只會導致更多的奴役。我相信神把未來隱藏了。人不該以為自己能預視。除了些少得到特殊恩典的人，獲得對未來的快速一瞥之外，人類都沿著一條未知的道路前進。

我知道許多人不會同意，但我只能推薦耶穌的藥方：就是愛每個人，包括愛共產黨，並努力把他們帶到基督面前。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據說有一次，太陽與風作了一次較量。誰能令一位穿著大衣的旅行的人，把大衣脫去。風先嘗試。它猛刮這旅行者，企圖把那人的外衣刮走。可是那人卻越發把自己裹得密實。然後輪到太陽。它不用任何暴力，只溫和地照耀，給那人溫暖，再加溫

暖。那行人走熱了，就把大衣脫下。溫暖的愛能夠成功，反共的猛烈攻擊卻難以奏效。

我們的第一武器就是愛。我們不僅扶助受害的人，也向迫害他們的共產黨顯出關懷。

我們的第二種武器是自我犧牲。「獲得神的愛的方法有數百種，但只有一種保證有效的。」一位傳道人說。「那是什麼？」他的同事問。「啊哈，」那傳道回答：「我就猜你不曉得！」

獲得上帝之愛的道途，最是簡單：遵守祂的誠命。主耶穌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人必蒙我父愛他，我也必愛他」（約翰福音 14：21）。祂還說：「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誠命」（太 19：17）。每天早上唱一首讚美詩，讀一段聖經，祈禱，安靜的聆聽神給你當天的話，然後就履行祂的命令。

祂的許多誠命可以歸結為一條：效法祂，即使這可能涉及痛苦，甚至死亡。

耶穌為父的榮耀而死，並命令祂的所有門徒向罪死了（羅馬書 6：2），也在必要準備為道舍命。如果你準備好為道而死，你的信仰便是真的。如果你不準備為它舍命，你的信仰只是一種信念，並不是你的宗教。基督徒生活可能導致痛苦的損失。如

果這對你是太大了，就不要稱自己是基督徒。耶穌樂意在三十四歲時死在十字架上，我們也該把自己奉獻給神與人。凡守祂誠命的，就是祂所愛的。

教會要求基督徒英勇。耶穌的名字之一是「英勇之神」（賽 9: 6，原文含意）。

從事鐵幕后工作的宣道會中，唯有我們這機構有成員殉難的。我們的烏干達主任基瓦弟兄（Kiwanka）被殺；王秀美（Wang Shiu-Mei）弟兄在試圖私運聖經到中國時被毆打致死。我們的同事 Jon Clipa 和 Sabin Teodasiu 在羅馬尼亞被殺。

殉道者的鮮血依然有效。它給鐵幕後的教會提供養分，也給自由世界的支持者提供屬靈的糧食。自由世界的捐助人給我們不流血的支持，對地下教會的成長也是至關重要的。

基督徒囚犯的親友，每年可以探監兩次。但從明斯克（Minsk）到西伯利亞（Siberia）的路途漫長，費用高昂。政府不給囚犯家屬工作的崗位，於是信徒沒錢。共產黨希望信徒們放棄信仰，即使不是因為自愛，也為了保護他們的家庭。您的金錢支援可以堅固那裏的基督徒，讓他們可以遵守主的命令，繼續戰鬥。耶穌死在十字架上，但祂可以信賴使徒約翰會照顧祂的母親。當共產監獄里的基督徒知道你

不會拋棄他們的家人時，他們就能安靜受苦和死去。

我們的周年紀念日

世界給她自己百姓的成功之印記，是眾人的矚目與喝彩。但這些對神的兒女卻沒有多大價值。

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義大利最受歡迎的政治家是共產黨領導人貝林格 Berlinguer，他是一位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一個為了廢除宗教和道德，不惜使用血腥的暴力的人（參閱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貝林格目前偽裝成社會民主黨。者列寧在上臺之前也自稱為社會民主黨。在他當選後，就開始屠殺數百萬無辜。

在人類走過的漫漫長夜裡，希特勒和斯大林也大受歡迎。還有很多假冒的宗教領袖，他們鄙視基督的教會，利用人們的情緒、感官的刺激，吸引信徒。人們對任何事情都會感到興奮；但只有喜悅真理，才是真有價值的。

我們的宣道會已經成立了十五年。我們從傳揚一個非常不受歡迎的事工開始。但是在不受歡迎的時候依然堅持真理，便是上帝的印記。

我們知道，總的來說，人們不會太過關心遠方為基督殉道的人。有誰會關顧共產治下十億被迫遠離基督的靈魂？誰會因為這些靈魂的永遠喪失而哭泣？我們鮮少會關心世界另一端的悲劇。

我們的工作，就是向冷漠世界傳達這信息：必須向共產國家傳福音。我們並不幻想馬上就成功。

每周約有一百萬人在未聽聞基督之前就過世。世界人口每年增長 4700 萬人。在這情況下，普世教會的傳教努力卻日益減少，儘管我們都知道主的命令：「到普天下去，教導萬民」（太 28：19）。

愛就如光，總是飛速發射；我們必須立時使用它，絕不能收藏。不全速前進的光，就不是光。不全力救人的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如果我們的信仰，只知道救自己，保證我一己能上天堂，卻不能激勵我為他人著想，有何意義？

我們告訴世界，福音必須在共產國傳播，我們立即就行。我們也提及被共產迫害的聖徒，也援助囚犯的家屬。我們對自己的成果也感到驚訝。

從一開始，我們就警告說，共產主義將擴展到新的國家。它就是啟示錄的「紅龍」（12 章三節），正準備吞噬教會。它若不吞下世界，就不會滿足。果然不過十多年，共產黨就佔領了越南、東

埔寨、寮國、南葉門、衣索比亞、貝南、剛果-布拉柴(Congo-Brazzaville)、莫三比克、安哥拉、阿富汗等。

我們觀察並記錄了共黨的每一場勝利。也同時看到共黨正在利用一些次要的事件，轉移人們的注意力。

當蘇共占領了非洲一些國家時，蘇共就同時報道蘇聯本土的異議人士薩哈羅夫(Sakharov)被逮捕的細節，叫人不會留意到他們正在非洲屠殺數十萬人。在美國，當共黨占領東南亞時，他們就操縱輿論，叫公眾注意水門醜聞。義大利和法國的共黨也正在抬頭。

馬列派的間諜也滲透自由世界，準備進行軍事攻擊。比利時將軍格洛澤(Glose)宣稱蘇軍有能力在四十八小時內佔領西德。誰能阻礙它抵達大西洋？法國本土支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選民已經占多數。

社會民主黨，其實也是馬克思主義。儘管她不提暴力，但她最終的目標與馬克思所宣稱的一致：廢除一切宗教和道德。在1953年，西歐所有內閣成員中有33%是社會民主黨人；現在已經達到了70%（1970年）。

在我們的宣道會出現之前，反共分子說：「唯一好的共產黨員，就是一位死了的共黨成員。」我們卻說，「每個歸向基督的共產黨，都將成為聖徒。」

我們的使命反對親共派，也反對反共派。從邏輯上看，這樣的宣道會肯定失敗，但我們卻得以迅速發展。這是上帝的奇跡。

當你考慮到有多少熱心的基督徒反對我們時，這個奇跡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這些熱心基督徒的觀

點是，由於運送聖經進入共產國，免不了必需撒謊，所以最妥當的做法，就是讓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不必聽聞福音。對於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我們的回應是，「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天使，這天使給的命令就是：無論如何總要救一些人。」（哥林多前書 9:22。）「無論如何」意即藉著正當的或不正當的渠道。

在上個世紀初，一位名叫巴里（Barry）的異常聰明的女孩得到一種感動，要成為一名醫生。由於當時的大學不接受女生，於是她扮成男生。十歲時，她就通過了考試。十四歲時就成為一名軍醫，後來晉陞到高級軍銜，沒有人懷疑她的性別。她將一生奉獻給罪犯、乞丐、瘋子和麻風病人，以及南非和牙買加的軍隊。直到她死後，人們才發現她是

女性（June Rose, *The Perfect Gentleman*, Hutchinson, 1977）。如果有人因為她假裝男人而罪怪她，那麼誰該受罰？

是敬業的醫生，還是那些制定不良法律的人？

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我們。我們的同工為了運送聖經，就偽裝成遊客、外交官、運動員、記者等。

如果這也算是罪，那麼共黨便需要負起責任。

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我們的個人生活。一對婚姻的伴侶或好朋友即使在心情低落時，也會為了對方的好處，刻意表現得快樂。他們在心情低落，感到傷心時，也會露出微笑；在心中憤怒時，也會約束自己，表現出溫柔。因為知道當時的憤怒不宜發泄。原來地上果然有聖潔的誠實；但也有聖潔的不誠實！

我們傳福音時，也知道我們會被誤解。例如，很難告訴黑人說：最糟糕的白人統治，也比紅龍帶來的「獨立」更好。因為共黨是更加殘暴的政權。他們不許靈魂得救。紅軍偽裝成自由戰士，未曾吃過他們鞭子的，就會被他們騙了。

我們也不容易讓新教徒明白，我們必須捍衛和援助被監禁的天主教徒。反之亦然。

这便是神的印记，就是無論人們喜歡或不喜歡，我們都繼續神命定的工。在這十五周年，我們感謝一切同事、各國主任、同工、祈禱夥伴，捐助者、所有捍衛我們的，以及所有攻擊我們，殺害我們的人。後者使我們重新檢討我們的漏洞。

這擔子不容易承受。我們也有憂鬱的時刻（當我們的同工失手被抓，開始漫長的折磨時，我們就憂愁），但當我們收到一封來自蘇聯的信時，就馬上得到了安慰：「這裏的幾位东正教会的神父几乎赤身裸體。在禮拜時沒有適當的衣服可以穿。他們的工作是瓦匠。他們急需衣服，以便在警察追蹤時可以更換。這些牧師負責管理從中亞到符拉迪

（Vladivostok）的秘密教會。我們已經分發了 50,000 盧布。」

这便是我們宣道會的目的之一。然而，如果沒有人捐助，這工就不可能。一位朋友写道：「我已将你納入我的遺囑中。」路德教會的弟兄們寫道：

「我們會盡力寄給你一英里便士，即 750 英鎊。我們已經籌集了 170 英鎊的便士。」另一個路德教會團體告訴我們，「當我們有幸邀請您在我們的教堂講道時，我們從未受到福音的真義震撼。這裏是 250 英鎊。我們會持續這種支援。」

有一封信寫道：「我八歲了。我得到了喂驢的錢，並寄給你一部分，40 便士。」（英國）

「我們門諾派（Mennonites）和歸正會（Reformed）舉行了一場自由盛宴。我們紀念那些受迫害的人，並為他們安排了援助。」（法國）

「讀完魏恩波的《為主受苦》后，我想把我所擁有的一切都給你。今天，我關閉了我的銀行帳戶，並將餘額寄給了您，對我受苦受難的弟兄們充滿了愛。」

我們在周年紀念中，看到了巨大的進步，但我們仍然有許多任務，其中包括對許多神職人員。

向神職人員的呼籲

我有機會參加許多基督教大會。當一些牧師聽說我來自羅馬尼亞時，就祝賀我說，「你們的運動員納迪亞（Nadia Comanici）真的了不得！羅馬尼亞擁有世界一流的球員。我們在電視上看過她——才十五歲！」我便問他們是否也曉得羅馬尼亞殉道者的名字？沒有一人曉得。讓我便提幾位：獨一派的 Suciu 主教、Frentziu 主教、Rusu 主教、Hossu 主教、Aftenie 主教（因酷刑而精神失常），

Macavei 神父、Pop 神父、Moldovan 神父、Stanescu 神父等。

湯瑪斯 (Thomas Aquinas) 教導說，當上帝的榮譽到威脅時，憤怒是一種神聖的反應。我們對一些牧師們對殉道者的冷漠感到憤怒。我們相信所有神職人員應該少看一些電視節目，多讀些殉道者的消息。這將改變他們的佈道和生活。

牧師該告訴自由世界的基督徒，蘇聯依靠自由世界的貸款、技術援助和小麥建立了獨裁政權。丘吉爾和羅斯福在雅爾塔 (烏克蘭) 的會議中，把東歐諸國交給了共產黨。在東南亞，除了美國之外，沒有任何西方國家說明越南爭取自由。最終美國也放棄了越南，任由共產黨宰殺。

1976 年 2 月 3 日，基辛格警告說：「蘇聯以軍事裝備、顧問以及運送一萬一千名古巴軍隊到非洲，進行史無前例的干預，這是一種急需關注的事。。。如果縱容他們，我們就將面臨更艱難的選擇和更高的代價。」無人理會他的警告。相反的，美國參議院更中止援助安哥拉人為爭取脫離共黨魔手的爭鬥。

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國逃避自己的任務，讓半個世界的老百姓血流成河。主啊，憐憫我們！

我們必需協助受共黨迫害的基督徒，彌補我們與我們父母一代的過失。

第七章

未來的路

緩和的替代方案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約翰一書：5）。基督降卑自己，成為繃裸的嬰兒，躺在馬槽裡。祂完全與我們相反。我們只會企圖抬高自己，增加一己的財富，好呈現自己的威風。基督卻樂意成為眾人的奴僕。

在受難日，基督更進一步，把自己變成了一具受摧殘的屍體。祂為我們的罪作出賠償。也教我們如何向世界死去。抵抗罪惡比屈服於誘惑更好，但完全無反應却是最佳的選擇。一具屍體對任何事物，都不會有積極或消極的反應。

耶穌於週五去世，周日早上復活。雖然墳墓里黑暗，祂卻知道在神沒有黑暗。愛神的人也不能留在黑暗中；於是祂走出坟墓。

相信基督並追隨祂的人，也必復活與祂同在。

無神論就是黑暗。這是一個人缺少神的光。無論是一位無神論者，或是一位「擁有敬虔外貌」卻沒

有內裏的神的能力，都是一樣黑暗。讓我們走出這種墳墓，就如主耶穌走出黑暗一般。

共產國家把無神的想法強加給民眾。即使在自由世界，共產黨人也努力傳播他們的不信。例如，法國就有一個非常活躍的無神聯盟。他們寫道：「我們反對一切宗教，但首先我們要對付的是基督教。宗教信徒都是精神病者。帶領他們的，就是那些中毒最深的人。」因此，根據他們的說法，信奉基督教就是一種精神病。

列宁认为，「有關不占空間也不占時間的存在物（神與靈魂），都是神職人員發明的。」（可參閱《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 Materialism and Empiro-criticism 》）。難怪共產政府常將基督徒送進精神病院。

在莫斯科，一些年輕的東正教徒組織了一個秘密神學院。當局馬上逮捕該組織的負責人亞歷山大（Alexander Arghentov，）把他關進一家精神病醫院。在那裡，醫生診斷他的疾病為「宗教信仰」，於是給他開了一種強效藥物阿米嗪（Aminazine）。現在他被轉送到監獄。

如果共產黨把基督徒都當作是瘋子，也無妨，惟願他們的國家充滿這種瘋子。

列寧格勒出版的《輿論與無神論宣傳》一書，提到 3300 萬蘇聯公民宣稱自己是宗教信徒。肯定還更多人因為害怕失去工作或自由而隱藏自己的信仰。僅在列寧格勒，就有 41% 的受訪者承認在家中舉行宗教儀式。這些接受調查的人都很天真。聰明人不會回答蘇聯的民意調查。

在蘇聯管轄的亞美尼亞，70% 的兒童接受了洗禮。在鐵幕後，凡是為自己嬰兒進行洗禮的，都冒著巨大的風險，這是深刻信仰的表現。

我們宣道活動沒有白費。我們向共產國家提供聖經、基督教書籍和宗教廣播，結果他們的無神宣傳大受冷落。但我們是一個宗教組織，我們唯一的武器就是傳播神的話，憑愛心救人。然而神也同時授命各國政府用劍來懲罰惡人。如果一個謀殺了一人的凶手，也必需受到嚴厲的對付，那麼屠殺千萬人的共產集團，該如何處理？

因此，民主政權不可能與共匪談和。

謝爾蓋 (Serghei Uralov) 是槍殺俄羅斯皇帝及其家人的共產刺客之一。他講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天，對他的要

求。沙皇說，「我已經寫了一封信給列寧，提醒他說，在1912年，當列寧的母親要求我減輕他的妹妹的刑罰時，我就下令釋放她，讓她得以逃出國。當時她因為傳播共產刊物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現在，我請求列寧幫個忙，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我生病的兒子，讓他可以到南方去，給親戚照料。」謝爾蓋答應轉發請願書，但當晚卻槍殺了沙皇全家。皇后抱著太子，在受傷後仍然向神祈禱。她用自己的身體覆蓋兒子。公主們試圖用枕頭阻擋子彈。沙皇靜靜地接受死亡。

對共產黨仁慈，只會得到子彈的回報。一位非洲的天主教主教因為庇護一些遊擊隊，就被當時的民主政權關進罗德西亚監獄。在共產得勝後，他們給這主教的回報，就是殺死十名天主教傳教士。

我相信我們的工作。我知道我們可以引導共黨，甚至是共黨領袖歸主。我也相信黑幫匪徒的轉變，但我不建議任何政府將解決罪犯的方案完全交給牧師。警方的行動也是必要的。單靠傳教無法將世界從共產手中救出來。我們還需要一整套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措施。共產黨人已經成為心理戰與傳媒戰專家，為了打擊他們，我們也必須瞭解心理戰術。

基辛格說除了與共黨協和，別無選擇。和談的崩潰將意味著核戰爭。這是一種大錯。事實並非如此。蘇聯沒有發動核戰爭。但他們也沒有談和（雖然表面談和，其實完全沒有真意）。他們已經滲透到自由世界的高層。他們比光明之子更聰明。讓我們也用福音滲透共產陣營。

在鐵幕後面，我們引領歸主的，都自動成為反蘇份子，親西方的人士。因為他知道西方人可以自由崇拜，他們本國卻壓迫信仰。

我們只專注于傳福音。國家的統治者也有他們特殊的責任。

以難民的名義發言

我常有特權。我能為受迫害的人發聲，為他們做一些事情。在這書，我代表數以百萬計受奴役的人發言，但我也必須為處身在自由世界的難民發言。但我也為如今已經逃出共產國的難民說話。他們難以發聲。

功煥（NguyenCongHoan）是越南的一位政治家。他過去常在西貢舉行支持和平的抗議示威，反對當時政府（Thieu）與共產黨（北越）軍事對

抗。他乘漁船逃離越南，並在日本找到了臨時庇護所。

當功煥先生和他的同事抵達幾周后，他們邀請新聞界參加他們的新聞發佈會。警方和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却警告他們說，這樣做違反了日本政府對他們的期望。警方甚至警告說，這種會議可能會激怒河內政府，以致會要求遣送他們回國。日本當局就很難拒絕這樣的要求。

這些越南難民拋下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希望能傳達本國的迫切需要。但到了日本，卻被當局流放到一個小鎮，不能發言。只有等待美國或法國大使館向他們發放移居簽證。「我很失望，」功煥先生說，「我以為長期對我國提供援助的美國人應該更能聆聽我。」

令功煥先生和他的朋友們難過的，不是物質的困難或對自己生活的擔憂。他們逃離祖國，希望向世界本國的真情，卻沒有門路，而且自由世界反應也冷淡。

「當我第一次來到這裡（日本）時，我去拜望一些其他剛到的難民。」功煥說。「其中一個是一位非常老的女士。當我問她為什麼來時，她跪下來哭著說：“我祈求你，做點什麼，與政府交談，求他們幫助我們，求他們救助越南人。”我也是。我希

望外國的人能聽到我的人民的聲音。但人們卻無動於衷，不僅是日本人，就連從越南逃出來的越人，在这里待一些時間後，就忘了本國。

「當我離開祖國時，我以為外面的世界會反應熱烈。如今大失所望。但我不能讓自己灰心，雖然似乎手腳被束縛，做不了，也說不了什麼。」

功煥先生只是共產國的數百萬難民之一。

學習主的母親瑪利亞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幫助共產國家的殉道教會。更好的是，我們可以領受殉道弟兄給的榜樣。

在共產中國，一名牧師和兩名基督徒女孩被判處死刑。正如教會歷史上常見的那樣，迫害者作弄他們。他們應許那位牧師說，只要他開槍射殺這兩位少女，他們就會把他放了。他接受了。

當宣佈執行死刑時，這兩位少女在監獄院子里等候。一名獄友在牢房裡目睹了這一幕，形容她們臉色蒼白，但美麗得令人難以置信。無限悲傷卻又甜蜜。她們很害怕，但準備好接受死亡，不放棄信仰。然後，劊子手在衛兵的簇擁下走了過來，手裡

拿著一把左輪手槍。少女倆看見這位持槍的僧子手正是她們的牧師。

這兩個少女彼此低聲私語，然後向牧師深深鞠了一躬。其中一位說：

「在你射殺我們之前，我們衷心感謝你給我們的幫助。您為我們施洗，又教導我們永生之道，您又給我們聖餐。愿上帝報答您對我們的一切善行。您還教導我們，基督徒有時會犯下可怕的罪，但他們可以獲得寬恕。當你後悔自己的行為時，不要像猶大一樣絕望，而要像彼得一樣悔改。上帝保佑你，請記住，我們沒有生氣。每個人都有時會跌倒。我們滿心感謝的死去。」

她們再次鞠躬，知道主耶穌特意安排，讓她們承受最大的痛苦，就是死在自己牧者的手中。

那牧師硬了心，射殺這對少女。過後他自己也被共產黨槍殺了。

這兩個女孩的名字叫邱清秀和何秀珠。我們不透露牧師的名字。這件事發生在江西。

人與人之間總會發生衝突，雖然不一定像上述所說的那麼戲劇性。讓我們向這兩名殉難的少女學學

習如何面對朋友的背叛，或我們所信任之人的不忠。

在共產中國，共產黨殘酷地折磨一名少女，試圖迫使她吐露地下教會的秘密。後她同伴們問她如何承受那些痛苦時，她回答說：「這並不難。我的牧師告訴我說，真正折磨的時間，其實不長。每受一分鐘的酷刑，就有十分鐘的時間看著憤怒的面孔。於是我閉着眼睛（何必看魔鬼的使者？無什好看。）於是在棍子击中我之前，我什麼也不看，所以痛苦就減少許多了。我也信基督的應許：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太 5: 8）。我早已經從心中清除對人的恐懼（恐懼原來是一種污穢），於是就看見神。過去很多人就是這樣看見神。當共產黨發現我的妙法后，就用膠帶把我的眼皮拉開，但為時已晚。我已經看見了神。」

我們可以向這位基督徒學習，不必太擔心苦難，只要閉起眼睛。死人不會害怕。我們向世界已死。我們只向神是活的。

我們剛得到一本由真正的蘇聯東正教會秘密編撰的書《讓他們與聖徒和平相處 Give them Peace with the Saints》。這裏是它的部分的内容：

第一位被共產黨殺害的東正教神父是特楚（John Kotchurov）。在艾什城

(Essentuki,) 利亚 (Ria) 神父和其他許多人一起被砍下四肢，並在還有氣息時就被埋葬。克拉神父 (John Krasnov) 被活活燒死。科紐神父 (Nikolai Koniuhov) 卻被凍死。波多神父 (Alexander Podolskii) 被打死，共黨也槍殺前來埋葬他的人。教會執事吉洪 (Tikhon) 為自己唱了葬禮文，赤軍強逼他十歲的兒子挖坑埋葬父親。德米神父 (Grigorii Dmitrevskii) 首先被割掉了鼻子和耳朵，然後割頭。尼科神父 (Grigorii Nikolski) 在做完禮拜儀式後，共黨向他的嘴巴里開槍，告訴他說：「現在我們就給你聖餐。」

蘇聯對基督教的鎮壓已經持續了六十年。但真東正教會仍然秘密進行聚會，敬拜神。我曾見過他們的大主教。我感到看見他就像遇到基督。當那位大主教開始晚間禮拜，誦念奉聖父、聖子和聖靈的名時，全會眾就哭了。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意識到這句話的深度。我發現自己就如一個遠離神的浪子。我只曉得神的名字。但這位大主教卻擁有神名的真意，他崇拜儀式的第一句話，就完成了改變人心的工，無需我的長篇講道。

讓我們從這些基督徒學到如何面對生活難題，無視敵人的威脅，只忠誠跟從主。

我們日本、印度、瑞士、丹麥和巴西的主任們都受到共產恐怖分子的威脅。我和兒子一直冒著生命的危險。基督徒生活和工作，並不容易。主說：“人子必須受苦，”我們都是人子。

在蘇聯的立陶宛(Lithuania)，一名基督徒女學生西萊(Leonas Sileikis)被帶到由七名教師組成的委員會進行審查。當老師們問她對無神論書籍的看法時，她回答說：「這些書含有謊言和誹謗。」一名共產黨員就向她解釋宗教的可惡之處，問她是否願意放棄信仰。她的回答是：「我信神，不會放棄。」學校校長向她父親解釋了宗教的危險。但父親說：「宗教並不危險。踐踏宗教的後果就是學生不再尊重老師；他們喝酒、抽煙、嫖娼。」一位老師爭辯道：「現在去教堂的人越來越少了，跟從多數才是明智。」那父親反駁道：「只有屍體才會順流而下。活人則逆流而上。」主任警告他，「你這種態度，可能害你的女兒無法完成學校的教育。」這父親回答說：「使她不能升學的不是我，而是你們。如果必須放棄道德的原則，上學還有什麼好處？」我們還不知道這次審查後，西萊一家怎樣了。但我知道很多像他們一樣的人，如今都在坐牢。

西萊和她的父親履行神的命令：「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馬書 12：1）

各人的恩賜不同

我並不是叫每個人都成為殉道者。耶穌的話是：「這話不是人都能領受的，唯獨賜給誰，誰才能領受。」（太 19：11）

主耶穌這話，大大安慰了我的心。叫我不再受良精神責任。爬行也能釋放你。

显然，聖經中的誡命，並不是給每個人的。人們無需實現所有的命令。我們也不必因為無法實現這些命令感到難過。有些誡命只給猶太祭司，有些只給丈夫或妻子，還有一些則給孩子們。給主人的誡命和給僕人的誡命不同。許多經文是專門給征服迦南的一代人。有些僅適用於農民。上帝並不期望每個人都作同樣的事。

每個人都應該根據自己的呼召和自己的恩賜事奉上帝，不必因為做不到某些事而折磨自己的良心。

在馬太十九章九節，主耶穌禁止離婚。祂說人最好和伴侶在一起到命終，即使伴侶多次背叛你，把

你的生活變成地獄。這種持續的苦難可以說明你培養像基督一樣的品格。然而主馬上補充說，這話不是每個人能領受的。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這種極端的虐待。

在赤化的中國，當基督徒正在聚會時，警察闖入，公佈他們要逮捕的一名基督徒。為了保護這位弟兄，信徒們說他們中間沒有那人。但那位弟兄卻站出來說，「我就是那人。」他不能忍受謊言，即使眾人這樣說是為愛他的緣故。他就因此喪命。

這種絕對坦誠是值得欽佩的。但我們只能欽佩，不能模仿。不是每個基督徒都對真理有同樣的熱愛。熱愛真理是神給某些人的特別禮物。

如果我們不用詭計，就不能將《聖經》偷運到共產國，也不能在共產國從事地下教會的工作。誰能在不瞞騙當局的情況下進行地下工作？我們不會責備任何無法接受我們使命的人。他們沒有得到這種感動。也許他們領受的使命不同。

一位帶著幾個孩子的貧窮的亞洲基督徒讀了我的書《為主受苦》，就立即賣掉了他所有的一切，就是一棟簡陋的房子，並用這一小筆錢開始我們的一個支會。他現在正在領導著赤色中國一個重要的聖經走私行動。耶穌對一位富有的稅吏說「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這句話不是人人可以接受的。

然而，我們可以從他們的榜樣中得到鼓勵，並快樂地奉獻我們所能奉獻的一切。神知道自己把我們造的各個不同。祂並不期望人人都有同樣的恩賜。

在黎巴嫩，基督徒與受共產黨訓練和武裝的巴勒斯坦遊擊隊作戰。在馬伊達 Majdalon，遊擊隊將汽油倒在一名基督徒軍官家裡，點燃導火索就逃跑，他們以為自己的工作已經完成。幾秒鐘之內，軍官的姐妹們就會被殺，但奇跡般的是，點燃導火線卻熄滅了。有天使在阻撓。

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外。在無數其他的案例，基督徒都手中拿著武器，試圖捍衛自己的信仰而死。古代聖徒「打敗外邦全軍」（希伯來書 11: 34）的榜樣並不是給每個人的。

也不是每個基督徒都能照顧全教會（哥林多后書 11:28）。能看見全世界的需要是一份與眾不同的恩賜。面對已經有基督徒被折磨致死的國家，和其他即將被屠殺的國家，那種悲痛將會破碎大多數人的心，叫人發瘋。看到自由世界的教會對此不聞不問，更令人痛心。

我們知道，拋棄朋友是每個未重生靈魂的主要特征。如今的自由世界，正是如此。

正如許多猶太人被所謂的基督徒殘害後，就不要再聽耶穌。柬埔寨人和其他被歐美拋棄的民族，也會心中銘刻：「基督徒雖然強大，但在我們最需要他們的時候，拋棄了我們。他們讓屠夫成為我們的國家領袖。基督徒不可信賴。」

我們並不期望所有的基督徒都分擔我們的擔子，請為我們祈禱。

你會對耶穌說「離開我嗎？」

格拉尼人祈求耶穌離開他們的境界（馬可福音 5:17）。他們有充分的理由這樣做。耶穌命令一群污鬼進入一群豬，那群豬就都投海淹死。格拉尼人因此失去了經濟來源，並孩子的生計。如果耶穌進入你的生命，意味著你將會失去房子、汽車、銀行帳戶或工作，你會有什麼反應？也許你依然會繼續使用神聖的言語，但不再真心。格拉尼人的禱告至少是真誠的：「耶穌，離開我們吧。」

耶穌已經習慣了被趕出去。在霍爾曼（Holman Hunt）的名畫《世界之光》中，主耶穌在一座屋子前敲門。可是祂的腳不是向著門，而是轉向外邊。祂已經習慣被人拒絕。因為接受祂的代價太高了。

使徒保羅寫道：「我為我主基督耶穌，已經丟棄萬有，視為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 3：8）我們是否也把我們漂亮的傢俱、新車、好職業、銀行存款視為可厭的糞便？而且希望擺脫這些——越快越好？凡想贏得基督的，就須丟棄這一切。與耶穌的友誼須出代價。唯有信心能拯救，但空談不是信心，行動才是。

上帝給世人的最先啟示，是用希伯來文寫的。這種語言沒有動詞「擁有」一字。你不能用希伯來語說，「我有一所房子」或「我有一輛車。」因為希伯來語沒有「擁有」一詞。希伯來人甚至沒有“擁有”這概念。所有財產的唯一擁有者是上帝，你可以擁有祂。至於其他事物，你只能是它們的管家。這就是為什麼基督徒祈求天父賜給他們每日的飲食。看起來，他們在冰箱已經有備用的食物，無需向神祈求。但這食物依然是神的，祂可以命令你今天不要吃，而是禁食。

那些對你說，只要信耶穌，就必有錢有健康有快樂的牧師，只是誤導師。因為事實是，你信了耶穌，就可能失去「一群豬」，就是你的全部家產。主說：「凡不捨棄一切所有的，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加福音 14:33）。所以多數人心中的禱告，與口上的不同。口上贊美神，心中卻在低語：「耶穌阿，離開我吧！」幸好不是人人都如此。

共產黨在黎巴嫩培植巴勒斯坦人反猶，又提供武器，殺害基督徒。但上帝真孩子不會死於子彈。他們在信主的那一刻已經死了。他們的生命如今不再是他們自己的了。

二十二歲的黎巴嫩基督徒學生，在平靜地前往納卜哈與家人共度耶誕節時，途中被槍殺。他的屍體上發現一封自己早先寫好的信：

「如果我的預感是真的，我會死在這條路上，我告訴我的母親和家人：不要悲傷，不要哭得太悲傷。你們只是看不見我一忽兒，我們會在天堂再見面。那裡充滿歡樂。無需擔心，神的憐憫將使我們重新團聚。我只有一個要求。請從心裡寬恕那些殺我的人。請與我一起祈禱，儘管我的血是罪人的血，但願它可以與無故被殺的各宗教信徒的血，一起代贖黎巴嫩脫離她的罪。願我的死給人們彼此相愛。。。讓我們為敵人祈禱。如果阿布（Abou-Khalil）可以給我一些木板，就可以作為我的棺木，我會在裡面躺得很舒服。請不要為喪禮作任何花費。願人都饒恕我。我不過是塵埃。我，一個罪人，在耶穌基督里，加西（Ghasibe Kayrouz）」

我是猶太人，我很歡喜擁有一位這樣愛主的阿拉伯弟兄。當他接受耶穌後，就失去一切，甚至失去

了在地上多活一天的希望。他絲毫沒有困難寬恕他的凶手。這就如呼吸一樣容易。

沒有人能夠描述共產主義的所有罪行。索爾仁 Solzhenitsyn 描述了一些，但不是全部。愛德華 (Edward Buca) 是前蘇聯集中營囚犯。他在《沃庫塔 Vorkuta》一書中講述了一名共產員警如何將一根大蠟燭插入一名婦女的陰道，然後點燃。他對她說，「你有一點時間可以考慮。很快火焰就會到達你的身體。當你準備好在認罪書上簽字時，便眨眼三下。」火焰燒到她的身上，警官平靜地看著。他一度取下蠟燭，用它點燃一根香煙，然後又把它放回去。

試圖逃跑的囚犯遭到野蠻毆打，然後被綁在飛跑的馴鹿後面拖死。黨方又迫一名囚犯，在基督徒的屍體暴露在公眾面前時，站在一旁吹口琴。

蘇聯基督徒沒有自己的生命可以喪失。就像古希伯來人一樣，他們也沒有「擁有」這概念。一位信徒從地獄般的蘇聯監獄中偷偷帶出了一封信，里面充滿和平與崇拜，寫信人似乎沒有意識到周圍的恐怖。

「“你的作為奇妙”（詩 139：14）。親愛的母親和女兒，在你們的生日，我寫這信向你們問候和祝賀。這句經節是 1845 年，世界上第一封電報的

文本。電報的發明者是莫斯（Samuel Morse）。他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福音傳教士。這段詩篇是在3,000年前寫成的。以後的2,500年，這詩篇都是連繼手抄的。直到1455年，印刷術發明後，第一本印成的書，就是《聖經》。

「天主的作為在一切事上，在自然和科技上，在所有人的生活，在人民和人類的命運上，特別是在祂的教會上，都是真正奇妙的。思考祂的手和祂創造性的思維在我們周圍的一切所做的工，就是一種極大的快樂。《聖經》也是人類繞月飛行時閱讀的第一本書。

「從你的信中，我看出你因我而非常擔憂。親愛的，你不該這樣。要留意健康，不要讓心靈難過。一切都是神的美好安排！」

這樣的基督徒看到神的旨意，曉得神的美意。就算是被共產暴力打擊。那時，不信的人或那些信心膚淺的人也會對耶穌說：「離開我們吧！你害我們丟失一切生計，我們所有的豬！」

感恩受苦

我們對力量的觀念，常有錯誤。我們以為《力量》就是粉碎他人、征服他人、鎮壓或懲罰他人的

能力。但還有另一種力量，是「愛的力量。」這是內裏的耐心和安靜，樂意無辜地受苦，以善待惡。因為除了外在的，顯眼的動力，還有一種安靜的潛力。就是神無限之愛。

一名共產黨軍官毆打一名基督徒，說：「我是全能的，我可以宰了你。」基督徒回答說：「真正的力量在我這邊，因為當你把我折磨死了，我仍然可以愛你。」這就是上帝的全能——它反映在聖徒靈魂的深沉寧靜中。他們不會問：「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悲傷？」因為他們已經學會了愛耶穌的十字架，也學會安然被人拒絕，不得人的安慰。一旦你曉得這種來自上頭的心，就不再會困惑。有哪個孩子會因為收到一份心怡的禮物而不高興？

聖潔的頂峰就是永遠不為自己求什麼，也永遠不拒絕神榮耀你的十字架，並且謙卑地接受生命，也不多問。如今我們還不能明白所有的問題。有一天我們會知道，就像神知道我們一樣（哥林多前書 13：12）。聖人並不是擁有神巨量亮光的人，而是空無一物，无足轻重的人。神的光透過他散佈給眾人，以致人人都可以愛鄰舍，包括最糟的鄰舍。誰知道今天的兇手不會成為明天的聖徒？今天的放蕩女會不會成為另一位末大拉？全能的上帝不能在永恆中補償我們暫時受到的傷害與誤會嗎？（這也包括我們對他人的傷害！）

我們讚美聖父、聖子和聖靈。我們對主說：「生你的胎是有福的。」（路加福音 11：27）瑪利亞因此蒙受苦難。我們也是如此。與其用許多“為什麼”為難自己，不如歡迎這許多我們不瞭解的事。因為通過種種的折磨，我們就更能榮耀基督。

蘇聯唯一忠實的浸信會聯盟秘書長文斯（George Vins）不久前入獄。他的母親寫信給他：「后天就是你入獄的周年紀念日。這真是一個悲傷的周年紀念日。但要堅強，我的孩子。你做的很好，就如你父親一樣（文斯的父親也因為見證基督，死在獄中。）愿主光照你，解除你心中的重擔。願上帝保守你。願他保護你的靈魂免受邪惡的侵害，避免你在悲傷中變得苦毒。我不斷地祈禱主怜悯你。讓我們把自己交給主，因為我們的生命氣息都在祂手中。祂知道我們有多麼疲憊，也知道我們在背負十字架時沒有喘息的機會。當祂來的時候，就會把我們從重擔中解放出來。受福的時刻臨近了。主來了。在以前，你父親也和我唱過這首歌。現在我們同唱，在永恆中我們就三人同唱。我擁抱你們。母親莉迪亞上」

浸信會牧師帕維爾（Pavel Vasilievitch）死於集中營。他的妻子也被判刑十年。在丈夫死了五年後，她還以為丈夫活着，於是寫信給丈夫說：「我知道我們死後會見面，那裡沒有悲傷，沒有分離，

倒是有幸福與平安等著我們。我知道我們在地上相遇並非偶然，而是主的親自安排。祂又為我們預備一條艱難的道路，與祂給我們的內裏力量相稱。我感謝上帝讓我們共度一生，感謝祂給的所有苦難，並祂的愛和恩典。當你走在祂面前時，願神祝福你。」

苦難折磨著一些靈魂，迫使他們絕望，甚至自殺。但對另一些人，苦難卻是良藥。我曾見過忠實的基督徒囚犯在獄中歡呼雀躍。他們承認上帝是全能的，並耐心地對待那些折磨他們的惡人。他們知道神的愛是不可抗拒的。它將會征服人心。

當你受到委屈時，也這樣說話和行事。與天父同心，你就更能明白祂的道路，你的疑慮就消失。

嘗試做一些實際的好事，而不是批評上帝沒有做你認為最好的事。向殉道者學習。

我們收到了浸信會囚犯瓦爾克里（Valerii Nasaruk）的信。她寫道：「我的兒子希望來到西方讀神學，成為一名傳教士。但神卻對他說：“不。我帶你去另一種學院，就是監獄。”我參加了他的審判。這對我來說很難。我更願意代替他。但神賜我力量來承擔一切。最難的是當他們在法庭上要求我勸說瓦萊里回轉。這個我做不到。我倒安慰他繼續行主耶穌的道路。世界指責我們沒有盡父

母的責任，說是因為我們的錯誤教導，以致孩子被當局逮捕。甚至有些信徒也不能理解我們。但我們的救主也是如此。眾人都不能理解祂。以為祂被當局處罰，是祂自己的狂妄大言。連彼得也警告主耶穌必須自保。感謝神，給我們獲得允許探望瓦萊里。他還很勇敢。他向你們眾人問安。」

瓦萊里在監獄里依然勇敢。他母親被剝奪了撫養兒子的權力，又受多人譴責，但她卻靠著基督，並不沮喪。如果正在自由中的你還會憂愁沮喪，那是怎樣的錯誤呀？

在俄羅斯，一位修道士經過一些正在學習射擊的士兵。他們的射擊靶子是一個十字架。這僧侶對他們喊道：「我不許你們向十架開槍。」他們笑道：「你怎能阻止我們？」這修道士就站在十字架前說：「那你們就開槍吧！」一名士兵就開槍，可是沒有命中。其餘人都放下了槍。

瓦拉 (Varvara) 是監獄里的一名護士。她太好了，以至於一個曾經謀殺七人的兇手，在監獄的病房里垂死時問她說，「你是人還是天使？你怎麼能對我這麼好？」她回答說，「因為你正在受苦。」「我是罪有應得的，」他承認說，「我殺了多人。」她卻安慰他說，「上帝是仁慈的。那些罪孽不大的人不需要很大的憐憫。對於大罪人，神有很

多恩典。至於你，神是恩上加恩。你在他眼裡比所有其他人更有價值。」那殺人犯深受感動。「上帝怎麼能讓你和我去同一個天堂？」他問。「上帝是瞎了嗎？祂看不出我們的區別嗎？」瓦拉開始哭泣。這男人驚訝問：「你是為我哭泣？除了我幼年時的媽媽，沒有人為我哭泣。」然後他求她為他祈禱。這犯人有東正教背景，於是這位福音派的瓦拉就以東正教的方式為他祈禱，因為知道唯有如此，才能觸動他的心。他死時已經悔改了。

向殉道的弟兄們學習一種全新的基督教：基督心目意中的基督教。

成為同殉道者

不是每個人都蒙召成為殉道者，但與殉道者分擔，却是我們都可以做到的。今天也有一些聖徒追隨古代殉道者的榜樣，比如二世紀安提阿的聖伊納（Ignace）。當伊納被判送去喂野獸時，他寫道：「我很高興，因為神為我預備好了野獸。我祈禱它們會對我兇狠。我會激怒它們立即吞掉我，不要害羞，就像有時會發生的情況。。。我知道這對我有好處。現在我才開始成為一位門徒。。。死亡臨近了。請原諒我，弟兄們，不要阻止我獲得永恆的生命。」

在德國納粹統治下殉難的朋霍潘（Bonhoeffer）曾寫道：「饑餓的人需要麵包。讓饑餓的人繼續挨餓，就是對上帝和鄰居的褻瀆。如果饑餓的人不信基督，過錯就在我們。給饑餓的人麵包就是為基督的恩典預備道路。」

人們不僅需要食物，更需要神的話。每天有 25 萬人出生，其中大多數是在福音不為人知或不免費的國家。

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庭正在缺少一塊麵包。你會愿意給嗎？

一封聖誕卡從蘇聯偷運出境，經過長時間的延誤才抵達西方。它的作者是基督徒作者阿加托

（Alexander Petrov-Agatov），他為了信仰在監獄和集中營里，度過了三十年的時光。這信是無價之寶。

「在耶誕節前夕，我想起所有的人，無論他們的信仰和膚色，他們的社會地位或教育水平。我想起那些當權者和那些在監獄和集中營里受苦的人，富人和窮人，強者和弱者，那些登上頂峰的人和那些跌入深淵的人，那些生病的人和健康的人，那些受迫害的人和那些壓迫者。我尤其想

到那些最近才分手的人，我曾與他們一同在監獄和集中營里待了近三十年... 今天在這裏，我們的節日餐桌上有一棵小聖誕樹、有蘋果、葡萄和其他好吃的東西。我心裡有一句話像鐘聲一樣響起：你能在至少一個人還飢餓的時候吃掉所有這些東西嗎？當某個地方甚至不允許囚犯躺在冰冷的混凝土上時，您可以睡在溫暖的床上嗎？

「花環裝飾著我的聖誕樹，而沉重的奴隸鎖鏈和鐵絲網環繞著營地。我不僅僅寫蘇聯集中營和監獄；我也想到所有那些今晚沒有吃，也沒有喝的人，他們無法看到那颗閃亮的明星，這顆星星引導智慧人找到基督，因為監獄的窗戶被木板覆蓋了。

「在耶誕節那天，我向我們的鷹和鴿子致敬——母親和妻子、新娘和那些無法成為新娘的人——我的姐妹們，為了神的話語、為了真理、為了公義、為了對神的忠誠，和對神的愛而背負著十字架。

「我向所有受迫害、受苦的人以及所有尋求光明的人致以聖誕問候。向所有迫害者和壓迫者、所有咒罵和沒收我們所有物的人致以聖誕問候。

「我向七年前背叛我的人致以聖誕祝福。我拜訪了你所在的教堂。我本想見見你，但人們告訴我說你已經退休了。但你有祈禱嗎？祈禱吧，祈禱。

「所有的人，囚犯和看守，秘密警察和巡邏人員，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和主席——趁還為時不晚的時候祈禱。基督不會再次誕生，但祂會再次降臨。主說：”看哪，我必快來。“主啊，我願你來！」

或者你也可以學習尼喬爾姐妹（Nijole Sadunaite）。她曾在蘇維埃立陶宛（Lithuania）從事基督教活動，她在法庭受審時說：

「真理不需要辯護，因為它是強大且不可征服的。只有欺騙和謊言在真理面前無能為力，才需要武器、士兵和監獄來延長他們丑惡的統治。偏袒一方的政府正在自掘墳墓。我站在正確的一邊，並準備好為了真理而失去自由。我甚至願意獻出生命。只有相愛的人才擁有權利責備和批評所愛的對象。因此我對你說話。你為自己的勝利感到高興嗎？你戰勝什麼？戰勝了道德？。或是戰勝了充滿恐懼的底層人羣？。。。感謝上帝，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你們屈服。我們[基督徒]在社

會上人數不多，但質量在我們這一邊。我們不擔心入獄，但我們必須譴責一切導致不公正和羞辱的行為。我們必須區分人所寫的和神所吩咐的。我們欠凱撒的，只是在我們把最好的果子獻給神之後的剩餘。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讓心靈和思想擺脫恐懼，因為屈服於邪惡就是最大的邪惡。

「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我為了真理和對人類的愛而受到考驗。有什麼事業比這更重要？我有令人羨慕的命運，光榮的結局。我受到的譴責將成為我的勝利。我很遺憾為眾人做的太少了。今天，站在耶穌基督永恆真理的一邊，我記得祂說的第四福：“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 5：6）。

「我怎能不大大喜樂，因為神已經應許說，光明必勝黑暗，真理力勝過錯誤和謊言？愿神給我們保證，他最後的審判將對我們有利。我每天都這樣向神祈求，為你祈求。讓我們彼此相愛，我們就必快樂。只有不愛的人不能快樂。我們必需指責罪惡，但我們也必需愛罪人。這個你只能從耶穌基督的學校學到。他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生命。好耶穌，愿你的國進入我們的靈魂里。

薩杜修女被判三年監禁。她也因此成為普世教會的榜樣。

我們的使命不僅是向異國的基督徒傳遞援助，也給西方世界基督徒得到殉道者的祝福與啟示。

戴鎖鏈的手可以給人最好的祝福。您可以接受這種祝福。

(全篇完)

如要與作者聯繫，或幫助地下教會，請聯絡：

Help For Refugees, Inc.

P0Box5161, Torrance, Ca. 90510, USA

hfr@helpforrefugees.com;

網站：<http://helpforrefugees.com>

本文若有錯誤，請用 Whatsapp 聯絡譯者：
+60165608439